张承志 著
一册山河

張彤宇

张承志 著

一册山河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水路越梅关 —— 1

檀木镇纸 —— 12

东本愿寺 —— 15

与草枯荣 —— 18

高贵的精神 —— 31

一页的翻过 —— 39

双联璧 —— 45

从大坂到鱼儿沟 —— 54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 61

波斯的礼物 —— 63

二十八年的额吉 —— 81

粗饮茶 —— 96

师傅窑 —— 108
叶密里的小姑娘 —— 113
长笛如诉 —— 121
树梢上的心 —— 132
祝福北庄 —— 137
人道和文化的参照 —— 147
音乐履历 —— 159
一册山河 —— 196

编后记 —— 212

水路越梅关

一

南方如外国。对于我这样惯住北方粗野之邦的人，南方是文明的，媚人的，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溽湿的，龌龊的，语言不通的地方。对那片土地，了解的难度大于异族异语的边疆，所以和它缘分浅淡，而且愈来愈漂移不定。

本来就快要忘了它，就要觉得两不相干了——但是在心底的哪里，又常有许多夺目的形象浮起。确实，几乎所有纠缠着我们的思绪、使一代情感为之所系的人物，都是南方出身。随便一数，比如楚地的谭嗣同陈天华，吴越则秋瑾鲁迅，他们高贵的气质，与我们日常惯见的那么不同。

我喜欢在前赴南方之前，先监阵磨枪地读书。那里是文献之邦，总要知道一二基本。先读个印象，以后再对着风景，一句句体会——这是真正的奢侈；吸着清新的风，对着青黛的山，读着的都是古典的华章。

这是我摸索出来的养身之道，望着如此下流的世相，

你只能古文当中药，审美以养心，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而且一旦开卷，一字一声妙响，一句一段音乐，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人也不觉独 自笑了。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真的，一读这样的句子，我就有出了国的感觉。

我的南国行，如约束过一般，先去屈子故国。那一年汨罗江上雨水满溢。我满心朝圣的心情，与一位塑过屈原祠浮雕的湖南画家结伴，抵达了汨罗的楚塘。趁着人在当地，古代风景就在视野，我们一字字讨论，一点点体会，如完成一项宗教仪礼一样，把《离骚》和《怀沙》读了一遍。

再一年去绍兴。真让人兴奋，果然山阴路上，目不暇接。于是渐渐成痛，总把南国的短旅当做休息和留学。又一年登庐山，探寻到陶渊明故里的最远一角，对着南山，确认东篱，把一条归去来路穷追不舍——到处的朦胧雨幕，满眼的墨染山影，风景在冷雨中移动着，濡湿了人的肌肤和感受。

古代太洁雅，今日过恶俗，彻底的相悖使人难忍。一次次地，我愈来愈觉得，南国一词，美丽而隔膜。

二

留意地理上的梅关道，还是在海南岛。那一回，我一门心思企图弄懂远航而来的穆斯林的事，想搞清他们登陆中

国前后的停泊地和聚居地，想看出个门道格局来。于是时间都耗费在那件调查上，只在偶尔时想过——上岸以后，接着，古代的旅人该怎么走？

地图上，从广州港向北，面对着茫茫中国一共有两条路：或者出韶关进入湖南，或者出梅关进入江西的赣江流域。噢，原来这儿是第一道关卡，我那时曾经暗想。在地图上，一道棕黄的山脉分开了赣粤两片绿色平原。在那条棕色的正中有一个地名：梅关。

今年此时，我已经从江西一侧，登上了大庾的梅岭。听说这儿已是汉朝的边境，前方不远就是梅关。南国冬季，天气湿冷，一阵阵的风裹雨雾，皮鞋里浸透了雨水，脚趾头冰冷。

但是视野雄壮；铅绿的山峦影幢变移，向南方的广东倾斜而去。凝望着，不由得胸中忐忑不已。当人看见了大地的倾向，那感觉不可思议。何况脚踏着的，是宋代的黑卵石路。它约有二牛之宽，正是古路：两辆牛车可以交错。黑卵石嵌入绿草，一如扎了根般牢固。太棒了，我暗中自语。

朦胧望见一座关。走近时，心里又不禁喝彩，这关虽小巧，但有滋有味。因为水气雨幕的遮隔，砖上绿苔，石缝长松，加上关门筑在沟底，仿佛劈开了石峡一般。打量着走到了跟前，敞开的门洞，盛着一孔明亮。梅岭北麓已经走完，门洞那边，就是南粤广东、古时的化外之地了。

一行人踩着水潦，啪啪溅着水，跳过淋漓黑亮的石路，赶快出关，先把一只脚迈到广东。然后回头欣赏。关楼门洞的两侧，左右有一副对子。书法老实规矩，造句平淡朴实：

梅止行人渴

关防暴客来

听本地人讲，近年粤赣官员为了招延游客，常为这副对联争吵。广东人要求刮了暗指南人的暴客一词，江西人却说历史文物怎能擅动。

而我却偏爱这副小对。名胜对联，最容易的是诳言浪语，大多都是显弄聪明，很少能如这一联，十个字，却画出一种远僻关津的气氛。即便暴客也不具规模；顶多是小商通道，旅人驳杂，或为牛车堵塞而口角，或因不通语言而动手。写得好！多有趣！我连连赞叹。

一两年来，我时不时地琢磨这座梅关。进入盛唐的穆斯林蕃客分为两支，一股沿海向泉州继续航行（后来顺大运河北上）；一股在广州港弃船上岸，决心进入大陆寻找生计，而梅关，是他们遇见的第一个关口。

那是太平盛世，对外来者没有那么紧张。歧视更与大国风度不符，所以穆斯林可以安心进入这块大陆，寻寻觅觅，且商且行，直到找到一个便利之地，以客籍做主人，认他乡为故乡。

小小梅关素砖浆缝，骑坐在山谷之底的黑石路上，并不险要。三几守关小卒，大约只留心山火而已。唐宋之际，常有青目虬髯的蕃客北上进关，他们习惯了过关一次，就吃一掬梅子。

三

从梅关下来，一面走，一面想着南海来的蕃客，所以见

雨中梅关。关 对联：梅止行人渴，关方暴客来。

1999 年，粤赣边 。

路边一些石碑时,并未在意。无非是些历代吟咏罢了,随意想着浏览,忽然发现文天祥名字。他是在南海的最后一战中被俘的——莫非文天祥押赴大都,走的就是这条路?

停住脚,从飞舞的笔迹里字字辨认,读了这首《南安军》。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
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

我心中一动。出与归,两个字用得惊人。出岭谁同出?押解囚车的,当然都是河北壮汉胡服骑兵。“归乡如不归”一句是请教了人才明白的:文天祥恰是江西人,家乡就在前方押送途中。

后来读了张玉奇的《文山诗选注》,补习了一点文天祥的课。烈士若有所思,伴随的景色也壮阔。先是宋元南海决战,“腥浪拍心碎”,“人死乱如麻”。宋朝覆灭了,失败已是铁铸的现实。

一二七八年十二月底,文天祥被俘。次年(1279)正月初二,元军拘禁文天祥于舟中,正月十二过零丁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诞生。更撼人的对仗,更加使古代骄傲的句子出现了。

文天祥律诗中的对仗,于朴实中暗夺天工。后世评价不足,我想是因为后人心中,缺乏一种双足泥巴的地理体验。比如童叟熟知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谁知惶恐滩也确有其处,它就在这赣江之上,与零丁洋都是诗人亲身经历。辞藻已是前定天成,绝唱还要两遍检验——

我不住地想，当文天祥从零丁洋漂流而来，国已然不存，人更是囚徒，惟有一篇诗稿两句对仗，更兼他闭紧囚船篷窗，举意绝食，在激烈的江水喧嚣中，再次过吉水惶恐滩的时候，他对 自己的对仗之工，会发生怎样的感慨呢?

文人所以不足为训，是因为他们年年扮演雅致，到头来一生无佳句。而文天祥等则正相反，一旦美文流出笔端，反而难以感叹。这样的从文体验，不是轻薄者能想象的，

后来的所有诗作都说明，国破身囚的文天祥 自被俘起，就动念舍身取义，并一天天等着它的实现。

至三月十三日，他在囚船里，浮海七十多天。翌十四日，灭宋大将张洪范设宴，席间，对求殉亡国的文天祥提出质问。文天祥以“烈士死如归”“商亡正采薇”为答，张洪范为之动容。四月十一日，使臣传达上谕，要把文天祥万里长途，押送大都。文天祥于四月二十二日被押出广州，北向梅关而来。

五月四日，文天祥一行从广东南雄出发，开始攀越梅岭。“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牛儿朝共载，本客夜为邻”——那时梅关道上，人传说有木客鬼（山精）出没，走停约二十天，至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军，也就是我路过的大庾县。

文天祥出广州后，抵达梅岭南麓前，有一句“倦来聊歇马，随分此青山”。以这一句猜，在南粤他们没有用珠江水船。大概是押官担心逆水上行船比车慢吧，在越梅岭之前，文天祥用的是车马。

梅关一过，囚车换船，顺流即将经过故里。句子一行行沉重，“江水为笼海做樊”。“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交久已化豺狼”。“中原寒气深，风土非所宜”。“长江还有险，中国自

无人”……读着不禁缄默,无形间感到了一股压力。

诗句不过挑选的汉语，只因一种和声，显出韵味力量。这和声里,有作者的行为人格,有时代的剧烈震荡。它们掷地有声,化为伴奏,使诗句鲜明凸现。对仗也不是奇巧取胜,凭着行间隐在的诠释而成立。在赣江上,我突兀地担心起自己的笔墨,怕自己也有过下流的轻薄。一连几天,我自问自答,仿佛做开了一篇诗人论。

从孩童时代，我就喜欢遐想：在中国古代那么多诗人里,究竟谁最棒？

后来丢弃了儿童思维，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问题。我惯于背上行装，出发数千里之外，去找发生过历史震荡的大风景。我喜欢在原地——细细品味，试着复原当时的感受,包括诗的含意。

文诗的贵重,大约主要在素朴与正气。有人会说,他自由不及某甲,华丽不及某乙。但我想,哪怕让甲乙再活几遍，也不过衣食自娱,做不出凛然行为。甲乙之道,不过以肤浅行世……沿着古道行走，确实容易想入非非。一人翻阅着各种资料,我走火入魔了,离开梅关道好久以后,我还纠缠在一堆章句里,品评着谁更好、谁最工、谁可以当住经久的、多面的质疑。

只是张洪范的问题依然刺耳：为一个腐败的亡国，值得吗？

四

令我称奇不已的不仅于此。文天祥的一卷断肠诗，居

然还勾勒了一条十三世纪的古道路！南海的战俘被押北上，他借诗排遣心事。没料到，他是在细致记载着一份南北交通的资料。

惟恐有人劫夺，越过梅岭之后，押解官决定以囚船为樊笼，于是文天祥走下了大庾的南浦码头。这一座津渡，至今仍然是黑石青苔，好像唐宋之交的砌筑古式。（江南的唐宋考古类型，我并不熟悉。但是若比较赣州宋代风格的城墙，南浦渡确有些相似）——码头下面，就是赣江的支流章江，它满盈涨饱，缓缓北流而去。

文天祥从南安上船，就开始了绝食，“闭篷绝粒始南州”。

先是赣江水路，经黄金市、赣州、泰和，诗作都以地名为题。他在囚船里再过惶恐滩时，面对着自己的如有神助的作品，面对着这作品孕育的风景，他即便感慨万千，也无法留下文字。

囚船过家乡吉州时，已经篷船绝食八天的他，身体一定很弱。但是更大的悲哀是，他已经觉悟到，自己求死不成。原来文天祥的计划是，南安绝食，死在家乡，正好埋骨桑梓，把此一生终结。诗中有一丝遗憾，致意只能从简了。“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篷窗”，“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

赣江无情地北流不止，家乡抛在身后。隆兴府（南昌）过后，赣江流入鄱阳湖。文天祥一同入湖涉江，沿长江顺水而东，“泊船休上岸，不忍见遗民”。

在长江河道上，一路抒情自励，过了安庆府、池州，走完了自南粤开始的半数行程。直至抵达金陵，诗篇著录地点，留下了一幅逼真的路线图。

赣江北桥，它的由来据说很[illegible]。

1999 年，赣州。

水路连续不断,离大江入运河,蜿蜒一线向着北方。真州、邵伯、高邮,终于到了山东。徐州、鱼台、东平,也许文天祥在江北乘船少于乘马:“野阔人声小,日斜驹影长”;但他的路线,一直沿着运河的堤岸。即使骑马,也能望见身旁的河道。“贪程贫问堠,快马缓加鞭。多少飞樯过,噫吁是北船。”

这是运河沿途的真实图画。若贪图车马速度,不必担心货物沉重,人可以不用运河的水道。但是,人还是不能离了运河的路线。

最后的一段路,到了河北的大平原上。

在刚刚矗立起来的“大汗之城(Han Balik)”的南郊,一行人偏离了运河。军人和诗人渡过滹沱河,在清苑徐水一带小住。文天祥眺望着太行山,心情平静,等待着进入元大都的日子。一二七九(至元十六)年十月初一,文天祥乘马走过琉璃桥,被押解进都。

五

——本来是浏览文天祥的史事诗篇,我却慢慢读出了一个地理的道理:古代的交通,本质上要依仗水路。

陆路甚至渴水以成绝域的丝绸之路,虽然有,但却是不得已而行之。古代的一切运送乘载、长旅近游,都不仅尽量靠近和沿着河床蜿蜒道路,而且尽量地直接利用最天然的路——河流。

河是最好的路,船是最大的车。九条牛两个虎能驮载多少?比不上一条船。一条通畅的河道能运输多少?能养活

一个王朝、能供给一场战争。

直至近代随着蒸汽火车与载重卡车来临之前，水道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路、交通几乎就是河流的基本现象，衍续了多少朝代时间。铁道和高速公路是古典道路的破坏者；它们一出现，就背离了河道，与河流分道扬镳，最终它们消灭了古道路。

人总在无休止地修路。为了什么?为了路好。但只有水路光滑无坎坷，只有水路可得风推水浮之助力。哪怕上水逆流人拉纤拽，只有水路才能负重运载。一条顺流而下的驳船，胜过一队千辛万苦的骆驼。漕运、航行——古代运输与交通的根本，不消说，它更满载过不尽旅人的人生。

文天祥的诗稿里，似乎藏着一篇水路解。虽然他被锁在篷窗里，正在赴死途中。虽然他半途车马，并非全数乘船。但是他的诗提示我，梅关道，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水路。

如此一条通道，其实只有梅岭才算是隔断了南北。梅岭上下有八十里，哪怕是运载着龙泉的瓷器、大食的明珠，越这道岭只能牛车驮拽。走在路上又不禁赞叹古人聪明：卵石垫硬路面，条石固牢卵石。一截一段，不窄不阔，盘旋山腰上，显着一股古风。

其次，理解这条路的关键，也全在梅岭。这条山岭耸立成边界，分开了珠江和赣江的两条水系。山岭两麓分别有一个水码头，可以猜想，古代的这两个码头上，都堆满了等待过岭的货物。它们看是翻山，其实瞄准山后的河道，目标一直远在北京南海。

南有南雄；从那里登船顺水，南下不远就是珠江，再出江，一直可以远行南洋大海。北有大庾；从南浦码头或东江

码头上船，只见水面宽阔，笔直对着赣江。从此一线水路，先入鄱阳湖再下长江，再从扬州大运河乘上内河乌篷船，然后就能纵贯中国，指向燕京了。

文天祥的逆旅提示了我们，梅关道，不仅只在粤赣之间。它是一条最古老也最便利的、贯通中国的南北水路。虽是水路，但也不拘一格。若没有货物，日期紧迫，那么舟行就不如马步了。

——咦，我这是读诗吗；

若这么读，到了末尾，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只是想，这样丰富的地理，不是任谁的诗作里都有的。

孩童的天真疑问，也是永远存在的：究竟谁是真正的诗人？

2000 年斋月

檀木镇纸

去年在南方,终于见识了从小听说的滕王阁。

那天一同登阁的朋友中,有老书家某先生。眼望秋水长天,大家心情舒畅,我随口向老先生求教,从纸到墨,听他讲文房四宝的奥妙。

滕王阁已翻盖一新,阁中层层店铺林立。看见摆的镇纸光色新鲜,盘算是否也买一对。如今作家少文,个个的字都如鸡飞狗趴。我也一样,偶尔写字,怨笔赖墨,而且只有一把英吉沙匕首压纸。足踏着滕王阁的地板,心里寻思,这镇纸只卖十多块,不能说好,但是有落霞孤鹜的字儿,带回一对也算个纪念。

老先生却摇头,以为粗瓷生铜,不值一顾。他说江西书家的案上,没有这种次货,也不使菜刀压纸,镇纸多用檀木自制。我说我的字哪里要什么镇纸,砖头石头,有一块足矣。老先生沉吟半晌,说,我给你做一对吧。

囊匣装着的镇纸被捎来北京时,我正在读一个小说。

急忙掀开囊匣盖子,只见一双白润的檀木,静静躺在紫红的绒布里。真是性灵南国,书法家还做细木工!抚着满掌光洁,脑中现出柔润檀木划过宣纸的感觉。

怀着一丝谢意,握着镇纸继续读。小说的主人公,正迎面着他第二次的被捕。小说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历历细微的,满篇都是他在“四人帮”时的苦难遭遇。我用白檀木刷地一划,翻过下一页。

这篇小说,其实是因了我的怂恿,朋友才勉强写了出来。他是个内向的家伙,文字轻描淡写,但骨子透出凄凉。压力和逆旅,使我们都敏感了,读着我想。

檀木握久了以后,光滑中沁出了一种冰凉。我想快些翻完这篇小说,好给江西的老前辈回信。可是故事却正在有趣处,不由我不先读完。警察监视他的房东,审讯他的女友,他把头上的一张大网,写得纲举目张。

一瞬间我意识到手中的镇纸。掂了一掂,觉得挺沉。确实,檀木绝非杨柳杂属,不显形骸,不露纹理。这么一想再掂掂手里小说,突然感觉我辈的感情娇嫩。不是么,以前我的那些劳什子,不更是又嫩又酸么。

丢开小说,摩挲着檀木镇纸,心里不禁佩服。世间最不外露的,怕就是这光洁之物了。其实当初斧子劈锛子凿,它的内里该都是坑疤。人也一样,每逢出事,当事人处置时,都要让肉长的心迎着刀刃,哪怕它伤痕累累。

囊匣下面,覆着一条墨纸,我取出来一看,原来是老者的题字:直木项千斤,江西民谚。趁着一时感悟,我提笔兑墨,用这一对白檀木压住纸边。想了半天,编了两句,哪管字迹蠢劣,与江西老者唱和了一张:生若直木,不语斧凿。我想,事物都大致雷同,无论一茎枯草、一头弱牛。政治的伤害比起永恒的大自然和长流的历史,比起存活下来的民众,是那么渺小。除了我们,被笔墨染了一身毛病的人,大

家都不去炫耀 自家伤痕。而且,大都是心广意宽,如打磨光滑的檀木镇纸，像穿了新衣裳的农民，干净漂亮地活下来。

东本愿寺

看过的佛庙太多了，虽然其中数不清的名寺古刹，但是反而留不住太深的印象。若数一下，只东本愿寺一座，却一直难以忘怀。似乎只有它超越了一宗一教的门坎，给我奠基般的教示。

在日本京都，一东一西有两座本愿寺。都是粗大斗拱，古拙石阶，以及素色的妆画。都有众多信者和堂皇的大学，都是出名的胜迹。

那一年，在“花的日本”和世界排行榜上顶尖的旅游天国——红叶锦绣美丽无穷的京都，我却不是旅游更不是享福，而像是专门去展示中国三好生实况。一连两周，每天随着日本最考据派的学究，大步流星地我奔波在京都。人流迎面来，我却逆着走，穿过古迹公园，钻进阴森森的研究室，找一些干巴老头子，请教“新疆”。

那一天去东本愿寺也不例外。记忆中像是去“见学”大谷探险队的文物藏品。那一天风清日丽，心情很好。在人流中进了山门，没想到，就在古色古香的大殿门口，在砂子铺地的庭院中央，扑面看见一幅巨型的墨字巨牌，白板墨书，写着这样两排大字：“只要人遭歧视，吾则不为人”。

我觉得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这句话的激烈和罕见，使我如被击中，不能再挪动脚步。它的字面意思更尖锐："只要人被差别，我就不是人"。"人间"(人)和"差别"(歧视)，一组汉字排列对比，像是宣布着决绝的原则。

同行朋友发现了我的惊奇，也停下来欣赏。看着那块黑字标语，他问我，是否知道所谓部落民差别。我只知大概，似乎那是日本式的等级和贱民制度。而差别做为一个词，却广泛用于我们所讲的歧视范畴。

在中文里，虽有语义更精确的"歧视"一词，但我们对它感觉迟钝。差别比中文的"歧视"含义暧昧些，但语感却重。在寺庙里读着尤为如此，至少在山门以内，歧视是为教义禁止的。

朋友说，因为这两句标语，人聚于旗下，东本愿寺吸引了大批部落民出身的信者。望着一些领着两个孩子的中年游客，我暗自猜想，也许它还吸引着失意的、原来以抗议部落歧视为己任的左翼学生。兼之建筑本身极具唐风，用漆素淡，石头青苔，斗拱二分立柱，一派庄重气息，所以寺里香火很盛，人群拥挤。

奇怪的是，自从那一日起，对这两句话，我再也不能忘怀。好像正因只有两句，才是原则。河西山东，我常以它自警，思考自己对大陆上的各色百姓的态度，与他们交往相知。渐渐地，似乎带着这么一个心里原则，我不尽地描写内蒙古，默默地悼念遇罗克，从吐鲁番到西海固，经历了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幕一幕。直至今日，那墨汁淋漓的标语，依然满视野地挂在我的眼里。

而那天在京都的主课，西域文物的参观印象，却无影无踪，忘得精光。有过几次，同学朋友听说我不单看了大谷

藏品,还复印了尚未发表的资料,都羡慕不已。我结巴着说不清楚;解释是困难的,只那两个词就够绕人的。我忙说复印件我不要了,可以白给学兄。但是回家一翻,已经寻不见了。

确实,不论北亚西域,在求学路上,我算是歪歪地上了一条不务正业的岔道。已经很难再争取当好学生了。不论是敦煌还是哪儿,对那些世纪发现,我已经不愿顶礼膜拜。我眼中总映着那震撼我的墨迹巨牌,它虽遥远,有过淡漠,但已经不会磨灭。它已然不是日本语,总变幻影像。有时像浓稠的鲜血,淋漓不干,有时又像嘶哑的叫声,从心底朝我呼喊。

2000 年**4** 月

与草枯荣

窗外是如此颓败的一派风景，人也就再无意争夺辩论。关心更加私人化，常常只顾想着自己的喜爱。就这样心境日渐通达；天边身外的事情，就宛如摆在眼前一样。凝视着它们，觉得那么亲近。

一个念头浮起不散，大多有它的引子。

那个夏天在草原，在听说了钢嘎白音的死讯时，大概不觉间就悄然咽下了一粒种子。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怀上了这个念头。它在我的腹中久久醒着，提示着我，一次次目击平凡的生死。它陪伴我用三十年的注视，仔细观察了个民族肌体的自然代谢。

一

“钢嘎白音”的死讯，是在闲谈中偶尔听说的。为了躲开无聊的追踪纠缠，我已经把名字写成代号。此篇也一样：钢嘎即时髦，因为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六十年代　他也总是打扮得人马两帅。

洁净的蓝袍子，优美的长马杆，说话温文尔雅，他的外貌酷似在北大教过我的考古教授。我亲耳听他给假天真的女知识青年讲打马鬃（还是把蒙语的术语及转写从略吧）——他居然那么耐心地对着一位酸溜溜的女生，一嘴一个“马群剪头发”。

由于我插包的家庭的关系，我在草原上的年月，若说艾勒（邻居）这个词，不能不说到他家。他一直做我家的艾勒，因此我多少见识了游牧社会中的这一层结构。今天忆起，我能就乌珠穆沁的复杂性懂得一二了，但是当年我曾好久不能习惯：眼前这位大学教授，怎能是一位驰骋酷烈草原的马倌呢！

他已经死了。

他抱养的女儿，和我家的达莫琳同岁，虽不出众，但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他的妻子贤惠而能干，可惜因为她是牧主子女，所以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对她保持距离。而牧民们很迟钝，只觉得钢嘎家是贫牧成分，而且家里那女人“不会让人饿着”，所以对知识青年不插包住入他家，表示不解。

他是与我交往最多的牧民。因为总是艾勒的关系，邻里厮磨。放羊的我，经常坐在他老婆的牛粪箱上喝茶。这女人确实有一种道德，她用大碗给客人盛饭装茶。我是证人：我目击了住他家的瘸马倌，一连两年用一只大碗。而我，到蒙语自由些以后，就推辞掉了这撑得人肚子胀的美德。

我有一张题为“回故乡之路”的照片。画面上，茫茫草海一辙车路，有一辆轻便马车，在走向地平尽头，车旁伴着一骑马，与车无言地并排而行。那是一九八一年之夏，我正在重归阔别九年的草原。

记得长途班车到达了公社的镇子，我下了车，迎头正

巧遇到钢嘎白音。他照旧文雅地微笑，照旧遵行艾勒人的责任，问我：今天，是由他把我来了的消息带回去、我住下等家里牵马来接呢?还是立即坐他的小马车走。

我很高兴，为一切的丝毫未变，包括为他这副不变的绅士派头。

归心似箭的我决定搭他的车。画面上，赶车的少女是他的养女，车旁骑者就是他本人。也就在那一次，我发现他已病入膏肓。半路上他疼得一共两次突然下马，是胃疼呢还是肺病?最终也没搞清楚。我只记得那个靠着马脚，紧缩身子蹲着的痛苦姿势。我看着，看得难受。还记得他女儿说“阿伽，您坐吧，我来骑”；但他不睬。我猜他认为马车的颠簸更难忍。

虽然是我的重返故乡，但我只能一路默默，心潮起伏地越过了整个南部的草场。先到他家(病痛过去后，他立即恢复了绅士风度，再三邀请我在他家住一夜)，再骑上他的马，绕过满水的泰莱姆湖，回到我的旧毡包、小妹妹和绿色的夜。

第二次，刚回到草原，就听说了他的离世。我有些莫名的遗憾。他的事，在迅速地被人们遗忘着。只是由于反复追问，我才知道——不能自立的寡妻已经回娘家就食。财产么，自然就与妻兄水乳难分。远嫁的女儿如今在哪儿呢，似乎已说不清楚。

我第一次目击了一个毡包的消失。

这是一个家庭的消失呵，我被它的无情和真实震动，久久咀嚼着其中冰冷的滋味。草原毕竟是一种严峻和世界，男主人死了，包中的柱子就折断了。一个崩垮中的家庭就像一个水桶漏水，它无法制止，远比它被缝起时容易。草

原只承认实力，丝毫不为昔日风采惋惜。时髦马倌的事情于我是一个认识的开头；从此我便开始目击一代人的更迭换代，随着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

无论如何，与我的青春一起在同一块营盘上结伴并立过的、那钢嘎白音的齐整毡包已不复存在。后来才体会到，这无声的事实给了我一种刺激，

那次只是一次信号闪过。大自然的枯草期来了。

二

蓝家族（我又在起外号了）则是从政治到气质，对我们大队、对一群北京青年影响最深的一族。做为蒙古人他们显示着血脉的曲折，这个家族的男子，个个深目高鼻，身材伟岸。尤其是他们的眉眼传神——这在蒙古利亚种族是少见的，在中国则像熊猫一样稀有。一句话，他们宛如一群草地贵族。

他们是一个血统特别的家族。像《蒙古秘史》的启发一样，北亚游牧民的混血是丰富的。蓝家族的男子不怕穿上呆板的汉人制服。他们的优美来自骨架，来自比乌珠穆沁还不同的异质，宛如电影上的阿尔巴尼亚人。

这个家族的神奇老祖父，据说就和我们的下乡前后脚，仅仅在六十年代的早期去世。事隔三十年我特别想见到他，当然那不可能了。但是若能奢望那样的机会，我猜我能弄清许多大事。

老祖父是历史、是传奇、是上一代；而我只能对我目击的有所体会。

蓝家族的巴父，当年是远近的名人。他微笑着侧过脸瞟着你时,那神情活脱是一个西部片明星。现在回想,他属于最后一代靠传统技能著名的牧人。他的套马是一方的传奇。当年我们嘴里总是数落叨叨着：巴父如何能准准套住一只马耳朵半边马脸；如何被边防军用摩托车请去、长马杆子拖在一串汽油青烟后头；如何保持着把儿马套一个滚翻的记录、而且如何在老年的一次众目睽睽下还是把儿马套转了脸——吹牛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啊！那时忘了——他还是一位有思想的人。

由于时代的矛盾，当年我和巴父间的关系，也卷入了家族纠葛,以及讨厌的政治。似隐似现的隔阂持续着,直到我决心试试民办小学的时候。

那时我率领一群蒙古小孩,拾羊毛、种萝卜,并且下意识地不做同化帮凶——我刻钢版编了乡土教材，教蒙文。巴父的儿子巴，在那个时期忠实地追随了我，他是我紧紧依赖过的、最可靠的两三个蒙古小孩之一。

也许这个“汉人”和儿子的友谊,引起了父亲的思考。巴父在一次我回草原时表示：要和我深谈一次。我感到莫名的激动。我说:可以,我等着您。

但是除思想外，同时他还有更大的事——酗酒。从月初我回去,到第二个月初,他日以继夜地烂醉,一直醉了一个月。时而他跌撞歪斜，突然出现在谁家门口依着门框微笑,然后瘫软在地;时而纵马嘶吼,危险地把鞍子晃得忽左忽右,入魔发疯地驰过草原。一个月里不知他的去向。时而听说他在南边营子里昏睡，时而又听说他在几百里外的远方醉游。

直至离开那天我没有再见到他。

我必须回北京了。我的内心里对他依依不舍，因为我认真地盼着和他的“深谈”。我甚至奢想，这谈话将使我得到对我非常重要的、牧民的评论。但是没有；那次离别，也是我与他的永别。

蓝家族的其他几位阿尔巴尼亚美男子也都逝去了。他们去得无影无踪，就像草原上曾闪过的、那潇洒**慓**悍的姿态一样。

今年则更是遗憾。暑假里我带着女儿回草原，人很累，所以罕见地不愿多串门。而巴父的儿子巴——他实在住得太远了。犹豫几度，最终我还是没去他家玩。因此也就失去了最后探询他父亲的心声、他家族的真实的机会。

草海里的一个无名家族，虽然它的成员有些逝去有些活着，但是归根结底，它主导一块草原、赢得权力和荣耀的历史结束了。

后来我多次回来。人们已经对我使用这样的句子：“还记得咱们这儿过去有过一个蓝家族吗？……”每逢回到这片萋萋芳草，看着草潮的荡动，我就想：逝去了的，真的就是一去不返了。

三

大阿伽和我的关系可是非常深厚。他有二十年马倌的光辉履历，在我们的大队，他是首席牧人、慈祥老者、无字书等一切形象的集合。当然友谊是有缘头的，主要的原因是：他是我的朋友、同班同学唐的义父。所以，在漫长的插队史中，大阿伽，自然也就与我有了一种类似叔伯的关

系。

九七年么或者九六，那次我去公社（早就改称“苏木”了。但我不习惯，而且苏木一词不一定是蒙语）看他，找了好久，才发现大阿伽慢慢悠悠地，迈着牧马人的罗圈步，从新修的庙门走出来。我大喊：阿、伽——！然后随他参观了新庙。

庙里都是陌生人。有个别小喇嘛神情不太友好。当然他们不知道一九八一年恢复此庙时，他们的“格斯盖”（高级的喇嘛职务，我也不懂详细——也是我们队牧民）曾专门找到我，要求我帮助。虽然格斯盖已经死了，但我依然是大阿伽的旧日“牧友”，所以我当然有特权参观。

阿伽对他们说的话是：“这不是随便来的一个人，过去我们总是一块，我们一块放过牲畜，我们过去一块——”我听得很快乐。哈，“我们一块”，真是最棒的介绍！

接着看庙。在彩画一新的庙里合影。

庙的正庭中央，有一座白塔。我问道：“阿伽，这塔里有什么呢？”阿伽微笑着回答：“这里面，有佛。”不知为什么，我听了非常感动。

然后去家里喝茶。

他住在新庙旁边，可能我们以前也来过的那片泥屋巷子里。一盘干净的土炕，拐了一个直角，几乎占满了屋里全部空间。他的草地上的毡包早已收起；以后用或不用，要看一个小独孙子。这孙儿半大身材，条纹体恤衫，俨然一个现代小伙。初对面，他对我不知该尊敬还是该挑衅，不时地在旁边瞟着。

早就听到了阿伽当喇嘛的传闻，但传说是含糊的。

“阿伽算什么喇嘛！他就是随着喇嘛们，就是一块坐

坐!”哥哥说。

“那么阿伽也有那种红的紫的，穿的东西吗?”我不会用蒙语说袈裟。

但是盘腿坐上阿伽的泥炕，端起茶碗，话就变得容易谈了。我小口喝着,望着他。比起我们一块谈论牧草马经的当年,他消瘦而垂老了。话题既然是庙和喇嘛,他依旧像以前那样，和蔼地给我讲解。真的，除了与我们的智识阶级，与一位蒙古老牧民讨论人的信仰,是容易的。

他刚从林西看病回来，表情轻松 自信。“病么，就不想再看它啦。若喝药,以后只喝些蒙药吧!”

这不是一句随口的话。老人们都这么说。

谈及关键的牲畜,他告诉我:有百十来头羊,交给亲戚和女婿了。若要吃肉他们会送来。旧的蒙古包还很结实,他们需要随时可以用。阿伽嘛,就住暖和的土房子啦。

确认了我在这间小泥屋里的地位以后，那半大小子端正了礼性，双手捧来茶碗。我拿出长辈的神态，随便接过，顺手放下,并不停住和阿伽的谈话。

斟酌词汇是最要紧的。我害怕说错,挑着词儿,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在庙里,在喇嘛的数里,有阿伽吗?”

“是的,阿伽嘛,也在喇嘛的数里。”

奇怪的是,他完全重复了我的词汇。一刹那,我发觉随着这么一句话，阿伽的神情里浮起一种满足。这神情在他衰老的脸庞上，化成了不可形容的慈祥。比我们二十多岁时,比我们还一股孩子气时,还要显得慈祥。

我觉得新奇，更莫名地感动。由于在北京已经送过老人，凝视着这张消瘦的脸我心里明白：阿伽的日子不多了。

人称大阿伽的他，逝世于次年。

四

还有一些逝者，几乎和我没有过交往。但也许比起上述的朋友，他们的辞世更使我难过。他们是被划分为敌人阶级的人，地位在人与非人之间。知识青年似乎天然就对他们敌视，自然不会称兄道弟、认父认母。

她是一个“富牧”的女儿，年纪可能比我们稍大一些。

富牧就是农区的富农，今天说起来这个词，依然有恐怖的感觉。在提倡“实事求是”的时代里，她家曾经有多么富呢？一百来匹马，二百来只羊。不管比起今天的哪个牧民，都寒酸得令人发笑！当然还有“剥削”；她作孽的父亲使过牧工。

我还记得，我们把一个失意的下台干部秘密请来，关上门，给他吃香喷喷的小米饭羊肉汤。让他挨着个地，把队里的四类分子细细讲了一遍。

特别记得下台干部讲的、她父亲的故事：对于外来而且年轻的我们，那些传说是陌生的：由于一场风，改变了人的阶级。据说，那场罕见的白毛风可怕极了，它铺天盖地而来，草原上牲畜死亡大半。她家原来可能更富一些，因为那场风雪，家境一蹶不振。因此划分阶级时，被划成了富牧。

也就是说，她还可能遇上更大的悲剧。

一连几年，我总是扭头看见侧面、或者侧后方，看见她卑下地低着头、弯着腰，在泥水堆、在仓库、在打井盖房的工地，抱着石头，拄着镐头。她总是穿着一件泥点斑污的旧

袍子,见了人就赶紧地躲闪着让路。

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她的身材，说实话，我再也没见过这么苗条的女人。草地严冬人穿厚羊皮德勒；我们都笨重得爬不上马背;而她裹着厚羊皮还那么纤细。

走马经过她和一群牧主干活的棚圈时，我斜瞟着看过她。也许是因为那时我太年轻见识少；但确实只有她的形影,至今使我记着。我甚至觉得,女人身材的极致,就是那种包在大厚羊皮袍里的苗条。

人无论谁,都可以训斥她一顿。除了大队的劳务,谁都可以支使她和牧主们给自家干点私活。我猜谁若想把她当女人使用一下,更会是一件安全的小事。几年里,她就一直在草原的另一角,弯曲着腰蹒跚走着,卑微低贱地躲让着,抱着要缝的破烂毡子,铲着沉重的草拌泥巴。

不过运气晚晚地来了。

她被一位有权势的贫牧人物看中了。唉，谁会看不中呢?只是那男人有本事应付当时的舆论。再说,那种草原社会的舆论,怕更多正是由他们制造的。

大约在七三年或七四年，她终于成了一座插着红旗的蒙古包的主妇。但那时我已离开草原上学,喜剧的几幕,我没有看到。

听说，就在前几年，有一个冬天的早晨，她推开包门，走过南边的灰堆，蹲下来解手。就那样蹲着，再也没有起来。

我依然是听嫂子讲的，只是讲别的事的时候顺便带了一句。嫂子快人快语,讲什么都随心所欲,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

我也没有多问，只觉得 自己悄悄松了一口气。一个念头闪过心间——她总算走了。她离开了这个残忍地折磨了她、又给了她一个体面结尾的世界。

老人们都死啦——现在这是句挂在嘴上的话。

但她不是老人。嫂子的话唤起了一个一直醒着的意识。听着她的死讯，我心里非常不平静。命运的拨弄还算是慈悲，最终没有安排我“看杀”了她。但我曾冷漠地看着她的受难，也许那比死更可怕。

为死者反省么?他们不需要。

应该说，我是在很久之后，特别是在——自己也逐渐变为被歧视与被敌视的一群的成员以后——才渐渐懂得：在我们的文化里，当一部分人遭受着残酷的歧视或践踏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的他人——条件反射般的举动是：或者有意无意地参与加害;或者按时吃饭睡觉，心安理得。

她如牧草一般，绿了一场又悄然枯折了。她不会喜欢假惺惺的忏悔，因为人道的考验，每天都同样尖锐。其实就在你我身旁，每时都有女性的呼救。我不参加忏悔大师们的比赛。我只想说，我没有再向人间的不平沉默。

五

二〇〇〇年并非什么恶心的千禧年。在亘古游牧的草原，它只是十二生肖循环的一个龙年。对穆斯林而言，它不过是一个与流年并无二致的年头，一四二〇年。这个夏天于我也没有任何改变。

但听人大声喊叫说：都炒千禧年呢！今年文人们都伸

手“异文化”呢!

我没有出声。

文人无行,不足为训。分道扬镳已经很久,我早忘了寻章问句、小说构思。这一年,我依旧——留意着他人的苦痛而生活。在这种被我逐次认定的方式中,坚持久了,我发觉自己见识的,是种种健康的文明。哪怕这些文明的邻人举步维艰,遭受歧视,哪怕他们在默默生死,他们启示才是无限的。

老者,女性,异类,若想写下去还可以写孩子的夭折。

但我想已经可以搁笔,因为毕竟不是要展示什么。关于孩子么,虽然写得不好,以前有过一篇《又是春天》。

他们是游牧民族。没有兴趣老了就进入“药腌的生活”,更不愿意被大夫判个“无期治疗”的苦刑。病到某个程度以后,他们大都回家,余下的事托给上苍,不声张,不打搅人地、平和地逝去。

过去我看尽了他们的生存。以后,已经该注视他们的衰亡么?

我悄悄地对自己喊道:你不是在半生里,多次写过、一生向往做牧人的养子么?那么就像牧民一样,放弃此界的话语,和青草交谈吧!像抚育了你气质的草原牧人一样,随春日而蓬勃,遇冬雪而离别吧!

我喜欢在夕阳斜射的草中散步。

这习惯传染了蒙古哥哥。每天我俩都信步一圈。漫步着我俩聊个不休。我感觉胸中语言丰富。拥有语言之后,人的感觉真幸福。开个玩笑:我倒盼着哪一天人类完全不能对话。那时我就美啦,我可以自由放浪于我的乔布格、汗乌

拉,我可以和埋在每一株牧草下的灵魂谈话。

起风了。

在乔布格的牧场和营地上，从远方锡林河方向一直到背后的敖包山，次第漾起了一道道牧草的大潮。就像是熟悉我的一些灵魂,依次地前来与我问好。

2000 年**11** 月

高贵的精神

一

这确实不易描述。困难不仅在于因缺乏体验导致的倾听困难,而在于人的气质离得太远。从取道到语言,传递是困难的。

是关于高贵的话题么?也可能它更接近“尊严”。反正这个范畴包含着一批汉语词汇,但是似乎个个都语感不足。

汉语特殊而丰富。或许是由于词汇富足得溢出,反而导致了分量的减弱?不知道。我经常体会到汉语的美感;但我也时时觉察到,似乎它存在着一种分量的平均化。

我需要一个——它处用则不宜、此处一字如钉的语词。哪个汉语单词最能传达这些含义呢?

是高贵?尊严?贵族气度?上品的资质?是不可冒犯的习惯?是一种天性中的优越感?

我选不出。没准,在这一类语词里,外语的选择会比中

文好些。就像街上的老外，无论黑白，他们大步走来，表情明朗，眼睛直视。一般说来，比起东方来，他们不那么费猜和暧昧。

是愤怒的权利么？

不，最醒目的、穷国小民和列强国民的区别，往往是愤怒的表现权。我们经常看到列强的公民在签证处、在宾馆和飞机场、在一切服务业的前沿地带，大发雷霆大光其火。

而穷人不能那样。除非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穷人轮上浩劫也过上节日，那时可以表达愤怒，甚至可以恣情发泄。但是在平日里，穷人总是考虑退路，考虑不成之后的次之、再次之和最恶的可能。穷人不发怒。

是拒绝的勇气么？

在这个文化里，我们有拒绝的古典，罗列着一个个绝对的例子。许由对王位禅让的拒绝，陶渊明对五斗米俸禄的拒绝，关云长对上马金下马银的拒绝……只是，拒绝的人早已牺牲。面对不洁的利益，安享的人青春不误，购车置屋，成了人们艳羡的标的。——民族的精神，就是如此地分裂着。

或者，是歧视和自尊的矛盾么？满街的外省工人潮水般涌入城市，就如外籍打工者涌入美国和日本。北京话本来粗糙；居然还让“谢绝河南人”等标语贴满电杆。在白纸黑字的证明之下，歧视的癌，正在蔓延。

但我观察的，只是河南或哪里的打工者。

腐败的权贵不足为训。对我来说，惟底层如蚁的小民，惟他们的自尊与否，才有巨大的意义。

谁会为我们解说？饱暖或餍足是不够的，富裕或财富是不够的——确实还存在更高的形式。确实还存在这样的

问题：在活下去的同时，怎样做才能保住生的尊严；微渺的流水日子，怎样过才算有过生的高贵。

这是很暧昧的事；人的生存可以奢富至极，也可能穷窘潦倒，但在形容不出可是看得见的地方，有着一条不容侵犯的界限。

依然是一个精神的，关于人的气质的话题。

仍然是争论各方都无视的、民族精神的高贵与否的问题。是的，就是它，它比经济大势、比是非成败，更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二

如今议论这些使人害臊。喘息挣扎在黏稠的人群，你自己先觉察到不合时宜。如今人只有在撒谎时才偶尔提及正义。如落后的标志、如墙上剥落的旧标语般的正义，正静静地被罚在一边。每一个路人瞟过的眼神，都含着一丝嘲意。时代已经改变，没有谁对它顶礼，也没有多少人为它守节。

更高的标准在别处；传说在那儿，有社会进步的方向。

从研究院到讨论会，从杂志到电视，从精英到蠹虫，从感觉到语言——这些地方都是当今智识阶级抢占的滩头。不仅在西方中心获得了理解，它们还正被渲染成第三世界的声音。

F·法农说，殖民地奴才喜欢偷窥主人的街区，他们的梦想就是拥有。真是如此。翻翻书，若干年来，中国文人不

过一直在絮叨着如此的奴才梦。他们反复地写：我仇恨因为我没拥有，我伟大地拥有了，我甚至拥有主子的老婆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奇迹?为什么还不给我诺贝尔奖?

所谓高贵，就是不能忍受这种天一热就孪生的、苍蝇老鼠的道路。哪怕它接着轨，是全球化的道路。只要有一丝气在，人就不与苍蝇为伍。今天仍有这样的人，他们轻蔑地听着鼎沸人声，拒绝与这一边同路。

不平比比皆是，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大家虽然都喊叫着看见了，可就是不做动作。由于油滑，更由于压力和民族传统的教育。偶尔跳到街头的抗议，往往是滑稽的。慢慢地，大家都毕了业，学会了看客的轻松姿势。

所谓高贵的人，他们的怀里并没有多一把刀。他们的特殊之处，不过就是从卑鄙的旁观中愤怒地跳了出来，如电子街头的石秀。

高贵不仅是天性，也是修养的结果。本质的行走，会督促途中愈来愈认真的求学。像刀刃的蘸钢和打磨，刀的质地，要求摒绝浮躁和单薄。

这不是小说中伪造的贵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同样，对遇罗克的忏悔，也决非干净的回想录，而是接续他与特权主义的对峙。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环而已)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高贵的精神所以难得，是因为在获得高贵认可的同时，人还必须承担责任。是的，在我们这个族群，在这个黄色的如巨流之浩荡的群众里，最难求的品格就是承担责任。

正因此不避难的谭嗣同才被怀念不已。奢谈什么大任于斯，人不一定就命定着——哪怕一**抔**一握的事业。并非什么机遇难逢，多数人都回避了——该他完成的那一件事。只剩下了谭嗣同;他们是百年一现的高贵之化身,不避一己的流血流言。他们注定要为历史承担责任。于是历史为之剧化,时代的巨钟,被一头撞响了。

三

街上流行什么?考据派利用资料、留洋、图书、圈子——所有都市的条件，用权威的口气为现实提供证据。海派则——他们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到田野去呀，去发现百姓的秘密!

考据派和海派，都有着时髦的八十老者、贴“导师”标签的中年、如贼一般时刻窥探利害的新人。他们已是多层次、多学科的挖掘梯队，举着铲子镐头，对着文化的矿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他们的讲解尤其恬不知耻。他们是新潮的特种部队，比美国电影的野战排还要凶恶。野战排不过杀人而已,他们却侵犯民众的内心!

还有另外的种种。

如 **F**·法农讽刺的，我们还看惯了——在帝国母鸡的院子里，“文化会议的桌子上，大讲着西欧价值的特殊及丰富。”这种桌子比法庭还具裁判的权威。中国的知识人的小算盘是：你尽可吹嘘你的价值高，而我要在这价钱更高的讲坛,宣传我的存货,它也特殊而丰富。我要强调:我正在为诗而受难,我已经有家难归,所以才漂泊在西欧北美!

在荒凉的此岸，在穷苦的故国，在真的苦难和诗共存的现场，牺牲已不知祭献了多少回，民众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事。已经不知有多少——使青年和民众激动的诗，流行过，又消失，再出现——扮演英雄的诗人不敢说：在穷而无言的故国，诗从来没有绝迹。

生存永远比表演更难。在中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件尊严和高贵的行为。

当我也一只脚踩在那边，当我也坐在那些“文化桌子”边的时候，我看见了——伪装的苦难。我暗暗惊愕，终于不能忍住恶心，我拔回了自己的那只脚。不，连苦难都可以当做化妆，还谈什么高贵。

中国的文学和学术，它们的气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历史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富足和教养属于少数买办。在全新时代，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有生存的规矩，在这条边界上无道德可言。自然，也没有留给高贵的精神多少余裕。

偏偏中国孔夫子又特别指出，要“行己知耻”。一年年地，见的多了，我总觉得孔圣人的这条遗训，简直是对中华文明的讽刺。太久了，在漫长的淘刷之后，已经不能追究——“无耻”的起源。

四

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现在不管我怎么躲闪，不管我怎么化妆，人们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见，到处有人揭发我“危险的”胡人本质。

无奈体验的件件事情，大多只是一些象征。议论的深浅，手段的下流，都不足为道。我们不过想摸索——文明在危难时的姿态，不过想寻找——第三世界的、高贵的文化表达方式。虽然它只像一丝沙漠中的声音，掠耳消逝了——它曾带着我们，向着一种人的理想跋涉过。何况还有具体的努力，它们也并非那么不具意味——我们对自己设定了的原则，实行了知识分子的自律。在他们醉生梦死时，我们在探究文明的阐释权，在尽力学习多种专业知识。目的是一种吃语么，我们企图打破——书斋学术对文明主人的话语压迫。如同一群步行的吉河德，虽然连瘦马和名号都没有，赤着手，缺乏一支锈矛，但我们幻想着大战风车。

鲁迅的一句不相干的话像个谶语：胡风鲠直。一条鱼似的，那骨头其实根本不能和强权一碰，却偏偏天生笔直且刺人。欧洲人爱学孔雀，总炫耀自己的上品高贵。可是，身在中国，人就不能逃出悖论：鱼骨头也是高贵的吗？

可能对每个不同的人，所谓高贵和责任都将有所不同。也许做为基本气质的高贵精神，在中国已然变成了幽灵。它徘徊不定，若有若无，跳闪在路左路右，不知愿意为谁显现，也不知它究竟会显现几分。

但我又感到——只有沦为中国人，才能感到的尊严。如果我不仅敢于走完独木桥，而且敢于只说一种“桌子”那边听不见的、自己的话。

是的，本质的两侧，隔着一套语言。语言如火焰熊熊的大海，浓烈而灼人。当取道的决意下定以后，语言就如涌泉出，给人以洗礼般的新鲜和快意。

那一侧，是百年的优势语言，西方精英心领神会的语言。所以,也是通俗的语言——说到底,它使人失去精神的独立。而这一边呢,不过是些心里话。

我眺望着语言,久久陷在难言的感动里。

骑着 自行车我倒腾着新到的邮件。我喜欢在这样的顺路上解决邮件问题。慢慢的边走边看，在一个个垃圾筒旁停住。先扔掉不用拆开的无聊邮件，再扔掉浏览过的杂志。然后一封封把信看完，随手留下要回复的，其余的扔掉。到家后,我马上处理掉那几页回信。

剩在案头的是要藏好 留存的信——虽有多少的例外，但差不多每一次，宝贝般收好的，都是些甘青新、西海固、老蒙古。昨天我忍不住在 自行车上笑了起来，这回的来信居然满纸波斯国的蝌蚪文,讨论苏菲诗歌里"dilbar（单数）/dilbaran（复数）"、也就是"情人和恋人"的区别。

不,我已经不打算 自救。回忆着我微型的语言史,我庆幸 自己被恩惠的往事，庆幸 自己危险的倾倒。我不由笑了。读着,与人讨论着神秘的诗句,满纸抄着波斯或维吾尔的 dilbar、dilbaran,我窥见了自己的倾向。

时至如今我已经可以 自信了：不管过得多么荒唐，我只会忠于 自己的气质。无论是做为文章的我，还是做为人的我。

处理一己是容易的。而大家的问题,则是大家共有的。没有任何必要杞人忧天，一切都遵循神秘的规律。高贵的遗产,或许已经湮没了,高贵的未来,也许还刚刚在新生。

1999 年 8 月

一页的翻过

二十年多前，有一次曾经未加思索地写道，游牧草原的循环不已的历史，“也许要翻向它的最后一页了。”

这么感觉的原因，是由于那时开始出现了定居，虽然只是草拌泥房子的定居。而且，一年中迁徙的次数在减少。此外迹象还有很多，比如，一直成为大草原形象的木轮子勒勒车，有被工业生产的铁筋车取代的可能。

而今天，这“最后的一页”已经掀得雷鸣风吼。它破坏着，替代着，唆使着，蔓延着，带着粗俗而生气勃勃的欢叫，恣情地在延续了十数个世纪的旧营盘上摧枯拉朽。

何止八瓣轱辘的自制木车，连轻便铁筋车也几被废置。草原的交通与驮载，正在被拖拉机和客货吉普车所替换。越冬、春羔、驻夏，加上秋季追逐草籽和营养的频繁走场迁徙，已经变成了一座砖房和一座毡房的基本定居。热乎的火炕，夹墙后的啤酒，使年轻人不愿动荡地搬家。都市里时髦的话题——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首先在一座座砖房周围开始了。

嘉陵、铃木，一辆辆摩托在嘟嘟穿梭。马群里的乘马发肥，赛会上难得挑出善奔的骏马了。而且三年两年不骑，驯

马暴烈难御,还原成了“生个子马”。牛则几乎都是生个子;女人们缺乏驯顺的牛去拉车打水,从百步之外的水井打一缸水,居然要男人启动柴油拖拉机,一路黑烟地兴师动众。确实,女无乘车男缺坐骑的问题,牧人不愿意骑马的问题,破天荒地出现了。

Motar 是什么意思?**taisen** 是什么意思?还有**yidang**、**erdang**、**lieji**,听不懂的都是借词。它们分别是摩托、铁丝网、一档、二档、离合器,随潮水般的汉语借词涌入草地。加上啤酒瓶子,三轮货郎,盲流小偷,运牛车装修队,如今奔向乌珠穆沁草原的一切,使人目不暇接心慌意乱。

雇工即“使人”已非常普遍,而这个词曾被译成“剥削”。新页才掀开一角,就已经淘汰了第一批牺牲者;由于懒惰、病死、继承无人等原因,熟识的家族系谱中已经消失不止一家。当然相应的是迅速富裕起来的家庭,政府奖励了一个铜牌挂在哈纳墙上,上面刻着“小康户”。蒙文一侧读着让人忍俊不禁:这个词在六十年代译成“上中牧(农)”。

政治的社会秩序忽喇喇地坍塌了。当年被阶级划分理论打入凄惨底层的人,那些牧主和富牧子弟,今天不仅多是富裕人家,而且心思已在荣誉——比如热衷赛会的夺标。讽刺的是,当年的贫协主席又率先沦为贫困户;在吃光了最后一只羊以后,他和他的家庭都消失了。有人说他已去世,有人说他儿子正在某地当雇工。我听得目瞪口呆,不知其中的深意是什么。

如今牧民养狗,盼着狗真的敢开牙咬人。草原上日益增添的喧嚣和络绎往来的小贩浪人,使牧民不知怎么过日子了。一层毡的蒙古包,不可能装防盗门,它只被一根皮条

额去和她[illegible]个儿子。

1981年，[illegible]。

随便拴住。这扇门的文化,需要一种对传统的默契。闯入者使他们紧张。

活动半径缩小了,游牧被铁丝网圈定在自家十里方圆的草场。偏偏地球变暖,雨水稀少,羊毛跌价,草地沙化,因受益于最初的改革政策而骤然富起来的牧民,因经营和运气在后来岁月里败北的牧民,感到缺乏判断明天的经验,感到自己的无力。

于是人心向神明聚集,处处是新堆起的敖包。著名的大敖包祭会,如今是年中最要紧的行事。小敖包则密不可数;在自家领地制高的山顶,在大路或辙印的当途,在逝者指引过的地点。敖包(**abō**),这个在蒙古学术中经久地被人讨论不已的名词和现象,或许只是在今日才闪现出一点它的本意。

诗人纳楚克道尔吉有名篇叫做《**Mini nutug**》(我的家乡),这个词也被我反复学习过。它兼有营盘、家乡、草原、祖国几重含义。而今天 **nutug** 一词的语感多了对私有的强调,并且愈来愈频繁地指向草场承包以后,用铁丝网围住的那一小块"地盘"。

以上种种都是观察的视角,慢慢写来不忙;惟有环境的事,确实紧急:

前年回草原时,以前羊群珠散草海的风景,被挖上了疮疤似的黑窟窿。原来是承包了这片草原的一支采矿队,挖开青草,开出一个个采铜的土矿坑。采矿坑或是矩形的探槽,深数米;或是坑道,深不可测。

以前,牧民们讲述四周地名的时候,说到奥由特(**oyotu**),总是带着神秘的语气。"有翡翠的地方",它既是牧民的古老家乡,也是我插队的最初营地,听着我自然也很

喜欢这个地名。谁知古老地名是一种原罪，因为它招灾酿祸，引人入室，天生就是破坏安宁和自然的情报。

马驹在矿坑里摔断腿，掉队的羊被人盗走。前年发现，牧民兄嫂的神经已经失衡，我也目击了游荡成群的闲汉，夜间轰鸣的载重卡车。黑洞愈挖愈多，南边山坡一片疮痍。采矿队每天用大拖拉机运水，水井几近干涸，在水草丰足的乌珠穆沁罕见的水纠纷，终于出现了。争执时一片混乱，各自嚷着对方听不懂的语言。家家的狗都晕了，不知该叫该咬。草原上甚至奔着两三头猪；这使牧民的小儿们大感新鲜，舞着马竿子追逐。去年夏天再回草原，牧民兄嫂更加憔悴了，他们求救般地望着我，不知所措。

在都市里，我们习惯了不安的生存。换言之，我们习惯了日复一日在可怕的喧嚣中，让双耳渐渐失聪，让眼球终日充血，让心被扯出一根线，川流不息地抽丝失血。我们在大都市里，以憔悴换回存活，忘了安宁也是自己的权利。

而北方的大草原则不同。那里静谧得——据说能听见四十里外的一只獭子咳嗽。草海的潮动能吞吸近在咫尺的声音，所以经常是当汽车一直开到鼻子下头，才被人听见。

原来养牧五畜的游牧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费几千年时间渐渐凝结了自己的传统。他们享有几十里空阔的前庭，又枕靠同样几十里空阔的腹地。所以视野里任何一星人影都为他们了解，知道那是谁家的老人寻马找牛；同样哪怕夜深时分的一声响动也能为他们判断，会意到那是某某趁月色运草。

环境的巨变，安宁的打破，不仅是对一种千年未改的古老心理的压力，也是对一种特殊能力的破坏——牧民们

对 自己不能判断感到慌乱。无力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

总之，享有纯粹而悠久的安宁，也许是游牧民的一项奢侈。虽然愈是比较都市,愈感到它才是人的基本权利。不管怎样,安宁被打破了。

一连三年，每个夏季我都返回乌珠穆沁的草原，为的是在渴望的安静里休息身心；没想到，却看够了历史翻页的实相。

一年的富裕使我惊奇而满足。第二年门口就出现了闯入者;对来串门的采矿队,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叨叨些保护草场,心里却满是烦恼。我的安宁也被毁了,千里迢迢地，来看破坏植被。第三年牧民兄嫂要求我立刻去为他们上诉官员,他们已经急得乱了方寸。

窥见了历史的翻页，究竟是一种收获呢，还是一种痛苦?

游牧社会的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它曾经内里丰富无所不包。无论拉水的牛比赛的马，讲起来都是一本经，套套解数娓娓动人。无论语言的体系或一个单词的色彩,分析到底都会现出真理,闪起朴素的光辉。在如此世界里,男女老幼生死悲欢,无不存在得生动感人。它深藏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一些人的基本问题。

若是培养它的环境存在，它就存在。反之它会逐步消失。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决定要改变这个环境。尽管世界上还有各大牧区，牧养（而不是厩养）的文化还在继续；但是，如乌珠穆沁那样的，相对纯粹的游牧文化类型，过去就曾经罕见,今后更临近终结。

随着一种强力的推动，在人对富足与舒适的追求之中，在对青草和对人的侵犯之中，机械人声轰鸣噪杂，历史在以旧换新。

2000 年4 月再改

双 联 璧

——读张治中序马良骏著《考证回教历史》

一

这本书到手的时候，我已经对马良骏阿訇神驰心往，想象许久了。那几年，只要我一脚跨入甘肃南部，就不禁默默地思索他的事。他背过身一去不返的家乡——张家川上磨乡的风景，就平铺在我的视野里，青山绿水的长条梯田，包裹着庄子，像一幅黄绿模糊的淡彩画。

不用说，若是赶上一个光阴，他会破例接纳我这五功不勤的瞎汉，一如在他以后，在西海固，在甘青新一样。

他不单是个念经阿訇，而且是罕见的文人。那时候我弄不到这本《考证回教历史》，仅仅见过他翻译的《穆罕麦斯》。瞎汉藏经，我也留着一册。赠书的是川里弟的老父亲，译文是经堂语，滋味纯正且幽玄，最受苏菲家的喜爱。

怀着与古人交谈的一种奢想，那时我长久地伫立过。何止马良骏，整个张家川已没有他的族人。我感到人的不能尽意，站在山梁边，只有让一对眸子享受。

二

如今这本使我好奇的书，已经拿在我的手里。惊奇才刚开始：因为开卷读到的，竟然是一对琢磨剔透的玉璧：先是张治中将军的序，后是马良骏阿訇的书。头一次开卷的时候，我对张治中能写出些什么，心里微有保留。说实在话，在我的这一代光阴里，教授也好专家也罢，凡民间最紧要的东西，他们常常一问三不知。在中国知识人受教育的过程中，自古是小树苗灌醋不灌水。以后学而优则仕，当官的知识体系里，自然是天生就少长了这几根筋。

而张治中将军不然。翻开序，读进去，一种太罕见所以使人感动的文字，一种端庄、精确、真挚的文笔，悄然抓住了我。

读下去，突然觉得振聋发聩的震动，读了几遍仍然不能相信；咀嚼几过，仍无法摆脱被震撼的感觉。张治中写道：

> 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的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

自一九八四年岁末初进大西北，我从未见过回教著述的任何一处，有过如此绝妙的概括。理解要等到第二次，那是在乌鲁木齐的八户地。我和一位阿訇议论起此事，他猜测地说，这话"大概就是那段阿叶提"。我要求立即查找。找到时，我更吃惊了。

张治中写的这句话，是一个普通的阿叶提（《古兰经》句），在经的二五章 63 节。只是这一句翻译，超过了一个世纪十五个译本的苦心劳作。我激动得简直喊起来：这一句译的，水平高过了十五本！为什么你们当阿訇的就找不出这个译法？……

视野里莽莽苍苍铺展的，是陇东的一角，惊人的地相。隔着深壑又近在眼前的，是一条条老虎腿般的山梁。如此将军，早已久违隔世了。我的脑海中，联想到淞沪抗战和他主政新疆的经历，想到大时代里，人的波澜生涯。四野无声。无限的山地平塬，居然就这么无情地断成了道道深沟，让人咫尺难近。

张治中将军对于伊斯兰教的了解和描述，无疑依仗着马良骏的经典和解释。穆民世界的真实，于是获得了有识之士的证明。两者相互的善意和水平，成全了一个美谈。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对晶莹的玉璧；以一个共同的举意，以两个深厚的功底，他们完成了对伊斯兰教的出色释义。

隔了一年在宁夏黑铁峡，和另一个阿訇又谈起此书。他说："一个赛俩目，你看机密有多么大！……"是的，张序的功力，只在新译了一句话；而一句翻译的核心，又只是一个词。这个词，**Al－salam**，其实穆斯林天天都把它挂在嘴上，只不过，惟有在马良骏的判断和经文支撑下，张治中将军把它译为"和平"。

日后要再花费多少时光，人们才能体会这千钧一字的感觉呢——和平的宗教，和平的教义！

三

骑耕牛,过关山,大营扎在了上磨川——

是谁曾唱过这一段民谣?

此刻,我脚下山谷里的深沟,就一直弯弯地绕着,通到对面的上磨川。人称小马阿訇的马良骏,故乡就在这里。历史课,原来最好不是在北大,而是面对着山野和古人,慢慢地咀嚼吮吸,揣摩他们的隔世心事。

当年在这道川里,仗着自己的乃夫思(生性)一蹦子跑到新疆的哲合忍耶小马,后来做的可大发了。是他代表全新疆的回教,电贺的新中国成立。知道么?毛选五卷里,还收着一篇毛主席专门写给他的回电。满拉们在山道上歇息的时候,先耍上一阵,喝足泉水,然后给我指点上磨的位置。

其实,这一本回教史体例罕见。它先用半部篇幅,解明了回回和卡费尔,以及乃夫思与伊玛尼这么两对概念。然后博采阿文"塔勒赫"(历史)与汉文古典,简练至极地勾勒了一个穆斯林世界简史。

人们说,他的乃夫思(脾性)没有压下,闹了气,跺跺脚走了新疆。走了新疆又恋着上磨,所以他给经堂翻译了《穆罕麦斯》。为着夜晚时分,悠扬地跟上调门,遥遥和家乡唱和呼应。人与人就是不一样,灵性的乃夫思,是天生的前定。他的译笔,不是蚊蝇之辈的小玩艺,他满心的重负一旦成书,便从西到东,被半个中国到处念诵。

我总发生幻视,总好像看到他在默默坐静。我悄猜想,他还有心事没有成全。那是家乡么?小马再也没有回家。他的事业和灵魂,都留在了新疆。他们是志在远方大学的阿林,不是一生纠缠乡土的农民。那是什么呢?

就这样,在几年的咂吮旧事里,在独自的体会中,我仿佛随着他当了一回陕西大寺的满拉。这种感觉奇特又新鲜,使我暗怀着欢喜。瞎汉半道当满拉,经不好,凭参悟。我从伊犁城到天水城,从上磨川到张家川,心里总细细地想这件事。

忘了究竟是在烟锅峡还是在黑铁峡,反正在黄河的一处庄户,我和几个弟弟闲聊。谈话间提到了“乃夫思”的含义,大家说,在这一带说起这个词,大致还是贬义的。乃夫思一字常与海哇连用,专指人的坏脾气。然而这个词也带着更重要的褒义:乃夫思指人的天性;人的精神意气、尊严气质、性格人品,也都在乃夫思的范畴里。

确实,张序是百年不遇的慧眼之作。但阿訇的究里,也有将军难以洞知的层位。我执犟地感到——在马良骏的深处,他追求阐明一个乃夫思的道理。

我想,马良骏在回答自上磨庄的时候就遇到的乃夫思问题。比起回民社会常见的解释,他剖析的乃夫思涵盖要大得多。一己的乃夫思;所谓闹脾气、没修养,并不能与伟大的生命的真性相比;不能与造物主给予生命(乃夫思)以信仰(伊玛尼)后,那精神的赋性相提并比。

西北把没有十年寒窗念过经的人,戏称做瞎汉(文盲)。对这样的哲学概念,毕竟一介瞎汉,不敢浪加解释。所以好几年里,我到处和圣职人士讨论求教。

后来有机会作客在马良骏后人的家里。终于找到了这

里，我想着，对他的次子，提了一个又一个想了多年、已经发酵的问题。

“二师傅，您参悟——他老人家为甚么写了那么多的乃夫思呢？”

二师傅一手举起筷子：“吃菜，吃菜沙！”

也许是不知客人根底，主人不愿细谈。我在多少觉得突兀的同时，也觉悟到，这深沉的命题，已经不能再探究了。那饭菜非常丰盛，我吃着，满心惆怅的滋味。宝贵的机会，在马良骏的家族里确认本意的机会，与我交臂而去了。

四

细细读了张治中回忆录，不由得暗自做着比较。显然，他的处境诸般不便，结集的作品，固然是宝贵的文献；但就见识就文采而言，大都不能说超过这一篇。

从英勇地投入淞沪战场，与日本侵略军几万兵力血战，到重庆谈判，把毛泽东接到自宅就宿——张治中以一人之身，武有武道，文有文德。他主政新疆时期的政策文章，我坚信将被未来的人们回味不已。因为施政作文的背后，不仅修养见识高人一等；而且真的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

> 马先生之言曰：各宗教之精神，都是归向主、惧怕主，精神统一也。凡敬造物主者，应体主好生之心，推己及物，不以互相战争为然也。如是天下

和平，世界战争熄灭矣。又曰：若能抱良善宗旨者，必能得其心平。人心平，则无不平矣，又何战争之有哉！斯数语者，可谓尽之。……

尝考伊斯兰一语，意谓和平，乃与战争仇恨相对待之词。古兰经云：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的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兹所谓蒙昧人者，盖轻薄骄矜好战之徒。穆圣以和平之教，普济群伦，后世不察，误谓左手执经，右手执剑。以讹传讹，流弊所及，岂可胜百。……

一切宗教，究其根本，不过无限之神，必死之人，及两者关系依次开展。亦不过人类精神脱离一切矛盾，而与绝对融合之过程。如假倭铿之语以明之，则所谓经过否定而达到肯定，承认苦痛而超越苦痛，次第发展自己生命而与无限大生命合为一体。国父论人格之发展，谓由兽性进于人性，由人性进于神性。夫既进于神性矣，安有所谓战争乎。质诸良骏先生，于意云何。是为序。

我总感到，他在写上述的文字时，心里可能也会掠过特殊的感觉。在他的与苦难中国同步的复杂阅历中，与一名阿訇的合作，会给他留下怎样的回忆呢？

只知阅读的我如今只能感慨：为那难得的携手，为一册薄纸维系了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为读时心里涌起的纯净感觉。

张治中的回教吏序，是中国知识分子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由于对伊斯兰教的一语中的，他的序将被人们一读

再读,品味不已。

五

就这样，这本书，从寻找到入手，再到一边读一边确认，我在从甘肃到新疆的广阔地域里，若有所思，寻寻觅觅。时间像流水迎着我淌过,地点如走马灯,围着我变幻循环。我沉湎在读书的乐趣中,顺着山川指引,读取着一词一义。

寺里的阿訇和顿亚的将军，是那么不一样的两界。偏偏他们两人却能相交相知,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

阿訇忧愁的是械斗，将军反对的是战争。阿訇悟出了赛俩目中间的和平，将军看透了民族的前途在平等。马良骏全文讲的,只是真正活着的信仰;张治中一生求的,只是中国的救亡。

在这本书里，他们都总结了一世的教训，说出了最终的结论。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他们大声疾呼的,其实就这么清楚,只是——人们似乎听不见。

春去秋来，我把世纪末尾的几年，就这么在大西北的徘徊里,消磨着度过了。此刻冰凉的金风,正长长地从伊犁方向吹来,直直扫过张家川的山岭。随着风,梯田上最后的庄稼,次第卷过滚滚的浪。

无论在伊犁汉人街的陕西寺里，还是在天水上磨川的黄土梁上,我翻弄着书页,与当地人谈论着马良骏。当然这个名字无人不晓；倾听着甘肃口音浓重的种种解释，我暗自判断和假定着。就这样,一面在大地山野里反复推敲,一

面在心中暗自叹惜。难道这是能轻易实现的么？现世和幽玄如此和谐,穆民和中国如此一致!

无论如何,那珍贵的心心相印,已经一去不返了。剩下我自做多情，为这罕见的双联文采，为这真挚的双手举意。

2000 年7 月

从大坂到鱼儿沟

一

那一年我毫无目的,走了神一般地到了新疆。

到达以后，我从冥思中醒来，明白自己并没有任何非来的理由。所以那年的旅行特别随意，在吐鲁番的冬日乡村,游游走走,看看艾丁湖之类以前漏过的地点,和一些青年阿林讨论些学问。

如今我不再考古；到处都是我自己的，所谓青春的遗迹。已经是不用确认,也丝丝入扣地熟记着一些地点。走在火焰山背面的土路上,斜阳映在前面戈壁上的,就活脱像是自己往昔的影子。

弄不清目的，就一个个地找旧地点，然后用二十世纪最末几天的眼光,把它打量一番。正值白拉提的月份,村子里人人都忙,谁也没有留意我的情绪。三十年的结果,就是获得了在村子里这随意的徘徊。

渐渐地，心里忆起了昔日的同路人。我因为没有什么

[illegible]刘处[illegible]这样的维[illegible]人人。如[illegible]忆，只学[illegible]种奢侈的感觉，盈满[illegible]司。

摄于80年[illegible]，库车。

急事,心里就油然生了见他们一面的意。若能遇见,那就有趣了。天地人间,这些年沧桑变化,若能推心置腹畅谈一顿,该多么痛快。

牙尔湖,胜金口,默默地我们走着。如今的坐骑,已经不是泉子街公社的马,而是一辆价值六十万的丰田越野。它无声地驰过崎岖山路,使我缓缓地穿过绵软松陷的、火焰山南麓的黄土。陪同的都是哲合忍耶的弟兄,他们只想着陪我旅一个游。

没有见到一个旧人。没有那一块走下冰川的向导,那赶毛驴的东干汉子,那寂静的三叉戈壁居民。没有迎头遇上一个维吾尔的牧人,或哈萨克的小姑娘。

二

那些一瞬的朋友,现在忆来,模糊而亲切。那么关键的时刻,是他们伸出的一臂,成全了事情也成就了你。

后来分了手,视野中的他们,就如车窗侧后疾疾退去的树,永远地退去了。留在车窗里面和现实中的,只剩了你。没准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回忆。但是他们再也不曾重现。

呜呜的寒风裹胁着白色的雪尘,锐利的风哨里,屋子都低低蹲踞在戈壁滩上,视野里,是冬季的吐鲁番。这对我是陌生的,我和路边的塑料袋、和白色污染般的旅游客一样,从来没见过吐鲁番的冬雪。

盯着初逢的,这片著名火洲上的积雪,我突兀地想到了一个,又是一个。这么近,能不能看看他们呢…一脑子里

的这个念头，刚出现就挥之不去，它鬼一般，立刻缠住了我，使我摆脱不开。最后迟疑着迈开了一步。

一丝念头油然而起。你渴望一次再见。确实，隔了三十年你懂了：只有窗外树木一样疾疾退去的他们，才是你的挚友。

“有一个赶毛驴的，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脸上有些麻子。八〇年的九月，从吉木萨尔的大坂下来——”

我接着讲了那个故事，讲冰大坂上我得了人家好大的照顾，若是能寻上，当面道个谢多好。听着我的话，陪着的波音师傅（他开一辆像波音 747 的巨型大轿子车）和他兄弟都立住了脚，表情很认真。我一边说着，一边也渐渐把话当了真。我被自己的讲述拥裹着，说着说着，心思成了决意。

他俩寻思着，眼里一股遍知全吐鲁番的各族人等的劲头。我一面费力地回忆，一面描述着。好像是脸上有几颗浅麻点，个子嘛不高，黑棉袄，赶着五六个毛驴。从泉子街那边过来，天山里有一个维族人的地窝子……他俩听着，脸上渐渐浮出有了结论的神情。“怕不是算粒儿姐夫吧！”他俩说。

猛然间，脑子里掠过一个古怪的念头，我直直地觉得，没准最要紧的事就是这个，去寻访曾经深山大漠地邂逅的人们，随便回顾。

这么一见，就是打开着肚皮，让两个心怦地撞上。已然不能再回那天山的地窝子，但可以在一处白杨黄泥的庄户小院，喝一个热茶，感叹一阵子那时的行头穷窘，野营孤单，叹惜一番大坂风景。可以一道摇摇头，苦笑着，彼此体会一阵——不好意思的热乎乎滋味。

可不是么,没有更要紧的事了。

那个算粒儿姐夫,能见得上么?

走,上车!他的家,就住在这河湾后头。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下山路上,在三叉口以前的一条山沟旁,他和我分了手。我记得他左拐弯,吆赶着他那五六个毛驴驮子,顺着山沟朝左走了。当时我在鞍上,用斯坦因的地图打量过他的方向。一个叫桃树沟的地名,被一条路连着,标在南麓的斜面上。

三

而这里,是交河流淌过的绿洲,是葡萄最茂密的地方。它和那寸草不生的狰狞南麓,完全不是一回事。

好久没有这么害羞般的紧张了。在波音师傅兄弟身后站着,当他们拉着手问候的时候,我打量着这位姐夫。

像么?脑子里记忆一阵清晰,当年的毛驴客如现眼前。虽然眉眼姿势都不同,头发也已然花白。我等着紧紧的握手。过了十几年,他不就是应该变成这样么?

两兄弟介绍了我,仔细叙述了我讲的十几年旧事,并问他们的姐夫是否记得。说罢他们停住嘴,看着我们俩。

算粒儿姐夫沉吟了一会儿,开口了:“找的,怕不是我,”他盘算着说道,“从七五年起,我就再也没走过大坂。手里没有毛驴的日子,就更早了。”

我是否失望了?说不清。似乎我也盼着这么个结果。

——发生在那么大的山里,发生了那么久的事情,若是都能够心想事成,若是不论怎样相忘江湖的人,都能拐

个弯就到了他的门上——难道那才不失望，那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

我正这么想着，却听见，波音师傅一边就这么说了。

四个人呵呵笑了，接着进屋吃茶，喧了一阵各式各样的话题。这个家院很静谧，和几家邻里都隔着一面坡。干葡萄的晾房，红辣子的串挂，看得我出神。一条分叉从大河里流出来的水，波光粼粼地，从山崖处绕过来，护着他的门口。对面视界开阔，能望见天山隐约的雪顶。

这里确实是波音师傅的算粒儿姐夫的家。他也是半辈子在两麓跋涉，赶着毛驴驮着葡萄。他和那年我在山里邂逅的回族毛驴客一样，甚至连长相都一样：微驼着背，个子不高，有几颗淡淡的麻子。

虽然说，人若相像时简直两人如同一个；但是，算粒儿姐夫并不是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冰川上，把一条棉裤让给了我的回回毛驴客。

不是他。我没有找到那一个。

四

在这块盆地，我还有一个念想再见一次的人，里铁普。

那时遥遥望着北面的天山，我忆不起 自己曾怎样从那儿下来。那时他不抽烟，而我正对莫合烟爱不释手。太累的时候他也卷了一支。被他胖胖的妻子埋怨，说我教坏了她丈夫。我是怎么听懂的呢？

夜里那么随意地，就宿在维族聚居的鱼儿沟。吃过香

甜的拉条子，就在里铁普的泥坯小院里闲坐。里外飘忽着好听的维语，多么和平的时光！记忆漫漶不清。究竟我怎样度过的那一夜？我一句维语不会，但好像我们一晚上都在交谈。

清晨，在小院门口，孩子要骑我的马。决定放弃马，改用毛驴车是再后一天的事。我们围着骑马的孩子照了一张像，然后就世事茫茫。

我凝视着照片上的那个维吾尔小孩。如今你已是一个维吾尔男子。此刻我终于明白了，惟有他们才是我的证人。我不埋怨拖延得已经太晚，尽管我跑得太远，不知为了什么浪费自己，而没有抓紧。我应该回去，找到他们，取回已经寄放太久的，我的珍宝。

如今只有照片最忠实。甚至它记录着鱼儿沟口的，一座圆拱建筑。你是一座拱北呢，还是一座寺？暗自问着，我听见自己声音颤抖，随即又被掩饰了。

关于里铁普的心事，我没有对波音师傅兄弟说。我想，如果我决意办这件事的话，我会不远万里再来。

捏着照片，我突然想：照片在那年交给了吐鲁番文管所，请他们代交。可是他们践约了吗？我凝视着。二十年过去了，如今你已是必须承担责任的男子，你是你的维吾尔民族的青年。你是在种葡萄么，还是当了一名学经的塔里甫？你还记得么，在你当巴郎子的时候，你曾经随着父亲，陪一个人远走戈壁。你还记得骑过那人的枣红马么？

越野车无声地驰过戈壁，可以看见罕见的残雪。如今我满心奢侈；认定里铁普的毛驴车，胜过正为我服务的丰田。这一次，就算是来看冬日的吐鲁番吧。时机不到，可以让脚印保持尘封，让往事继续沉睡。反正就在这儿，我们埋

下了记号。

而且背景是那么巨大;有火洲的积雪,天山的斜面。吐鲁番如今对我是亲切的，处处有里铁普兄弟和算粒儿姐夫。

我沉浸在满足的感觉中，随着浪头一样的舒服颠簸。是的,我们不仅打发了岁月,而且把私人的痕迹,埋进了铁色的戈壁,和神秘烟村之中。

它们是来世的矿藏，挖出来的人，会分享我们尝到的滋味——它甜美又奇特。

2000 年7 月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一

对我来说,它位于整个北亚草原的处处。

在天山深处的哈萨克家里，我的视野和瞳子受过一次烙烫般的冲击。那是从毡房深处,穿过敞开的木扉,一方亮得耀眼的、鲜嫩欲滴的绿色正嵌在那里。山麓的松林、满漾的草潮在那长方形的绿彩里浮动摇曳，生灵般栩栩如生。哈萨克的孩子们拥有这样的视野，而且是从孩提时代——我这么想着,总觉得自己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

后来我心里便存上了这么一个意象。我多次在文字中提及它。在一篇记叙自己人生美丽瞬间的作品中，我把在那一方明亮绿色中穿来穿去的孩子，写成了一个绝美的少妇,记不清她是克烈部落的,或是属于柯扎依部落。在另一篇描写休息之家的短文里，我把这个意象的场景改成蒙古草原,把穿行闪幻于那方绿色的人物,换成我家的五一。但我始终觉得描写乏力，摄影更乏力，我表达不出——门框

嵌住的一方明绿带给我的感受。

二

人要获得怎样的机缘，才能和美如此接近呢？人若是生于如此的美景，又会被造化怎样的气质呢？人要是怀着这样的蕴藏和气质，又为什么默默无语、不求表达呢？

这个问题，其实极其重大。

我曾经非常考证地问一个哈萨克："以前，天池真的只是你们部落的夏营地吗？"

"是的。我一千个保证，是这样。"

他不仅斩钉截铁，而且充满哲理地直视着我回答。

那么我就懂了。为什么我们和别人，和那些精英大家总是格格不入？为什么人与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哲学、倾向，以及立场？——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血性不同。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由于哲学，而是由于气质。

气质和血性，如天山上的冰川一样，是一切的源头。也许我热爱的气质，我珍惜的血性，它的起源还是一个谜。但这仅仅是就我而言。对天山和北亚草原的牧人们则不同，他们的美质，起源于无双的美景，孕育萌生于自由自在的大自然。这样的牧人天地，完全不同于制造轻狂文人的单元小区，这样的天人和谐、地杰人灵，是造物千年一施的美意。

以后，它就要退隐消失，一逝不返了。

1999 年**2** 月

照片是[illegible]的，我的[illegible]忆却[illegible]耀眼的[illegible]。如果[illegible]有这样[illegible]年，[illegible]的[illegible]么？

波斯的礼物

一

关于丰富神秘的波斯文献,还是在学蒙古史的时候,最初从翁独健先生口中听到的。也许因为它从未约束限制于蒙古元朝的狭窄一隅,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学术史的沧桑变化;甚至牵扯和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变迁,——所以这陌生的字眼便半路待人,屡屡与我们相遇。大概也是出于对如此波斯的捉摸和揣测吧,以至翁先生反复强调、对细节描述再三,以至我总是记得他那特殊的神情。

清末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状元)在危机不已的世纪末,以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使欧洲,任德俄奥荷四国公使。公务不如读书;他只是对欧陆学术稍做浏览,就目瞪口呆地发现,洋人还不仅船坚炮利而已。使自慢于严谨的中国文士震惊的是,至少对辽金元三朝的基本史料,我所知者,洋人亦知,而洋人知者,我却闻所未闻!

洪钧目击了欧洲的东方学术最富朝气的时期。霍沃尔

斯(Howorth)的《蒙古史》正在风靡,又听说多桑(C·D'Ohsson)的大部头蒙古史正在杀青。厉害的是这些大著还另有源头;他们利用一种莫名的波斯国史记,在亚洲边疆的一系列领域里高屋建瓴,不仅尽得国学三昧,而且显得比中国硕儒读书还多,学问还大。洪钧凭着修养,发觉这种波斯史料与中国人常捉摸的《元朝秘史》如出一辙。他感到其中大有奥妙,不容以胡言浪语视之。他虽然还不能辨别这声冥冥之中传来的呼唤,但是他意识到了:尽快把这一声讯息送到中国,让新学问和新资料荡涤旧的空气,是他的使命所在。

洪钧不可能懂得波斯语。即使到了后来《元史译文证补》付梓时,连做序者都依然分不清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云"初至俄也,得拉施特书,随行舌人,苦无能译阿拉比文者,见之皆瞠目。"实际上,我们议论的仅限于波斯一角;另一个启发的到来,即阿拉伯文献源流使中国振聋发聩的时机,还要耗时费神,等候更久。

洪钧的读取发蒙,靠得是二手的翻译。他只能用耳朵听,仗着一伙舌人通事,拗口劳神地一句句译着当时已经出版的霍沃尔斯四卷英文本、贝列津译的拉施特哀丁(Rashid al-Din Fadl Allah)《史集》俄文本。大量网罗了波斯史料的多桑(C·D'Ohsson)著大部头通史《从成吉思汗到铁木尔别的时代的蒙古史》的介绍;最基础的十三世纪波斯巨著《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 Jahan gushai)的介绍,还要等冯承钧等人出现,成为下一代发愤的翻译家。

就这样,波斯史料,就宛如梦中幻影般地进入了中国读书人的大脑。洪钧死在一八九三年,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前不久。而那时,距离直接自波斯文翻译拉施特哀丁《史

集》或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距离中国熟悉波斯或别的小邦俚语，距离中国人的头脑和知识体系里容纳下——不仅是列强的而是其他文明的概念，还不知道尚要再等多久。

那时还有身为官僚，心在学术的人。洪钧靠着舌人重译的资料——此刻国内对这些新资料尚一无所知——就在公使任上，夜夜摊开书本，紧张地考证起来。回国时已成《元史译文证补》二十卷。今人恐怕很难感受洪钧的灵感，直至时限已到，墨还正浓，直到使节归国之际，尚有十卷腹稿有目无书，来不及写完。

《元史译文证补》投入北京学界以后，引起了惊雷般的轰动。头一次，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自己视野之闭塞震惊，而且对乾嘉以来一直自傲的煌煌学问之基础，也发生了动摇。

这个故事藏着一个简单的逻辑。蒙古的征服，既然不仅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元朝，而且在古波斯的地域建立了著名的伊儿汗朝，那么当然就会存在着该朝史料。尽管那是一个僻远的、几乎未被发现的地方，它存在，无论你发现与否。更使学人们震动的，是自己对那存在的——麻木的感觉。因为国学家早知道元朝宫廷里有一种秘史存在，甚至知道它的蒙古语书名是“忙豁仑·纽察·脱察安”（**Monggul-un niguča tobčiyan**）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伊儿汗朝也可能有这类资料。因此治元史讲根据，却少了起码的对比。

这是一个逻辑简单的错误。确实，在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人眼里，伊儿汗朝和元朝完全是平等的，波斯——伊儿汗史料的存在，本来应该是一个常识。

翁先生仔细地讲着，描述了后来元史界怎样分成了两种潮流。由于洪钧的揭破，本来就嫌元史粗糙的人，更加贬低《元史》价值，主张重修元史。于是屠奇著《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编《新元史》。虽然后日成为满洲国要人的柯绍忞功力并不出众，《新元史》后来仍被一些人与二十四史并称，是为所谓“二十五史”缘起。

而元史界的主流却因“波斯刺激”，开始体会捉摸史料的局限与时代的局限，开始悟到——任谁重写也不会获得完美的元史；粗糙的《元史》，正因其原始的资料性而更珍贵。

从小处说，治蒙元史，或许证补正是方法。自宏观处讲，人们认识到，洪钧已经开风气之先，学术的时代变了。

何止元史，知识的世界性已经棱角毕露。没有谁敢笑话洪钧的“听译”。直至翁先生时，呼唤声还在重复：要懂语言！今后不仅要念西文译本，更要直接攻读波斯文原典，要攻下一切蒙古、突厥、阿拉伯各种文字的原始资料，校勘互考，互证互补，以达到新的学术！

人们常对陈寅恪十三岁出国，十五岁公费留学，青年游遍东西洋，懂一二十种外语的学历艳羡不已。其实陈寅恪兄弟考取官费少年留学的背景，是清末官方的识者对语言劣势和眼界闭塞的忧虑。

他们甚至决心从儿童抓起，彻底解决语言问题。与陈寅恪同时出国的江南选派生，那一期便是一百二十名。洪钧渴盼一读的，名著《多桑蒙古史》的译者史学家冯承钧也是在那时，年仅十二岁就被端方批准，与四十多名鄂籍同学一起被派留洋的。他先赴比利时上中学，接着就读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一生志在沟通东西。他翻译的法国汉

学家伯希和(**P·Pelliot**)、沙畹(**E·Chavannes**)等人的边疆论著,直至今日不可或缺。

“波斯”引起了一次大学习。而实际上,细心观察则会感到:当时的发愤,在不觉间悄然有过一次置换。不知从哪一个瞬间起,追求的波斯,渐渐变成了列强语文。英法德俄日,从此脍炙人口,而并未见有谁去读波斯语。因为只要精熟列强西文,便可从突厥到波斯,驰骋诸学如履平地。这个现象始自洪钧,至今未见稍歇。

虽然史学界熬尽灯油,用放大镜在字里行间寻觅,但他们对波斯史籍的历史观点不屑一顾。我要的只是波斯脚注,管你什么穆斯林史学。这种潜台词最后发展成只读西方大师的译文——难道,你还以为你能追上伯希和吗?

也许,在大中华的骨子里,从来就没有尊重过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一个介绍、追撵、甚至取悦西方的过程。欧洲在一种仰视的目光里被中国人琢磨。欧洲列强的思想、方法论、世界观,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圣经,刻苦攻读,咀嚼再三。欧洲的东方学,在被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得博大,也日益富于优越感。

就这样,时代的沧桑震动,先是化解成了技术问题和外语问题,然后终结于彻底的异化。只不过如此姿态是一种徒弟姿态,它阻挡了最独立的思考。而一度激起注意的波斯,和波斯象征的一种道路,最后依然归回沉默。百年之后回顾,思想史的这场变动如近代之开幕,它令人感慨不已。中国人注定的大灾大难不过刚刚开头,再回忆证补元史,那真是细枝碎节。只是,当年天外雷鸣般的、那声时代的呼唤,最后沉寂了。

二

后来才知道，波斯的冲击在文学领域也发生过。一如文学界的性格，这儿发生的事，当然毫无元史界的那种拘谨，它随意而富于渲染。

我猜，老读书人更熟悉莪默·伽亚谟的译名。在他们看来，这一西域怪杰，简直能抵销整个的波斯文明。确实，风流诗人绝妙的“鲁拜”，引得中国人译者如蜂，久兴不衰。除了近年译 自波斯文原著的张晖(1988)、张鸿年(1991)之外，从一九一二年起至一九九九年约一个世纪里，以英文译著为底本，染指翻译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四行诗(rubai-yat，柔巴依，旧译鲁拜)的中国文人，计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李霁野、孙毓棠、徐志摩、吴剑岚、赵宋庆、伍蠡甫、李意龙、潘家柏、黄克荪、黄杲昕、陈次震、孟祥森、虞尔昌、柏丽——恐怕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重译不厌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那个用着方便且大名鼎鼎的、费茨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英译本。中国人的乐此不疲，也是因着欧洲人的嗜爱无止。多几本舶来绝句算什么，莪默的欧洲译本更多：它居然有三十二种英译本、十六种法译本、十二种德译本、五种意大利译本、四种俄译本；还不算什么亚美尼亚文、丹麦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乌尔都文！

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鲜活的句子。不知它究竟是莪默的，还是费茨吉拉德的。这些胡姬当炉的妙歌，它挑逗了中国文人的渴望和趣味，教导了他们个性解放的极致。

文人们出于惊喜,争相一译,寄托自由的悲愿。它不仅是一股清风;对翻译家们来说,它若是末日洪水才好,他们盼它帮忙,冲毁压抑人性的旧中国于一个早晨——于是译笔缤纷,华章比美。

就译文本身而言,他们翻译的,已经很难说还是原来那些柔巴依体的波斯诗歌。例如,最著名的、胡适所译的一首"创造世界"的"鲁拜":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
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过

此译被徐志摩以为不雅。徐以新潮诗人的自信,提出新译如下:

爱啊!假如我能勾着这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这整个儿塞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
再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

首先,二人都不曾深究此诗是否出自海亚姆手笔。而实际上,由于海亚姆的声望,有大量伪作托其名而行世,其次,他们更没有意识到,此一首"鲁拜"涉及"天神",是一个关于造物主的题目。

他们不知道,对于波斯人来说,唤主、指主兴叹,即所

谓呼天抢地固然不足为怪，但是取代主和自比造物主——即便对于弹杯纵酒、不守五功、对死板的清规教法恣情嘲笑的诗人，也是严峻的，几乎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作于波斯而不是作于上海的诗；对诗人来说，不仅存在着环境的约束，也存在着内心的约束。在暧昧的诗行之间，在类似的概念之间，有着一种最后的界限。

神的概念与主的概念，毕竟太接近了。他用了一个祆教用语 **yazdan**(天神)，而没有与 **Huda**(真主) 一词发生干系。微妙仅在缝隙之间，如边缘的舞蹈。

遣词造句之际，分寸决定了一切。显然诗人曾经沉吟，有过推敲和一吟三叹。就中滋味才是诗味深处，可惜译者对这些全然不知。看来，历史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并没有盼望的那么大。何止不通“波斯”象征的深重含意，即使对如上狭义的波斯，他们也不求甚解。他们不知“鲁拜”之外尚有“花园”“果园”，不知莪默前后，还有哈菲兹和毛拉维。

胡、徐二人的译文中，如“爱啊、再磨再炼再调和、卿和我、你我的安排、还不趁机会、塞尘、谋反”等诸处个所，均为失真之笔。唱和固然愉悦，只是离谱太远。

言及胡适，或许该多说一句。他应该即便对“莪默”，也具备文化嗅觉。但是他的译文没有显示他提倡的科学性。也许就在这个标志附近，他还失去了代表中国与欧洲大家并立的可能，这才是令人遗憾的事。

有人会说，这是诗集不是账本。可是人们也可以问：我们究竟是在读波斯的诗呢，还是在读英国的诗？如果读者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企图拓展眼界了解世界，他们读到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文化的误解吗？

我们总以为中华即东方，即东方之最。而波斯却描述了一种别样的东方。西方人说东方时用语繁绕，“近的，中的，远的，极远的东方”。这是什么意思？究竟谁是东方？哪里是近东和中东？什么是东方？我们的概念乱了。

但西方人，何止莪默的英译者，几乎在一切学术领域都能列出成排的响亮名字——他们没有乱。他们出色地进入了地中海南岸，进入了马格里布、进入了阿拉伯和土耳其、波斯与印度。他们与一个个距离他们较近的东方发生了漫长的、纠缠复杂的瓜葛，并一直融入其深处。然后，他们又携带着“较近东方”的知识和欧洲的主义，配之以或炮舰或圣书的辅助，去征服更远的东方，直至征服中国——这最远的和最自大的东方，一如莪默之例。

一种可能，一种洞彻波斯以及天下思想大势、获得能与欧洲人分庭讲礼的世界知识、进而建立更科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可能——被失之交臂。

应该抄出这首曾使中国知识人那么躁闹的小诗，让人们拼音一回，听听它的音韵。是的，哪怕像摔碎一块瓦片，听听响声也好。它毕竟是原文。下面即是这首小诗，转写和汉译，均从简示意。

Gar bar falakyam dast bodi qun yazdan

若能像亚兹丹神驾御天穹，

Bar daxitami man in falak ra ze miyan

我便把这层天，从中拿掉。

Wa zeno falaki gakyar qinan sahtami

并重新另造一个天空，

Kazade be kame del residi osan

使 自由的心儿,快乐如愿。

三

对于诗的不同认识，在苏菲诗歌的领域分裂得最彻底。中国人看惯了寄情写意和寻章摘句，看惯了烈士绝笔和作诗人状——但是很少接触做为一种宗教思想载体、进而做为一种宗教传统的诗歌。

换个题目人们会摇头；而面对着光彩照人的波斯文苏菲(即伊斯兰神秘主义)诗歌,宗教的范畴不能回避了。

它们既是简洁的、自然的、情歌式的，又是双关的、理念的、宗教式的。它们似是而非,亦此亦彼。它们简练得无法再删一字,暧昧得可做相反解释。翻译和读书,在此都不仅是寻找词汇的对应。诗，在呼吁着读者和译者的修养或基础。没有新的字母表,人没办法翻弄天书。

只是由于面对天书,学究们才承认说:这些诗歌,既是文学的，也是伊斯兰的。他们的承认，是因为路走到了尽头。他们发觉除了这道门里,再也没有藏钥匙的地方。

现在他们只想着弄到钥匙。就方法论而言并没有进步。其实，即便面对文学或史学的时候，也应该强调尊重“文明主人的心情”。

诗行间暧昧双关的用语，意味着人间社会的内部秘密。解释诗,就等于解释教门机密。这几乎就是人的心灵,它不是问一问,“调查”一下,就可以拱手交出的东西。它不能交(或教)给那些转过脸去,就要继续歧视的人。

话题在这儿严肃了。一方是学术为知识分子带来的利益，是探听和利用；一方是宗教内部的社会机密，是民众在歧视和流血中守卫的信仰。或者理解并风雨共济，或者骗取并加入歧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将随着苏菲研究和各种新兴学科的发展，逐渐醒目起来。

难怪穆斯林不信任莪默鲁拜式的译本，他们宁愿村言土语，自己硬译。不用说，就教育而言，山野农村的旧式经堂学术，当然无法攀比高等学府。但农民却可能懂得文学宗教两不相悖的道理。他们还准确地嗅到了诗歌中的苏菲味儿，从难懂的“法儿西”(即波斯语)里，嗅到了启示。他们以另一种目的，也在一直攀援波斯一阿拉伯的梯子。

只有在接近的心情、特别是在接近的场景之中，当人渴望加入传统，不可遏止地也企图诗的表达时，人会对苏菲的诗“似若知道”。对于阅读的这种基础或修养，存在于伊斯兰苏菲派的思维和实践——即脱勒盖提(**taliqa**)的体系之中。我特别想说，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它一无所知，但它确实伴着艰辛步履，一直被实践着。

在穆斯林的世界里，诗与经从不相悖。诗常是经典的注解。所以不论对国内的刘介廉，还是对波斯的《玛斯纳维》，对他们来说，惟有这些费解的苏菲诗篇，才亲近而明白。

远在十四世纪，元朝秘书监的回回馆著录宗教用书目录时，列有“额史尔”即诗篇一项(**A'shir**，阿拉伯语，诗)。清代伊斯兰学者刘介廉的案头经书中，也有《鲁把牙惕》(**rubai-yat**)即“鲁拜”一种，只不过并非风靡的那一本。

自王静斋阿訇后，翻译诗集《**Gulistan**》(花园)的作业，在民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实就在最近，还有两种新的

阿訇译本问世(马克林《古丽斯唐》,新疆版;杨万宝《真境花园》,宁夏版)。据我所知,对巨著《玛斯纳维》(**Masnawi**)的民间翻译,也在不止一所清真寺里进行。

我选了一个典型的"白提"(**bayti**,苏菲诗的双句),著名神秘主义长诗《玛斯纳维》卷一的第**1784**(有的版本为**1739**)联;分别向两位阿訇(马克林,杨万宝)、一位外国苏菲派研究者(冈田惠美子)、两位中国波斯文学者(张鸿年,张晖)请教(限于篇幅,仅引用其中三位译文)。不用说,他们以前并无交流,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实验。

上句,即:**Dilbaran ra dil, asir-e bidilan**

马译:"一切被爱者叼走了,恋人的心,"

杨译:"失魂丧魄,是因为爱恋者的无心,"

冈田译:"被爱的人的心,是沉湎于爱的人的俘虏,"

下句,即:**Jomle ma'xughan, xekar-e axghan**

马译:"所有的恋人,都是情人的猎物。"

杨译:"所有的被恋者,是恋人的猎物。"

冈田译:"所有的被爱者,都是恋人的猎获物。"

在简练至极的两个短句里,"**dil**,心"及它衍生的一批语言的、宗教的近似词(**bi-dilan**,无心的)、(**dil-baran**,掠夺心的,单数为**dilbar**),内涵很难区分,难以狭义地界定。解释在边界上模糊了,诗就难在这里。我以为,只有把握住爱与被爱双方的地位,方可做中文译语的选择。否则,"爱人""恋人""情人"都将语焉不明。

译家们都强调了难点,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译文不足为释,而要解释和补充。他们补充的话都近似——"主是惟一

被爱恋的”(杨万宝),“被爱的是主,爱着的是功修人”(马克林),“被爱者通常为女性,暗指主;爱恋者通常为男性,指修道者”(冈田惠美子)。

两个生活在僻远乡村的阿訇译文,就基本含义的把握而言,并不比学者逊色。苏菲诗句的朴素特性,成全着受教育条件限制的农村人:因为字面排列的词汇,是简单而常见的;直译于谁都不是太难的事,而其间深意,又对谁都是深奥的谜。这令人振奋,虽然他们同样没有找到一箭中靶的话语。

有无一两篇译文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在明天或后天,迟早会出现民众的文明发言。暗涌已潜在许久,新潮正方兴未艾,文明解说和代言资格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权利的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对波斯语苏菲诗歌的翻译作业中,破土而出,登上大雅之堂,以新世纪的进步的名义,成为未来学术的主题。

洞知的掌握,是准确译文的前提。在缺乏这种前提的时候,最好的翻译,是直译、硬译、哪怕一词一字地“对仗译”。鲁迅说,“宁信而不顺”。他的意思是:信、达、雅谈何容易,最根本的规矩是忠于原著。优先的是原著的词句蕴含,而不是译文的词章习惯。许多句子和词汇,必须新造或硬造,就像“唐译佛经,元译上谕”。

我们渐渐明白了:现在还不是追求完美译文的时候。还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些条件。等隐喻走向公开,等异端变得合理,等遭受歧视的思想,成为必须的参考时——苏菲的诗会显得好懂。苏菲的释义,藏在苏菲的世界里,如同生活中的诗。在活的苏菲从内部发言之前,脱离实践的主观译法和学院诠释,仅仅是参考和猜想而已。

我想，鲁迅的翻译观，对这个时代的阿拉伯一波斯文苏菲诗歌的翻译，可做一时的门规家训。是的，在境界升华、掌握降临之前，译笔文采的几分长短，大可忽略不计。

四

当人们为打不开秘藏大门而发愁的时候，他们该知道，有一把钥匙其实近在眼前。在解读神秘波斯的诸多手段中，说不定这还是最好的一种。

我说的是生息在天山南北麓的，魅人的维吾尔文明。

必须说，至今这个“最近的”文明邻居，还没有得到与其水平相应的重视。维吾尔的本质远未得到揭破，它与波斯乃至伊斯兰文化之间的濡染覆盖，也没有得到剖析。虽然此文不是维吾尔专论；但已经可以预言：无论史学、文学或苏菲传统，任何一个角度——维吾尔的提示都将是最基本的。

当年洪钧归时，举国都为波斯史料感叹不已。而就在那时，在南北丝路上，商人、学者、毛拉，正驮着刚刚印刷成的书籍，在沙漠的炎热里赶路。那是十九到二十世纪交接的时期；如中世纪的波斯，就像拉施特哀丁编著《史集》那样的、志在著书立说的时尚，正在维吾尔学者之间流行。

洪钧的朋友们不知道，那时有很多书——都应划入他们热衷的西北史地之学的必读资料——在喀什或塔城写成，在喀山印制，又传回塔里木各个绿洲。

从历史观点到记事手法，这些历史著述都模仿着他们的波斯先驱。它们大都浓重地染有文学笔调，事件描述之

外，华丽的诗行且议论且装饰，比比皆是。如同波斯，它们在谱系描述和民间传承的采用上，有一种传统的擅长。伊斯兰思想是它们的历史观，这些书都强调历史过程与真主意欲的因果。而恰是这一点，曾使波斯史籍获得成功——消灭了腐朽的西亚穆斯林国家的蒙古人，诚服地皈依了这种解释，相信包括自己征伐在内的全部过程，不过是真主的天谴。

文学的领域更是如此。沟渠一旦开通，波斯体的诗歌便如同春水，灌满了社会的一切角落。阿尔泰式的头韵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柔巴依（四行诗）、格则勒（gazel，小诗）、玛斯纳维（双行诗），一切波斯的格律，都在涌入维吾尔绿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成了维吾尔自己的旋律，时髦而经久不衰。

在几个世纪的时光里，它被城镇喜好，被农村习惯，在绿洲的串珠上传播丰富，被所有的维吾尔人呼吸饮用，融入血液养成气质，任世道沧桑不能须臾离弃。文学的波斯化居然如此彻底，宗教和世俗的融混居然如此水乳难分，应该说乃是文明史上一个眩目的显例。

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苏菲主义诗歌。若要深入苏菲的世界，维吾尔是捷径，也是那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

波斯的文明曾经覆盖过，并对维吾尔实现过全面的文明提升。从人的姓名，到衣食住行，到社会结构，以及道德准则。这种覆盖当然是伊斯兰的，包括苏菲主义的社会实践和话语表述。既然诗从格式到思维都罩上了伊斯兰波斯的影子，那么它们对神秘内心的表达，当然也就丰富繁茂。

近年来《十二木卡姆》受到青睐。但直觉告诉我们，编

入各种木卡姆集子的诗歌，潜入的苏菲派诗作分量巨大。在波斯文形式中见惯了的句子，又带着维语的嗓音出现了,它们数不胜数,宛如波斯的多次复制。

包括嘲戏的风格，包括海亚姆式的、对教条的调皮口吻。包括大量借词,包括波斯诗歌中惯用的套语。借词进入维语并安定下来，用新土壤中的含义，巧妙地解释着它们自己。

不过在前一节令人劳神的“情人恋人”并未迎刃而解。在维语同类诗歌中,情人一词大都为“**yar**”,而不是与“心/**dil**”有关的词。**dilbar** 在维语中主要意为“美人”。如果它暗指主,而“美人”没有主动或被动形态,对追求者显示不动的语感——所以就宗教意义而言，维语释义最准确。而在日常生活中,暗藏深意的**dilbar**,不过是维吾尔女孩的常见名字。

我想，就不用再对教授们强调入门规矩了——按照学问的惯例，在没有经过维文译本的对校互勘之前，对波斯诗歌的研究不能称做完全。

如果波斯是一种遥远的古典，那么维吾尔就是它的现代版。在维吾尔的绿洲上,我们追逐的波斯的实质,不仅存在,而且活着,在生活中俯仰皆是。它被全面地移植于此,像一株株魔力的葡萄。

对维吾尔的文化态度，恰与当年对波斯刺激的态度如出一辙。好不容易，人们要学习波斯了，而对更近的维吾尔,人们傲慢的架子却愈发放不下来。哪怕人已经猜到,无论大义读解还是细微措辞，参考维吾尔都是捷径——但是怪就怪在这里：只要这个“东方”比波斯更近，那么就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和学问更远。

一切总在悖论里循环。知识已经患病日久,愈是苦读,却不见真知。对现状不满,对钥匙呼唤,声音已经喊得嘶哑了。

但是更该义正词严地申明——不会为着某人需要钥匙,就有一个民族跪下来恭敬地给他送到手上。做为旧世界的遗物,旧学术和旧的文人习气,确已应该淘汰了。一种更接近客观本相,也更接近良知和人道的知识体系,迟早会建立起来。

这将是一个伟大的作业,它的开始,将意味着歧视作为历史的结束,它引导的,是一个以尊重异类文化为宗旨的,感人的历史行程。

五

波斯刺激以后,无论在史学还是文学,认知都绕行了经由欧洲的路线,都发生了媒体的反客为主。一场对未知文明的探究,最终成了英文的旧课。

文学更是如此。海亚姆虽引起了那般的文人骚动,却没有影响他们对自己知识结构的反省。胡徐的轶事和译文里,被更准确地翻译了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译笔的价值也仅在于——数行之间,活灵灵有一张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自画像。

学科的长期停滞,是对长期的文明歧视行为的惩罚。其实,欧洲正是因为如饥似渴地吸收了地中海彼岸、从摩洛哥到印度的营养,才显示出那样的眼界和生气。

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又有策划出版波斯古籍的消息。

也许这又是一次洪钧以来，对僵老知识体系的不满和探索。但我们已不敢轻易欢呼;百年的历史教育说,看是简单的求学,实践起来,却常常会有难以理解的曲折和转向。

不过，哪怕再反复几十次吧，直接面向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的探求,已经认真地迈开了步子。虽然不敢乐观,但感触是切肤的:历史正在缓缓地进步。

我不禁忆起蒙古史的往事，忆起年轻时听说的“波斯”。时过二十年了,我依然在细细品味——是的,波斯,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波斯的礼物,它劳人心神,又使人神往,就像一个苏菲的隐喻。

1999 年5 月初稿
2000 年6 月改定

我[illegible]遍了[illegible]，[illegible]过[illegible]业的[illegible]师。但是真正[illegible]我获得[illegible]变的是她，我的乌珠穆沁[illegible]原的额[illegible]。她是我最[illegible]要[illegible]导师。

[illegible]于1981年

二十八年的额吉

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么”问成了“她还在么”，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

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

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

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道。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

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

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

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

一

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么，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

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

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

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

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艾洛华哥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

血统就是发言权么?难道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

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

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要和这隔膜的世界作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

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

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

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

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

二

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

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么?

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干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荫下休息和医治。

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艾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偏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

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漫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

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

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许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词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

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艾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

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

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 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 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 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 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艾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像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 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

还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 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

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

或许额吉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意。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这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艾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

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骒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艾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啊,你使我复杂了。

三

幸亏我把她和艾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

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蒙,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地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那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艾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八十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熔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

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么(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儿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家赞

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艾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

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啊！

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

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

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像不费事。反正每隔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像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像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

倒是实现了两位母亲的会见。

我心里充满独自的欣赏,瞟着她们。我喜欢这罕见场面,因为我而出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额吉紧挨着,她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我催促着,聊吧,有我当翻译。可是她们只是静静坐着,费力地笑着,对着面前丰盛的筵席。她们比平日更少言寡语,好像只是坐等我的下一个行动。显然她们都意识到了:既然眼看着花儿结了这么大的苞蕾,那么它反正是要开放了,而且最后会结下果实。显然她们对花朵和果实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似乎都担心我这么与众不同。

我长久地注视着她们,揣摸她们的心情。谜底究竟是什么呢?

四

随着对突厥源流的了解,我对蒙古草原的理解日益广义化。我逐渐有了一些把握。但是从细末和广度,在两处察觉到优势的我,心底却鼓动起离别的欲望。我寻觅着新的出发,准备扑洒过去的,是一种双数的感情。

后来，而且是在遥远的日本东洋文库，有一次学习回鹘文养子文书，我突然意识到，养子的观念和习俗在北亚草原的普遍。

养子，**tejēsen hū**，这是一个多么语感温暖的词汇！后来我便半是认真地，用乌珠穆沁口语里的这个词自喻。

其实，连真正的抱养也未曾有过。只是挨着冻羊粪燃起的炉火，睡前要由额吉掖紧皮被。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如同你，蹒跚走完自己的路，哪怕一生穷愁潦倒。不去向世界开口，追逐着水草变移和牛羊饱暖，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作为人的存活，才值得为之生死一番。反之，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营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孝，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秘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

额[illegible]，如今我[illegible]单[illegible]人，[illegible]格，我[illegible]次认[illegible]尔的[illegible]上。

摄于1996 年

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啊,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六八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

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束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Arban ǰurɤan-u saran-u gegen tang-ās oroǰu irele
Alhun alhun tan-u aisui ǰam-du ösün boiǰiɤsan bi mön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Horin naiman ǰil-ün tere nutug-tu mori mini
ǰoɤsōd yabuhu ügei
Hūčin-iyan emüsügsen ta bol aɤū tōn-u dotura baina

二十八年前的旧盘上,马儿停住不走
衣着褴褛的你,是在伟大的数中

Čulūtai obō-yin dōɤur bol angkan-u Güngse mön
Čima-yi amuǰūlsan Süme nada-du sayihan öngge-tai

有石头的敖包下面,是以前的公社
使你安宁了的庙宇,在我眼里颜色好看

Harihu edür-tü hola-yi harād dabhur dabhur ūl
Halūn čēǰin-ü dotor-ās ǰöhen uilaǰu baina

离去那天向远眺望,一层层的山连山
滚烫的胸膛里头,正柔软地哭着

1996.7. 腹稿于内蒙
1998.4. 写成于北京

粗 饮 茶

自幼看惯了母亲喝茶。她总说那是她惟一的嗜好，接过我们买来的茶时，她常自责地笑道：怎么我就改不了呢？非要喝这一口！

那时太穷，买不起“茶”，她只喝“茶叶末”。四毛钱一两的花茶末，被我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有钱了，“茶”却消失，哪怕百元二百元一两的花茶，色浊味淡，沏来一试，满腹生疑。干脆再买来塑料袋装的便宜货，与昂贵的高级花茶各沏一杯，母亲和我喝过后，都觉不出任何高下之别。苦笑以后，母亲饮茶再也不问质地价格；我呢，对花茶全无信任，一天天改向喝绿茶或者——姑且说“粗茶”。

提笔前意识到：以中国之辽阔，人民之穷窘，所谓粗茶之饮一定五花八门不胜其多。我的一盏之饮，也仅限于蒙、哈、回三族的部分地区，岂敢指尾做身，妄充茶论！

一

在尝到蒙古奶茶之前，我先在革命大串联时期喝过藏

族的奶茶。后来我才懂得他们比蒙古人更彻底地以茶代饭。藏民熬茶后加入酥油，这个词又在北亚各牧区各有其解。当然说清楚游牧民族的黄油、酥油、奶油不是一件易事，难怪日本学者总听不懂；因为他们对这些其实是奶制品的油只有一个词描述，而且是外来语：butter。加酥油的茶拌上炒青稞面，就是使伟大的吐蕃文明温饱生衍的糌粑。汉人们吃不惯，觉得酥油茶是惩罚，因此住一阵就溜，始终完成不了他们掺砂子的大业。而酥油还算奢侈；第二碗糌粑是用“达拉”拌的，达拉就是脱脂后的酸奶。一般人们一餐两碗糌粑，一碗用酥油一碗用达拉，——然后再慢慢喝茶。

蒙古人的文明可能并非与西藏同源，他们喝奶茶时不吃面，吃米。与粗糙的青稞面对应的是粗糙的带壳糜子，蒙语译为“黑米”。主妇用一个铁箍束住的圆树干挖成的舂筒，装进炒熟的黑米，有空就捣。那种家务活儿很烦人，插队时我经常被女人们抓差，抱着杵，一边捣一边问：“行了吧？”

——在奶茶里泡上些新舂出来的黑米，刚脱壳和炒得半焦的米，使这顿茶喷香无比。当然，我们不像高寒的西藏；我们还往茶里泡进奶皮子、奶豆腐。有时，比如严冬泡进肥瘦的羊肉，喜庆时泡进土制的月饼。

蒙古牧民的奶茶用铁锅熬。砖茶被斧子劈下来（大概蒙古女人惟此一件事摸斧子），再用皮子或布片垫着砸碎。茶投入滚锅，女人一手扶住长袍前襟，一手用一只铜勺把茶舀起又注回锅里。加一勺奶，再注进，再舀起——那仪态非常迷人，它如一个幻像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然后投进一撮盐池运来的青盐。

蒙古牧民用小圆碗喝茶。儿童用木碗,大人用瓷碗。景德镇出产的带有透明斑点的蓝边细瓷碗,特别是连景德镇也未曾留意的“龙碗”——最受青睐。吃着饮着,空腹饱暖了,疲乏退去了,消息交换了,事情决定了。

那一勺奶举足轻重。首先它是贫富的区分,“喝黑茶的过去”,说着便觉得感伤。今日若碰上个懒媳妇没有预备下奶,倒给一碗黑茶,喝茶人即使打马回家时,心里也是忿忿的。

字面意义的六十年代,我在草原上的茶生活,基本上靠的是无味的黑茶。奶牛太少,畜群分工,牧羊户没有牛奶。蒙古牧民不能容忍,于是夏天挤山羊奶——也许是古代度荒的穷人技能。奶茶都是在牧民家喝的,而且集中在夏季。春黑米,饮黑茶,那全套旧式的日子,大概只有今天流行的民族学社会学的博士们羡慕了。当年的我们并没有在意,历史特别宠爱我们这一代,它在合上本子之前让我们瞟了瞟最后一页。

即便在炎热的骄阳曝烤之后,蒙古牧民不取生冷,忌饮凉茶。晒得黑红的人推门弯腰,脚迈进来时嘴里问的是:有热茶么?

待客必须端出茶来,这是起码的草原礼性。对白天串包的放羊人,对风尘仆仆的牧马人更是如此。而寻求充饥的男人则必须有肚子,不能咽吞不下。还需要会一种舐吞嚼的饮茶法,漫谈时舒服地躺在包角,半碗茶放着不动;要走时端起碗,把它在虎口之间转着,舌头一舐,奶茶一冲,嚼上几口——炒米奶食的一顿茶就顿时结束。然后立起身来,说完剩下的几句,推门告辞。

我就学不会这种饮茶法。有时简直讨厌炒米。我的舌

头每舐只粘一层米，而碗里的却愈泡愈胀，逼得人最后像吞砂子似地把米用茶冲下胃。而且不敢争辩；因为不会喝茶，显然是因为没挨过饿，闯荡吃苦的经历太少。

今年夏天我回去避暑，一进门就是一句“空茶”。这是我硬译的，也可还原为“空喝”，就是不要往碗里放米、奶豆腐，只喝奶茶。其实阿巴哈纳尔一带风俗就与我们乌珠穆沁不同，人家把奶食炒米盛为一盘，听便客人自取，主妇只管添茶。我曾经耐心地多次向嫂子介绍，无奈改不了她的乌珠穆沁习惯。

习惯真是个不可理喻的东西。北京知识青年里有不少对，移居城市两口子还遵从奶茶生活。一次我去东部出身的一对知识青年家喝茶，发现他们茶里无盐。我惊奇不已，这才知道东部几苏木的牧民茶俗不同。我们均是原籍西乌旗的移民家住熟的知识青年，茶滚加盐决不可少，居然和他们旧东乌旗残部再教育出来的知识青年格格不入。

蒙古奶茶的最妙处，要在寒冷的隆冬体会。不用说与郑板桥“晨起无事，扫地焚香，烹茶洗砚”一一相反。其时疾风哀号，摧摇骨墙，天窗嘎然几裂，冻毡闷声折断。被头呵气结冰，靴里马鬃铁硬，火烤前胸，风吹后背。嫂子早用黄油煮熟小米，锅里刚刚熬成奶茶。抽刀搬肉，于红白相间处削下一片，挑在灶筒壁上。油烟滋滋爆响，浓香如同热量。吃它几片以后，再烙烤一片胸叉白肉，泡在米中。茶不停添，口连连啜。半个时辰后，肚里羊肉、黄油饭、滚茶样样热烫，活力才泛到头脚腰背。这时抖擞精神，跳起穿衣，垫靴马鬃已经烤干。系上帽带，抓起马嚼，猛一推门，冲进扑头盖地狂吼怒号的风雪之中。大吼一声：好大的雪啊！随即大步踏进风雪找马。

其时里外已被寒风侵透，但是满肠热茶，人不知冷——严酷的又一个冬日,就这样开始。

没有料到的只是：从此我染上了痛饮奶茶的癖习，以后数十年天南地北,这爱癖再也无法改掉。

二

刚刚接触突厥语各族的茶生活时，我的心理是既好奇又挑剔。对哈萨克人的奶茶滋味,虽然口中满是浓香,心里却总嫌他们少了一“熬”,——哈萨克的奶茶是沏兑的。

但是很快我就折服了。

伊犁牧区的柯扎依部落，在饮用奶茶时的讲究，不断地使人联想到他们驻牧地域的地理特性。他们显然接受了波斯，甚至接受了印度和土耳其或地中海南岸的某种影响。一只造型优美的大茶炊是不可少的，旁边顺次排开鲜奶、奶酪、黄油以及一小碟盐。另一只是浓酽超度的、事先煮好的茶。当然更不可少的是主妇；她继承了古老的女人待茶的风俗，把一撮盐、一块黄油、一勺奶皮子、一碗底鲜奶依序放进碗里，然后注入半碗或三分之一碗酽茶。最后倾过大茶炊，滚沸的开水冒着白烟冲进碗中，香味和淡黄的颜色突然满溢出来。

然后她欠身递茶,先敬来宾,再敬老者。她在自己喝的时候，留意着毡帐里每个人的碗，随时放下自己的碗，再为别人新沏。这一点,女人在这种时辰的修养和传统,通行北亚诸族毫无区别,我猜它古老之极。

常有美丽的少妇蹲在炊前待茶。但是用无聊的汉地文

[illegible]过天[illegible]大坂之前，[illegible]之前[illegible]的舒适。

1980 年，[illegible]木萨小。

人的把戏是行不通的，她们不会接过话头，大多根本不答。最后一角的老者接过话题，让答问依主人的规矩继续进行。

第二碗下肚以后，头上汗珠涔涔。这就要补充关于碗的事：哈萨克牧区喜用大海碗。我尽管在早期用蒙古龙碗对之质疑；但是后来，我懂了，让滚热的奶茶不仅暖和肚肠，还要让它使全身发汗，让人彻底从内脏向四肢地松弛暖透，最后让心里的疲惫完全散尽——非用柯扎依部落的这种大碗不可。

在天山中，一名骑手或游子目击了过多的刺激。梦幻般的山中湖已经失去了，但从雪峰上远远瞥见了它。鞍上已经没有叉子枪甚至没有一把七寸刀子，但在小路上看见了野兽。冬季暖日，看见大块的积雪从松梢上湿漉漉地跌下，露出的松枝和森林都是黛青色的。牧场如此峻峭，道路如此险恶，从亲戚家的老祖母的乃孜勒回家一路，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事情经常令人不快，而天山如此美貌——矛盾的牧人需要休息，需要用浓浓的香奶茶把累了的心泡一泡。

在新疆走得多了，我被哈萨克的奶茶逐渐改造，以至于开始为它到处宣传。也许是由于疲累的纠缠，我变得“渴茶”。我总盼望到哈萨克人家里去，放松身心，喝个淋漓痛快，让汗出透，让郁闷发散。北京有两家哈族朋友，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的内心，总是不问时间地，在我敲门进屋以后，马上就开始兑茶。

哈族式奶茶的主食不是炒米，是油炸的面果子包尔撒克，这个人人都知道。哈式饮茶更重要的是音乐；毡房挂着一柄冬不拉，奶茶几巡之后，客人就问到这柄琴。他并不说

弹。主人递给他后，话题便转到琴上。不知不觉谁弹了起来，突厥的空气浓郁地呈现了。他们是一个文学性非常强的集团,修辞高雅,富于形容,民歌采用圆舞曲的三拍子。

这样，在天山北麓的茶生活就不单是休憩和游牧流程的环节,它在和谐的伴奏中,发育着丰满的情调。

视野中又不仅仅是单调草海，而是美不胜收的天山。蓝松，白雪，无论沉重或者欢快总悄然存在的美感——所谓良辰美景对应心事，所谓“四美”，好像差一丁点就会齐备。

那时禁不住赞叹。茶后人们都觉得应该捧起双手，感谢给予的创造者。我的慨叹还多着一层，我反复地联想起蒙古草原,想着我该怎样回答这样的经历。

最后是个砖茶的输入问题。砖茶是农耕中华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联系。古语有“茶马交易”,一句千钧。确实,惟有这句概括本质。其余比如“绢马交易”就未必影响远及牧区奥深;宋与西夏之间的“青白盐之争”更是地理决定历史。一个游牧社会，尤其是一个纯粹的游牧社会，它可以不依存农耕世界繁衍和生存下去,只要给它茶。

不穿绢布可以有皮衣。不食粟米可以“以肉为食酪为浆”。茫茫草海虽然缺乏、但并非没有盐池。草原蕴藏复杂;自远古就盛行黄金饰具和冶铁术。

——只是,生理的平衡要求着茶。要浓茶,要劲大味足易于搬送的茶。多多益善,粗末不拘。于是,川茶、湖茶、湘茶应召而至，从不知多么久远的古代就被制成硬硬的砖头状,运向长城各口,销往整个欧亚内大陆的牧人世界。

唉,砖茶,包括湖北四川的茶场工人在内,有谁知道砖茶对牧民的重要呢?

同样的青黑砖茶，在蒙哈两大地域里，又受到了不同的鉴赏。

哈萨克人把色极黑、极坚硬的砖茶，描写式地称做**tas čai**，即“石头茶”。对另外几种压制松紧和色泽不同的砖茶，不作过分严格的区分和好恶。据我看，他们饮用更多的是蒙古人称之“黄茶”的黄绿色、近两寸厚、质地比较松软的砖茶——而这种黄茶被蒙古牧民视为性凉、不暖、比“石头茶”差得多的劣等货。乌珠穆沁牧民坚持认为石头般的**hara čai**(黑茶)性热、补人、甚至能够入药。

三

成人之后又走进第三块大地，在肃杀荒凉的黄土高原度世。我在数不清的砖房、厦子房、土夯院、窑洞和卵石屋里，结交农户，攀谈掌故，吃面片，饮粗茶，一眨眼十数年。

在河州四乡，人们喝的是春尖茶。产地多是云南，铺子里都是大簸箩散装。摊铺主人经营茶叶买卖多是几辈子历史，用两张粗草纸，把一斤春尖包成两个梯形的方块锭子。再罩上一张红艳的土印经字都哇纸，绳儿转过几转，提上这么两锭茶，就是最入俗的礼性。

春尖茶也大多含些土，沏水前要把茶叶先扑抖一番。渐渐泡开的茶原来都是大叶，仿佛没有打砖压型的茯茶一般。我心里有时琢磨，春尖茶和蒙疆两地使用的砖茶，味道不同，源头不一，只一个粗字概括着它们的共性。粗茶对着穷日月。慢慢地，我几乎要立志饮遍天下的穷人茶，为这一类不上茶经的饮品做个科学研究。

不过在甘宁青，黄土高原的茶饮多用盖碗子。这种碗用着麻烦，其中诀窍是——有一个伺候茶的人，在一旁时时掀开碗盖续水。做客的不必过谦,尽管放下便聊天扯磨，由着那侍者提着滚开的壶添水。确实那仅仅是添一口水；盖碗子里面,民俗礼节要求碗口溢满。

在清真寺里闲谈最方便：一个眉清目秀的小满拉，永远一头津津有味地听,一头微倾开壶,注上那一口水。若是话题重大，他添水时更加庄重，注水时不易察觉地嘴角一动,轻轻地自语一声“比斯民俩西”。

在农民家炕头上也没有两样，大都是晚辈的家儿子或者侄儿子斟水。女人不露面。似我一来再来的客,日久熟识了,女人不再规避,也只是立在门口听。她若倒茶,要先递给自家男人,再转给客。贫穷封闭僻壤,民风粗砺。一旦有缘和那些农民交了朋友，便觉得揪面片子喷香诱人，春尖粗茶深有三味。老人们立在屋角,过意不去地说:“山里,寻不上个细茶，怕是喝不惯?”而我却发觉，就像内蒙新疆一样，所谓 **xiar**、**hara** 和 **tas**，所谓春尖和粗细的种种命名分类,其实都是后来人比附。在茶叶和茶砖的产地,一定另有名称和茶农、茶工的职业见解。南北千里之隔,人们径自各按各的方式看待这些茶，其中观念差之千里。若说还有什么相通之处,也许只在一个粗字。

粗茶的极致,是西海固的罐罐茶。

我是在久闻其名之后，才喝到了它的。当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种茶居然与我发生了那么深刻的关系。我还懂了:其实贫瘠甲天下的排名,未必就一定数得上西海固。若以罐罐茶为标志划分，就我陋见，甘肃的岷县也许才是第一?

满掌裂茧的粗黑大手，小心翼翼地撮来一束枯干的细枝。不是树枝，是草丛中或者能算木本的、一些豆细的蓬蓬干枝。架起的火苗只有一股。这火苗轻轻舐着一个细筒（约一尺高、寸半粗细、熏烧得焦黑的铁直筒）的底儿，而关节粗壮的手指又捏起一撮柴，颤颤抖抖地添在火上。铁筒有个把子，焊在顶沿。煮的水，并不是满罐，而是一盅。茶是砸碎的末，而且，是蒙古人称做“黑”、哈萨克称为“石头”的砖茶末子。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如同一握之草的那几撮细枯枝，居然把罐罐煮开了！我判定是因为那寸半的底面积：火虽细，攻一点。惊叹间，火熄了，主人殷勤地立起身，恭敬地给客人斟上。果然只有一盅，罐筒里不剩一滴。

客人推辞不过，持盏慢饮，茶味苦中微甜，呷着觉得那么金贵。火已经又燃起，头一罐罐是客人的——主人解释着。而炕上有三四人围坐，都微笑，欢喜这罐罐茶给客人添了个新鲜。煮滚的第二罐又不是主人家的，炕上一个老汉半推着接过杯盏。三一罐罐，四一罐罐，最后的一罐才轮到主人家——又称奇的是：头一罐敬客的茶还没有饮完。

于是大家娓娓而谈。水早已注上，火苗还在舐着罐底。很快新一轮的头一罐，又斟进了客人的杯盏里；怪的是，如此久熬，茶依然酽酽的。我十余年横断半个大西北，住过数不尽的村庄，后来饮这种罐罐茶上瘾忘情，伴着这茶听够了农民的心事也和农民一起经了不少世事——我没有见过有谁换茶叶或者添茶叶。

茶是无望岁月里惟一的奢侈。若是有段经文禁茶，人们早把这残存的欲望戒了，或者说把这一撮茶钱省了。而罐罐茶，它确实奇异，千炖百熬，它不单不褪茶色而且愈熬

愈浓,愈炖愈香!

在西海固的三百大山里，条条沟里的村庄都睡了。出门小解,夜空无月,深蓝的天穹繁星满布。四顾漆黑,只有我们一户亮着灯火。爬回炕上,连说睡睡,话题却又挑出一个要紧故事。人兴奋了,支起半个身子说得绘声绘色。“娃!起给!架火熬些茶!”于是乖巧的儿子蹦下炕,捅着了炉子。年年我一来，他们就弄些煤炭，支起炉火。罐罐茶用煤火炖,多少是浪费了些。

半夜三更，趴在炕上盖着被，手里端着一碗滚烫的罐罐茶。小口喝着,心里不仅热乎而且觉得神奇。茶不显得多么浓，只是有一丝微涩的甜味留在舌尖。我们有时压低声音，好像怕隔墙的妇人女子的耳朵听了去。有时禁不住嗓高声大,一抖擞,掀翻了被子。旋即又自己不好意思,赶紧侧着卧下。人啊人，生在世上行走一遭，如此的情义和亲密,究竟能得着几分呢?想着,仰脖咽下一大口,苦苦的甜味一直沁穿了肚肠。

* * *

不只是居城，即便乡下和草原，新的饮茶潮流也在萌动。

也许是因为砖茶产自南方，毕竟不够清真；或者是由于品尝口味的提高，——近年来又是由操突厥语的奶茶民族领先，开始了使用红茶煮奶茶的革命。蒙古人同步地迎合了改革,内蒙出现了工业生产的奶茶粉。

我用一个保守分子的眼光，分别对上述新事物怀疑

饮[illegible]首[illegible]是什么？这[illegible]极了。1981年，[illegible]的酷暑中调查古[illegible]这个维[illegible]兄弟[illegible]，就帮我立皮尺，一直干完活，[illegible]极了。[illegible]家[illegible]

过。但是，红茶熬出的奶茶，澄不出一点泥渣；伊利牌的速溶奶茶粉与乌珠穆沁女人们烧出来的茶相比，不只惟妙惟肖，甚至凝着同样的一薄层奶皮。

不管民众怎样依旧痛苦，不管他们就在今年也可能颗粒不收，从山里到川里，从青海到甘肃，黑白电视，简易沙发，已经慢腾腾地出现在农民的庄户里。“细茶”一词，正在愈来愈多地挂上他们嘴头，就像“haohua”(豪华)成了一个蒙语借词一样。

——历史真地就要合上最后的一页，悄然而生硬。

一个银闪闪的考究托盘递了过来，上面满刻着波斯的细密画图案。盘中有一只杯，半盏棕黄色的、喷香细腻的奶茶，在静静地望着我。红茶煮透后的苦涩，被雪白的牛奶中和了，轻轻啜了一口，这新世纪的奶茶口感很正，香而细，没有杂味。

我沉吟着，端着茶杯心中怅然。那么多的情景奔来眼底。冬不拉伴奏的和平，嫂子铜勺下的瀑布，黄土大山里的星夜，都一一浮现出来。那时我不是在做“诗人的流浪”，那时我和他们一起流汗劳累。那时我是一个孩子，不引人注意，在辽阔的秘境自由出入。如今饮着纯正红茶和全脂牛奶煮成的香茶，却觉得关山次第远去，人在别离。

我随着时间的大潮，既然连他们都放弃了黑黄砖茶，也就改用了红茶鲜奶过冬。暑季则喝完全是凉性的绿茶、甚至是日本茶消夏。只是，一端起茶我就感到若有所动。我虽然不多说出来，但总爱在一斟一饮之间回味。

1998 年**4** 月

师 傅 窑

如今回顾那样的地方,确实有些隔世之感。

人总是难逃次次的离别,而离别久了,又难忍阵阵的向往。

这也是在大西北惯见的一种地方。泛碱的秃山,焦黄的干沟。可是走在弯弯的沟里,看见不高的崖坎上,有个半塌的小小窑洞。山沟和窑洞配在一搭,平添着荒凉的气氛。只有一扇嵌在窑口的粗木头门,因为雕着些花,露出些新锯的白木碴,才显出这不是一眼废窑。

这种窑,不单是有人照应,还常常派着用场,让一些老者或什么人进来住下,接连几天甚至几十天地坐静,度过独处的时光。

一

记得那时我和娃娃,还有他爷一共三人,就从窑上头的这个塄坎跳下。下头窑门对着一片场,三面的陡坎,像围了一个护院。喘着在窑门站定了,说也怪这场上没有风。那

时我们看着下方，见夹沙的狂风就在鞋子下头，顺着干沟呜呜穿过。我还眺望沟口的平坦处，见一溜烟尘，白滚滚地奔到沟尽头，在开阔地里消散了。

如今在兰州的馆子，娃娃已经干了八个月。

若是他家里非要在今年里娶上亲，娃娃也已经能掏出个数。而那一天，他爷的表情严肃，粗嶙嶙的大手捏着两支香。忆着那天的步步举动我觉得新奇；山外头，文学界，那一年闹了些什么?都忘了。其实当时我尚不能觉悟到，那以后，它们一天天地，与我两不相干。当然不是真的两不相干，而是千年的擂台，咱们比个身前生后。

进了窑，风声被隔开，眼睁睁瞪着洞里的层层石渣硬土，突然觉出一片寂静。我总忘不了他爷“噗”一声，把皮袄甩在地上。大皮袄，西海固汉子的心爱物，翻着厚暖的白花花羊毛，平摊开铺着，使我看得暖和。

——即便此刻也忍不住一股冲动，想跪到那白软的羊毛上去。人声鼎沸的外界正骚情什么“千禧”。人和人就这么不同，不知是该为这伤心，还是该感到庆幸。娃的爷说，国民党的三个师从陕甘两省合围，把我父亲他们一伙子围了个生铁桶，四下里打炮。我听得入神，我没有见过家族和历史连得这么紧的例子。

百姓造反没下场，没下场……他爷自语着。

而一座孤窑平衡了成败。那以后世间便不见了一个人的模糊影子；而这眼窑，却渐渐地瓦匠木匠各修几下，成了生者对他的念想。那个冬天，娃还是一个俊秀的少年，巴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听话地跟在一旁，手里握着芭兰香。我暖暖跪坐在羊毛上，瞥一眼窑外，看见了绵延的黄土浪头。

二

一个时期里我无法安心，一个字写不下去，痒痒地幻想什么。一个背影，一个魅人的影子，充填了我饥渴的想象。如今娃已经拔节长大,到了着急娶亲的年龄。农民么，急完了春天的吃食，就忙着急冬天的媳妇。他爹不像他爷心大，自从娃进了二十岁，便忧心忡忡，生怕娶不上媳妇惹人家笑话，天天的催娃。

而我，心里怀上了这个影子，便一眼透过，在深层和农民相遇了。农民的心事，就寄托在这寒窑荒山。这么想着，久了，甚至连一扇扇粗木雕花也愈发好看，上立邦漆太白，上平价清漆太黄。添一斧过多，少一刀太少。无论当面或是想象，每次我望着它，都活生生像望着个西海固的孤苦农民，禁不住心怦怦跳。

后来恍然感到，我也该去窑里点个香。路上遇见个本省知识分子不以为然，智叟一般数落我，“你怎么把自己降低得和农民一样呢?”他说。

要紧的是我别降低得和你一样，我想。

青白色的一缕烟丝扶摇上升，纠缠又缭绕，像我们烦乱的心绪。和人事一样，地理也是不平衡的。陷入赤贫的民众，总是向土地索要些安慰。所以我们不单有脾气大的知识分子，还有机密大的地点。窑外黄土山如耀眼的白浪。我舒服地跪坐在娃和他爷中间，那缕青烟旋绕着，流入了我的怀抱。

那一年娃娃长得像个俊俏姑娘。大人们开玩笑时，说

入，我[illegible]两[illegible]情谊的孩子。

1984年，[illegible]。

以后娃娶亲不用花钱,反过来向女家要也能成。他爷呢,从来他爷不露本色,他总揽家族大事,包括引我走师傅窑。

一扇门,关着刚烈的感情。一方土地,藏着感人的地点。谜底是什么并不重要,人们在窑里找的,也许不过是个人的心愿。

我在那一年,曾经是怎么个样呢?我总在问自己。也许今天的这个并不是我;真正的我,魂儿随着一缕烟,从那天就没有回过家。

三

在窑洞里,青烟还在飘渺地一摇一闪,沉思般渗入粗砺的窑壁。艰难的是十数年如一日,人总要打发死板岁月。本来,人们虽没有那么想,可是意识里却暗暗以为,会来个什么变化。不,只有水流不尽的日子,堕落无边的现世。

青壮打工去,割麦童与姑。我也和朋友商量,把娃娃弄到兰州,向城市要钱。如今娃娃已经棱角粗拉,下巴和颧骨都突了出来。只是架子薄弱,下苦打工好像挺吃力。

后来我在兰州见了娃娃一面,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把钱拿上。娃娃说,已经挣上了两千五。再过了半年多,一次,他在远远的电话那头告诉我,已经挣到手六千个元!……我逼真地觉得,电流里传着暖暖的希望。

手抓电话说着,说着,眼前突然跳出师傅窑。有人说他牺牲了,有人猜他隐遁了,说着猜着几十年。他也永远是一

个谜,使西海固更加难解。

凄凉的风景若是看得太久,渐渐会“远视”。我就已然不见身近,无论围着什么世界。他们几十年地怀念一个人,这感情令我陶醉。我的心事、年龄、以及视野,都固定在那天,那个和娃娃、他爷一块在师傅窑度过的冬日下午。在窑前波涛滚滚的,那些红岩石白碱土的穷山,在心事和想象中生动地变移。

我喜欢这陶醉的感觉。此刻,我对面的墙壁,现出了层层石渣硬土。一股青袅袅的香烟,对着怀抱,旋绕着飘起来了。

2000 年3 月

叶密里的小姑娘

那些地方，如今对于我如同天堑隔断。怎么就那么难去呢？

我常常不解地自问。独自遐想时，天山的那个多少偏僻的一隅，总是弥漫着尘雾，太阳火热但是射不透那些尘埃。远处一线的天山有一条银顶，似有似无，在无限处谜语一般地闪烁。

那里是蒙古和哈萨克的牧场，是我在年轻时代求学的地方。一隔多少年了，我想念那些地方的熟人，总盘算再去遛遛，我知道：我和那些酸文人不同，只要我笔直地走进那些破漏毡房，秘密就要向我打开了。

其实，一共是三条大的谷地，被指状伸出的几道山脉彼此隔开，仿佛三道草的海水朝着一个方向冲来。三条谷地里，各有一座古城，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力麻里，最神秘的是不剌，叶密里多少有些语焉不详。

三城之一的叶密里，和阿力麻里以及不剌城互成犄角，排做了一幅扇面。它们各自控制着一片肥美的牧场和一条关隘。我原来的目的是彻底搞清三座城的地理位置，后来就把和牧人们交朋友当了正业。半调查半游耍，三个

城,我跑过不止一次。

我盘算着,明年该再去了。

一

多少年过去了，但总是不能忘记她，那个厄鲁特小姑娘。在考古路上,她总是在“四角”的夯土墙上,跳来蹦去,活像草滩的黄羊。她不理睬我制止的话——在额敏河的冷闪闪的波光下，蒙古人的小女儿尚未发育的身影，闪跳在似紫若蓝的、远方也迷离的河岸上。

当然,神经兮兮地念叨“叶密里”的,只是我(我在惟一写过的长篇小说《金草地》里讲过这事)。对似是而非地和文献书本捉迷藏的、沉默又扰人的干焦夯土圈子，厄鲁特蒙古人是不叫什么叶密里的，他们只保守地呼之为“德勒伯斤”。厄鲁特牧民可不像那伙新潮探险队,讲古老的蒙古话的时候，人也很难带上那种做作的电视台腔。遗址只是土圈子,“德勒伯斤”只是描述它——即四角,四方块。

二

在乌伽的心目里，我是来自蒙古本部的客人。她的欢喜里面，有着西部蒙古人对青青内蒙的美好向往。不标准的发音被原谅，错误的说法被忽略，她和另一个蒙古丫头一起,陪我跑遍了河岸的所有废墟。

我们在化雪不久的，清澈的深蓝，甚至蓝中呈着醉人

紫色的额敏河畔，查遍了每一处可疑的地方，为着确认元朝大汗的叶密里城。那时我像生了什么偏执病症，老是要去一个个地跑城——在半个中亚，在一处处曝晒得成了酥皮土堆的遗址上，窜来窜去，寻寻觅觅。

额敏河，其实就是那些叶密里或者也迷力，大致发音是 emöl，哈萨克释为生命，蒙古解做鞍子；他们解释完了以后，我说还得证明一下子。他们奇怪地问：为什么？是呀，如今我也闹不清干嘛非要麻烦北京上海的诸位四眼兄，难道哈萨克和厄鲁特从祖先到今人一直住在 emöl 不算数，只有统一了也迷里叶密里这些大舌头音，才算解决了古城今望了吗？

纯朴的乌伽，善良的厄鲁特！他们不觉得我的这种汉人脑子多么绕人，嘴里念叨着德勒伯斤，德勒伯斤，随着我奔波在额敏河两岸，考古跑城。跑过清朝的卡伦，小乌伽非要在城墙上跳房子。涉过透明的额敏河，她们两个女伴要打够水仗，洗够头发。唉，你不能想象新疆，那些美好的民族，哪怕你说的绕人荒唐，只要你稍懂礼性，你的事就很容易变了他们的私事。

河上游的德勒伯斤，是和大名鼎鼎的叶密里不沾边的马圈。河对面的德勒伯斤，是一座近代的哨所。最远处，在沿着河边的芦苇和遍地蓝花的马镰草地走了好久，最后爬上山岗以后，看见的那个德勒伯斤，干脆是一处幽秘的环形山凹！它不折不扣确实有四个角，半围着圈，德勒伯斤包含的它都具备。但是它不是城，不是人工的任何东西，它是山野，是奥深草原，是大自然的波动。我牢牢记得：一种巨大的、书呆子被揭露的体验，一种对蒙古语词入木三分的内涵的体验，攫住了我。

在那宛如边墙一样的山岗上，我眺望着遥远的塔尔巴哈台，眺望着美丽的夏秋之际的天山草原，两眼的触觉只觉美极了,心胸畅快极了。小乌伽和她的女友笑闹着,又在陡坎上显示山羊技。蹦跳之中，厄鲁特小女儿的叫嚷好听极了——而叫嚷的、重复最多的词儿,还是那个德勒伯斤，四方。

那一天，我觉察到了考古学的不幸。怪不得如今干考古的那么气急败坏,摆弄一根领带,对镜贴花黄,不放过哪怕三流的风头。

学究的一二发想，在生动的大 自然和鲜烈的众民族中,太渺小了。

三

县政府把我交付给乌伽（她是县政府的通讯员）以后，我就照例倚靠着蒙古人的小社会，考古和交游。我对蒙古语并不精通，但我对民族语环境里的那种气氛，却喜欢得如醉如痴。

不用说乌伽只是小孩子一个；八十年代初期我走遍北疆,做到全部使用蒙语,包括开调查会。一座吉普车里人人都会说汉话,但我们都不说它。 由蒙译哈,从哈到维,这么费事有必要么?我也这么问过。但是问答之间,双方都哈哈大笑。

对小乌伽没有机会 自我介绍，开始想有必要吗，后来却从心里渐渐浮出一丝不安来。在太盛情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想强调 自己的血统，想告诉他们——我不是这个

北疆。从塔城到阿勒泰,从博尔塔拉到伊犁,用一些无足轻重的“四角”当引子,我依然终日地使用心爱的蒙语,从一地到另一地,若有所思又毫无目的,寻求追逐着与人的交流。与察哈尔人,与乌梁海人。再通过他们(可不光是翻译而已),与哈萨克,与维吾尔。

干了一个世纪也没有个标准,地底下没分出个地层,地上头也没有标准器型。慢慢地我的兴趣转移了,再也不去猜谜望气,做考古状。我接受了厄鲁特的思路,一切都是“四方”。重要的是现存的生命。

我渐渐改了习惯。与其对着晒酥的土围子发愁,不如在蒙古人、或者在哈萨克人的家里,纵情地玩(或谈)它个东方既白。

慢慢地,谁都知道这是不务正业。听说有些考古科的师弟,对我很是不满,说再也不追随我了。他们说,以前不光对我的书见一本买一本,而且就连考古都学我跑新疆。我听了莫名其妙,心想你跟着我干什么,难道苍蝇还不多么。

随便讲个小故事就考糊了你这优等生——你懂什么叫德勒伯斤吗?

四

有两种情况使人怀旧,一是上了岁数,二是多了经历。不知怎么搞的,我虽然讨厌自己也没办法的是:如今翻开新疆考古的田野笔记,见了鬼一般,总忍不住一丝伤春的感觉。

一回,硬封皮里掉出来几页纸,看了好久才明白,那是当年画的“四方”。我半是好奇半是懒懒地,图纸一抖,掉出一张薄薄的纸。辩认了好久,才读出“乌伽”的蒙文字样。怔了一阵,我意识到,这是乌伽的信,也忆起了信的事。里头讲,她要一套俄语讲义。记得我寄的,是我刚读过的北师大编的俄文讲义。而书寄走以后,我就和那个厄鲁特的小山羊失去了联系。

再去看看她么?看她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丈夫?去吃吃几顿伶俐的厄鲁特阿布盖(这个词我们解为哥哥,厄鲁特人却解作嫂子或媳妇)做的饭?

不,也许我更想看看的,是她在长途车站,急切地对那维族售票员喊着“阿帕依”的情景。我甚至不由得自己悄悄喊了起来,“阿帕依!”那声音多么随便,多么亲近,多么让人莫名地伤感啊。我总是陷入这种遐想,这真不是好兆头。但愿这只是你这家伙老了!我暗自骂着自己。

那是真主慈悯的、愉快的时候。那时大家都浪费水一般,浪费着谁也没有意识到的和谐。虽然那时开的玩笑更多,争吵也不少,可是还有足够的余裕。那时我们彼此需要,谁也不必顾虑太多。走塔城,到莎车深深的巷子里去吧,和维族汉子以及女人们一起唱吧,快乐地说出蒙语哈语。道路上很安全。哦,逝去了的那些,是多么可爱的日子,多么和平的日子啊。

考古么?你是在问“四方”或者“四角”么?

在茫茫的天山南北麓,在文明的渊薮里,在那些由大漠枯山,戈壁牧场拼成的伟大世界里,“德勒伯斤”太多了!有唐朝的都督府,元朝的巴里克,或者清朝的卡伦。也有哈萨克的冬窝子,蒙古人的牛圈。它们或者规整,或者残缺,

守着谜底不泄漏一滴。它们和牛圈一样,如山凹一般,像古城似的,一色地蹲踞沉默,罩盖着浓密的草。

2000 年**5** 月

长笛如诉

一

对古典西洋音乐如同朝圣——和很多人相似，这种心情体验，我也有过。但是到了后来不能不承认这心情的淡漠。穷国野民的风刀霜日,与那些高雅大曲之间,毕竟太容易疏远了。谁去细究自己身上的现象；只不过偶尔意识到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微妙的结纽,它尚未解开。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暗自想弄得明白些。

当然这不可能,音乐是理不清的一团麻。也许,可能梳理一番的只是一些私人心事，是自己与音乐接触的背景、心境、缘分、故事。

对古典乐朝圣的时期,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虔诚,但一度也确实热心。心情也急切，进入了一股求学的心态以后,恨不得时刻泡在音响里。忆起那一期的结交,都是古典迷人士。

时代恰恰又踏上了那段路程，与许多国家二十年前一

样，中国刚进入一个卡式录音机和音响组合进入家庭的时代。我是留学生，早早便舶来了一套配置很高的音响组合。于是音乐猛地涌入日常，我寄居的简易楼终日轰鸣着大音量的音乐。从蒙古到日本，从美国的**Bob Dylan** 到哈萨克的**Engbêk kuyê**。

也许是音乐生活或听觉生活，带给了我整个八十年代的好心情。

我在美妙的听觉享受中，洞开门扉，结交上下各流人等；不假思索，在稿纸上挥泄无度。美音不能独自品茗般默听，我义务讲解，记得曾把一个朋友(他那时迷恋绘画)用大音量把冈林信康的《我们大家所盼望的》播放给他，伴以我煽动的解释。他在那些嘶吼的日语音声中，虽然不解一语，却听得哗哗泪下，这件事使我至今惊奇。

当然在音响旁，我也见多了听了一句半句就做感动状，迫不急待不怕夹生地写进个人文字的“作家”。总之，那时，我自己和小屋盛着的我的家庭，都因为美声盈室的状况而暴富了。丰足而且满意的心情，流露于我那一期的不少败笔之中。

二

而且追求的目标在古典。我生了野心，忍不住想用已获的基础，试着叩门一次。我在真地尝试去窥探古典殿堂。太偏爱流行音乐，甚至沉溺比“下里巴人”更不入流的蒙古突厥的胡音——这种现象使我暗怀不安。我好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乡间塾生，总是觉得学堂还没念完。记得我四

处求师,购置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磁带。我和朋友一道,专门请来专业人士,逐段地听他解释,并暗自给自己的耳朵判分。

应当说收获多少是有过的,获得的愉悦自然更多。但是我不能就此理解、并全部接受古典迷们经久不衰的热情。我还是保留了一丝感觉;我捉摸着关于听觉、心情、标准的问题,我在琢磨一个我能接受的音乐**A B C**。

有一件小事挺难忘。一九八六抑或八七年若干作家访问德国,在汉堡听了半场歌剧。说是半场,原因在我们迟到了,在黑暗中寻不到座位。咬耳出声时被观众们不屑地呵斥,后来一些人被引导员领到空座位暂且坐下;另几个则干脆退出来,在休息室里等第二幕再入座。

还记得终于等到了幕间休息,急急去找自己座位时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放松了紧张,倾听的神经和渴望油然浮起的滋味。我端坐稳当,从第二幕的第一声男中音开始,强力集中自己一切意念,听。

使读者意识到朝圣,让人们自律着、迫使他们学习自己的感觉,真不可思议啊。我走神了,遐想着能获得如此一切的歌剧作家多么让人羡慕。若是我们的小说散文被人如此阅读——换上晚礼服打上领带,正襟危坐忍住咳嗽地阅读,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偷偷瞥一眼侧右,是一伙日本白领。当然礼仪没有一丝纰漏,西服笔挺,头发油亮。但我看见了在东京熟悉的疲惫,看见了“社用族”(公司付款者)的表情。有一个悠忽的眼神和我相遇了,一瞬间闪过局促。它马上转回去,赶紧回到神圣的倾听。——哈,他们和我差不多,也是害怕被文明开除,寻机会听听是怎么回事,也是顺从着一个规矩。

遐想之间,又一幕降下了。我们到了休息室。突然有一位同伴建议，可能休息室这种地方引诱人的世俗性吧，他建议回家。更让我惊奇的是作家们都没有拒绝。

走在夜空清爽的汉堡大街上，溜溜达达非常惬意。大家讨论着女高音和男中音，朝旅馆走着。那时一位同伴的话，虽然至今尚未决定赞否，但我已经记牢了——他说："说真的，只有一个歌剧让我感动过，而且掉了泪。你们猜是哪个?——《供湖赤卫队》。"

一句话使大家都默然许久。虽然都是作家，不便简单地吭声。

他说的是实话。可是,关于音乐的结论是什么呢?

汉堡体验之后，我更不会判断自己的耳朵。使用那台立体声山水音响，在八十年代后半的几年里，我浏览了不知多少音乐。高雅是有的,悦耳是有的,讲究是有的,就是没有达到朝圣的境地。宁静的休憩和愉悦,对巧妙谱成的个别旋律的喜爱——都有过,但我不能简单地皈依绅士淑女的解释,不能说我也听见了他们描述的听觉。

也许我才是一个语言憧憬者。因为我终年都在雕刻自己的语言,至少常常都为自己语言的无力而感慨。我相信——语言在暧昧的时候，可能显现美，也可能封闭原意。在追求成为激动的河,在河水冲刷不已的时候,语言可能向放弃自己的神秘主义皈依。但是如此火候的语言，和本来就空洞虚伪的同类物之间,也许会出现一点相像。

区别之一是，达到神秘主义阶段的语言，会沿途留下一连的记号。如真挚朴素的小事,如他人不能的经历,如预见或奇异等等。后来者可以依据这些记号，解读荒唐和非

理性的本意,使关上的门再度开启。

音乐是这种语言么?

我不敢浪下结论。我能做的删节从略地,对要紧的事多少记下几笔。

三

和我的读者的年表不同,那还是人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尚未到来的时代。我像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先与穷乡僻壤的农民结交,后来又为自己处境的压迫,远走异乡。

那结交如我全部文章的注解一样,交得太深了。农民把它用旧式比喻说成结拜。我却嫌太封建。结拜兄弟,涵盖不了红卫兵蜕变再生、一介学生与大地民众相融、一个知识分子被异端濡染直至背叛的所有内容。

远托异乡也不是闯关东下西口。我如一片叶子,在生计的寒风中簌簌抖着,跨过海,越过政治和贫富的边界线,走了外国。

——若顺势找个词儿形容,应当说那是一段“没有音乐的日子”。或者用反义句,说那些日子里,每时每刻心底都萦绕着一股悲哀且激烈的乐曲?

肚腹的原则,生存的铁律,扳正着人柔软的一部分生性。

我在那两年里练惯了疾走,默默地以两步迈三步,奔波在东京——于我而言它是个劳动市场和战场。刷盘子,教大学,出著作。为了活下去(主要是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活下去),我的心硬了。

那时偶尔拍的一张相片曾使很多朋友震动，被记录下来的我面貌凶恶，满目杀意地瞪着假想的和真实的对手。在坚决的夺取生存所需物质的日月里，我觉察得出自己的异化。没有时间缅怀，没有条件助人，只是似乎在遥遥天际，在梦幻一般不真实的某地，好像才有过或存放过旧日的我。

在那样的时候人很难在古典音乐里浪费，虽然从第一天我就弄了个录音机，后来又买了一个音质更好的。听的内容要么彻底轻松，最好是柔美圆润的女声；要么是最狂热的六十年代摇滚——音乐于那时的我，如同粮食女性一样都是充饥物。它抚慰或宣泄，给我一天天短暂而实用的补充。

但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件。

那天我的斗室里，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气，我打开邮件,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的信。我照例细嚼慢咽,津津有味地读着。信也同时为我充饥,我对信很贪婪,并已习惯了享受它们。这一次,读到了末尾时,朋友写道:附上的这盒磁带里面,是你的农民兄弟录的话。

四

我打开磁带盒时，什么也没有料到。突然空荡荡的破旧木造小屋里,响起了一个西海固汉子的硬直嗓子。

我怔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声音已到了日本。他急冲冲地,有些羞涩又像下了一个决心地，宛如念一封接一封旧式书信似地，正在向我说话。六叠小

屋的板壁上,嗡嗡地震荡着他的粗嗓子。

我还没有从晕眩中醒转过来，已经听他几遍地讲“我们全家都很好”,几遍重复“不知何时能见你的面”。过了好久,我觉察到自己已经瘫软了,歪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这种铺席正适合我的感觉。我意识到屋里空无一人，我发觉自己一个不动的姿势，趴在屋子正中，呆呆地对着一台小录音机。

我的位置奇妙。我潜伏在声音的外界。一个使我的脑袋晕眩崩垮的西海固声音，在我眺望的对面一方异国空间里,粗硬地穿荡。

他显然克服着面对录音机的不安，努力把车轱辘般的问候话录制得流畅。他讲到录音时的情景，讲到我们俩之间那些往事。

渐渐地他讲得流畅了。条理和他主张的道理夹杂在讲述的事情中,在结结实实的声音里,向着我鼓动传播,一浪浪地淹盖而来。心中的痛苦和感动一同醒了，一个湖或是一条河涨水了,它们把我淹没,把我压倒,使我一动也不能动。

几个孩子都录了几句。当年那个在暮色中吆牛的少年，给我录了他朗读的我的作品，又录了他在县中学读的英语课文。

我听见了彼岸的孩子在紧张地喘息，听见有哪个娃娃在旁边窃笑。孩子们的声音后面，又是结拜兄弟——他已经习惯，而且想抓住机会，他沙哑浊重的嗓音开始给我交代一些要紧的、黄土高原的大事。

——就这样,在一个日本的下午,猝不及防地,我突然跌入了一个声音的深渊和埋伏。西海固的，黄土高原深奥

腹心的声音,征服了我。

当长笛悄然游来的时候,我觉出从浊重的西海固嗓音返回的困难。倒退着,我还原到一个别扭的旧状态。听觉被那嗓音磨得粗拉了,脑子也早就凝滞,我还发觉:自己的姿势居然原封不动,时间久了,它已经僵硬。

长笛的第二个乐句,千真万确不能否认的长笛声,替代了农民的诉说,像一汪细流,转了一个弯,然后淌进了这木壁隔开的空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这半盘长笛。朋友说,农民兄弟的录音仅占了磁带 A 面的大半,剩下的空白,就录进了些长笛曲子。而我,在我听音乐的全部经历中,从未有过如此感动的体验。也许惟有那一瞬算是震聋发聩。也许那个下午我蒙受了造物主的慈悯,被恩赐了一种音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日后里我曾多次企图发掘、重温、体会,但都没有结果。

我只清楚地知道——在长笛流入的过程里,我身心的壳都崩裂剥落了。我没有落泪,但我知道自己哭了。我僵硬地跪伏在六铺席的中央,任长笛的旋律围着我穿梭缠绕,如触如洗,把我一层层地浸蚀掉。我不知道人间还会有这样的感动,我的肉体层层溶化了,剩下心一派透明。音乐,惟有音乐,惟有此情此景之下显形的音乐,是绝对的美,是彻底的洁净,是这一方空间的至尊。无名的曲子,长笛的无名曲浸漫着,悠忽着,诉说着,陪伴着我,已经没有听觉,我被莫名的感动裹挟走了,失去了具体的知觉。

——许久以后醒悟过来,外面是东京的日暮时分。我关上录音机,小心地藏起了那盒磁带。默默收拾着的时候,

[illegible]人问，我就[illegible]也[illegible]是两个出[illegible]工的西海固民工。[illegible]深夜，[illegible]紧，[illegible]醉，[illegible]渐渐[illegible]得[illegible]飞[illegible]。我兴奋地[illegible]着，熟悉的风[illegible]翻滚涌，[illegible]着地的描述冲[illegible]心头。[illegible]其中的故[illegible]，和深深的[illegible]义？

1996 年，[illegible]于七[illegible]。

我觉得，自己好像再生一般，变了一个人。

五

我在那次经历以后不再信任现代派，而且暗暗地给音乐下了一个没有字迹的定义。不用说，如此主观任性的定义不入大雅乐厅堂；可是，做贵族态一生抚弄音乐技术或资料的人，比这粗野定义离音乐本质更远——也未可知。

那个白昼的下午，使我的心成了一页薄薄的记录纸，它刚涂抹了一行，但是永不消退。听觉，或者说音响碰出心脏时的触觉，直至今天丝丝可辨。

我独自反刍过，也微微责备过自己。走在人称世界物质之都的繁华中，我觉察到自己拥有的多么宝贵。那个下午之后我沉着了，我不露声色地迎送异国剩下的日子，冷静地一步步实现着目的。

但每时每刻——虽然不轻易告诉别人，那长笛常常响起，它有时突然浮现，接着逐步清晰，然后在我的胸中萦绕。它柔美又低沉，哀伤而平静，它已经追上了、化入了我生命的律动，在我的奥深不息地流淌。

就这样，对于西洋的古典乐，我经历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

在疾疾的人流里，我独自穿行奔波，不住地默想着一个兄弟重逢的场面。

那时天该晴了，高原上空走着清爽的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如清朝污吏“申兆林”，他们消失时无声无息。西海固荒凉而温柔的十万大山，那时会伸开母亲的臂膀，再

一次搂住我这失群的儿子。

那时天穹六合、大地四野中将只有一个声音：我们弟兄的长笛。我将把录音机放在庄户的窗台上，接给电源，安上珍藏的带子——那时十面埋伏的乐队将从海浪般的山峁背后，突然间一齐吹奏起来，庆贺人民的光阴，兄弟的相聚。

六

有一段时间我求教过音乐界人士，想调查一下这盘长笛的曲名作者，也想知道对这些曲子的定评——也就是公认的听觉。找了两个人，各自见仁见智，听觉完全不同。我问：那么是否可以说，人对音乐的欣赏是主观的呢？他们说不，还是有客观的分析途径。

我只好只信任自己的体验。长笛和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大西北的日子，百姓的受难，书生的遭遇——没有这些条件，长笛的乐曲能是丰富的吗？反过来，如果听者主观的情绪把听觉染上了一层色彩——那么音乐的本意，还能够穷究吗？音乐与欣赏之间，会不会本来就是一本误读的历史呢？

——转了一圈，我没有找到音乐的定义。我不仅不再追究洋乐，也不在乎机器以及指挥乐队。附着于音乐的一切物质都可有可无；惟有耳朵，惟有耳朵主人的内心，才与音乐密切相关。

我没找到，也不想追寻一个观点了。要紧的是在我内心的收藏里，终于有了一首古典的、西洋的音乐。一首，但

并不少。它命定般音沉似铁,虽然也伴着丰满阴柔。甚至它究竟为谁而写也不再重要，我多盼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者,一己的姓名可以略去,历史的是非也可以不计,但是给人以感动，给世界留下一点儿神秘。我猜曲作者没准能同意我,说不定还会为我的诠释高兴。

音乐本是天籁,是人对它的幻听。长笛在高天飘忽,鸣唤低诉着，等待着下界的回应。而我们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少触碰那盒长笛与西海固农民口信混录的磁带。我有一种恐惧,怕那种过分强烈的刺激,更怕若是听惯了,那刺激会被磨掉。第一次的听觉太难忘了,它占据的不光是我的耳朵还占据了我的感情；我害怕后来的听觉会单薄,我怕耳朵捣蛋,乱了人心中美好的方寸。

包括机器，我不愿使用北京家里的立体声，更不愿把我的长笛插进哪台最新锐的高烧音响。那个孤单下午的音乐,是用一台黑色的小录音机播出的;我明白,任凭哪台机器,也不会原样地还我那天的听觉。

我珍藏着那盘盒带，更珍藏着——即便此刻还在痛苦地奏鸣着的我们的心事。它那么动听,那么悲怆,那么激烈——它不是音乐；因为音乐的表达是不够的，它背衬着鲜艳的画面,怒吼着嘶哑的诗篇。它一响起便与它共生的,有满目疮痍的凄厉风景，有连年干旱的山顶麦子，有永远呼唤着我的、那西海固汉子的嗓音。

2000 年 10 月

树梢上的心

这样的体验应该告诉你。那一天我独自一人，从晨起到晚间沉默了一整天。但是我的内心却经历了黑白分明宛似两极的体验。也许这该称作一种被迫的相悖相反。一极是难以形容的恶心，另一极是丰满的感动。两者都是因为读了一篇关于新疆、关于天山的文字。

我不告诉你那令人作呕的篇什是什么了，在我的书里我只写美好的一极。

读了我的一位哈萨克朋友写的，关于惨死于新沙皇枪下的哈萨克诗人恰克里姆(**Qaklem Kuday-berdi**)的介绍那天——整个下午我欲哭无泪。忍受不住，不能控制地翻箱倒柜，找出了听说根据恰克里姆的诗谱成的歌曲《**Jürêk**》，颤抖着手指，把它塞进已经坏了很久的、灰垢蒙满的音响。

这里必须要说一句“赞美真主”，因为那个下午简直出现了神助，我那台哑了很久的破机器奇异地转起来了，为我不是尖细或闷沉而是完美地送来了恰克里姆的句子。

这样的体验一定要告诉你，朋友。哪怕在残酷的夏季也别灰心。可以用我偶然找到的这个办法，医治自己，抵御

猖狂的病毒。

纯美的女声充盈着一方空间。那是一个健康的文化，从遥远的天山诉说。那女声给我们的联翩浮想与他们不一样，仍然是恰克里姆形容得好：

你不可能再遇上这可以交心的姑娘
我爱她，是因为她闪烁着真理之光

她低缓的叙述句句排比而来。每个连句都在结尾高昂，挑出一声呼喊。**jürêk** 是一个阿尔泰共同语词，不仅哈萨克，万里之外的蒙古人也能听懂它的意思：心。

这首歌用一个残酷的比喻，问了一个在道理和伦理的极限上的问题——有个年轻骑手，他被爱情俘虏，愿为美女献出一切。而美女的条件是绝对的：那么，把你母亲的心拿来。

尽管他在边缘上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但是他做了！他抱着那鲜血淋漓的心，飞一样地驰向情人。疾驰中不留神，马失前蹄他摔下鞍来，一颗心被抛了出去。

当他正挣扎着的时候，突然听见那颗心在唤他，原来母亲的心正挂在梢头，责备不知小心的莽撞儿子。

Aynalayen oy, jang bala oy
唉，小宝贝，我的孩子
Kuladeng oy, sên jaman
摔成了那样，是你不好

我说不出这两句词给我的刺激。我知道这刺激也非要

猖狂的病毒。

纯美的女声充盈着一方空间。那是一个健康的文化，从遥远的天山诉说。那女声给我们的联翩浮想与他们不一样，仍然是恰克里姆形容得好：

你不可能再遇上这可以交心的姑娘
我爱她，是因为她闪烁着真理之光

她低缓的叙述句句排比而来。每个连句都在结尾高昂，挑出一声呼喊。**jürêk** 是一个阿尔泰共同语词，不仅哈萨克，万里之外的蒙古人也能听懂它的意思：心。

这首歌用一个残酷的比喻，问了一个在道理和伦理的极限上的问题——有个年轻骑手，他被爱情俘虏，愿为美女献出一切。而美女的条件是绝对的：那么，把你母亲的心拿来。

尽管他在边缘上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但是他做了！他抱着那鲜血淋漓的心，飞一样地驰向情人。疾驰中不留神，马失前蹄他摔下鞍来，一颗心被抛了出去。

当他正挣扎着的时候，突然听见那颗心在唤他，原来母亲的心正挂在梢头，责备不知小心的莽撞儿子。

Aynalayen oy, jang bala oy
唉，小宝贝，我的孩子
Kuladeng oy, sên jaman
摔成了那样，是你不好

我说不出这两句词给我的刺激。我知道这刺激也非要

用哈语听才能获得。哪怕为了彻底弄懂这两句，也值得你我学习哈语。

而听懂了的那一点点，我能解释么？**jang bala** 难道能译成“小宝贝”、“好孩子”、“小巴郎”么？**sên jaman** 这个词组又怎么译呢？“你不好”、“不听话”、“真淘气”么？我只能说，掠过心头的疼痛和浸过心头的温柔，都丝丝清晰。

你问结论么？和你一样我也在思索。但是无疑他们的命题浩大而庄严，一种健康，使我们羡慕。所以我说，用这样的音乐洗涤，是一个简便的办法。上午那股恶心，因世论的丧失正义和不顾事实而带来的不快，被一荡而尽。像一座青吉斯山矗立在绵延的天山山系中间一样，恰克里姆一如他的诗，他们将在天山中永恒。我们不仅可以去摹仿恰克里姆，就像他宣布自己是托尔斯泰的学生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恰克里姆的歌和货真价实的艺术——陶冶自己，消遣时光，让日子过得丰满有致。

就这样，《**Jürêk**》使一方空间，使包围一下子变成了纯净的音乐。整整一晚，次日晨起伊始，我沉浸在东不拉伴奏和清晰的女声诉说中，心中默默充盈着感激。人生中无论遭逢什么，只要有这样的音乐陪伴，就应该说，我赞美造化，回赐已经足够。

恰克里姆在诗的路上走到七十多岁。当他在天山深处的青吉斯狩猎行吟，住在蓝松白雪之间的圆木屋里，终日思索托尔斯泰的种种命题时，暴政的屠刀杀害了老人.

幸而天道还在庄严运行，一切最终还是被更强大的力量平衡了。当恰克里姆被恢复名誉以后，他的诗一下子传遍开来。好像他早就妇孺尽知一般，到处人们都在说着他

的名字,到处都在演唱他的诗篇。

最初的那场音乐会已经变成传说。在那次演唱会上,据说,当温柔的女声讲述起一颗母亲的心,当《**Jürêk**》不尽的叠唱一遍遍向满场听众呼唤着 **jang bala** 的时候,台下呜咽渐起。从十二岁的童年就随着家人受难、经过了五十多年的牢狱流放刚刚归来的、恰克里姆的孙女,颤抖着白发,泣不成声。

我还是在年轻时,在蒙古草原当牧羊人的时候,就习惯了"心"这个词。乌珠穆沁叫它 **jürêh**。我虽然很难想象挂在梢头滴血的一片心,但我不能假装,说 自己没听见那声 **jang bala**。

报刊上泛滥着代谢的文字,像暴雨后的垃圾场。蚊蝇在街角狂欢,一边唱起了民俗的猎奇,一角拥挤着探险的表演。忽而是下水道发现的报告,忽而是联欢的转播。

——而松林的树梢上,那片母亲的心一直淋漓地挂着。

记得在乌鲁木齐,我曾经对一位年轻诗人说:一天也不要耽搁了,快点学习语言!……但他转过了脸。

那么还是把一切托付给未来的公正。

其实关于天山,文学迎接的审判将是简单的——那颗树梢上的心将宽恕一切。哪怕对最下流的动作,母亲的心里只有悲悯。

不,没有报复,没有清算,没有恐怖主义的反击,没有给劣等文人的打分。梢头上那颗心高高地照耀着,用不着探险家去发现,用不着教授们去评论。她教示我游牧民和穆斯林的文明中核,她传授我爱的武器。

是的,做为一名作家,我与你们非常之不同。因为我提着笔时,不仅视野中总是浮现出母亲的那颗**jürêk**,而且耳际还总是听见那声深沉的**jang bala**。

2000 年**10** 月

祝福北庄

一

最初听得很模糊，有消息说，好像在北庄村里有我的文章。后来，有个兄弟在电话里又说，他听人讲，在北庄老人家的墙上贴着我的一个散文。

我闻言心中吃惊。老人家的宅院，是究里的深处、是大名鼎鼎的门坎；我的浮层文字怎会贴到那里去！但传言使我不安，我在电话里嘱咐兄弟，要他抽空亲自去看看，然后把情况仔细告诉我。

不多时回音来了。“确实，你那北庄雪景，端端地挂在老人家的正房墙上。我不多说：你看照片吧。我拍了照，已经给你寄去了！”

只是在看见照片的时候，我才明白事情的重大。我看到，那篇《北庄的雪景》被用电脑打印成竖排黑字，又被绫边挂轴，书法作品般地裱成了横幅，挂在老人家的道堂兼客厅的中央。我不敢想象——我那两三千字，我涂鸦的那个

随意凡俗的小文,怎能挂到了那里!……而且那是穷乡僻壤的极地啊,那是伊斯兰的东乡!我在看见照片的一瞬,心中刹那空白,耳际嗡嗡轰鸣。

一时思绪还不能够梳理通顺,我只是意识到:这事于我又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它如同又一次降临于我的传奇,使我猛然地淹没在幸福里。刹那间我不由得暗暗感赞。我明白:这是我的人生大奖,是我一生心血的回报。我知道它将永不磨灭,长久珍存在我的心里。

北庄老人家与我之间,十五年里,见过三四面。

在我独自寻求于一条小路的那些年月,他如一个遥远的山里传奇,伴着神秘的东乡语,吸引着还年轻的我。

后来我得以拜见他;那是一个大雪倾泻的日子,他披着一件光板羊皮大氅,如一个朴实的老农,坚持坐在下首。

头一次,当然他不会记住人群中的我。后来,谁知道时光流逝如此迅疾,随着我对浮层之下这一领域的深恋不舍,我不仅熟悉了大西北的礼性,更对这块风土,有了愈来愈专业的理解。

末一次我们见得匆匆忙忙。他来北京开会,拜会的时间,真的只够说一句赛俩目。下了友谊宾馆的台阶,握着老人温热的手我只觉得留恋。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我让老人家挂念了。接着就是文章被错爱的事。

一个念头充斥了我的大脑。

——要全了我的礼性!要亲自去道谢!

紧接着,这个念头慢慢膨胀,迅速丰满了:这必须是怀着一种举意的道谢。一个消息,对于我它是一个饱受劫难的民族的奖励——从天而降了。它如一个1字,如阿文字母

满 金。

1988 最于东

表的第一个艾里夫。那么，我的答辞，我的道谢，也要包括信仰世界的解数。

我要在低低的坡下头就停了车。绝不能傲慢地让车开到老人家门口。我要进了门先要汤瓶净身，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再坐下喝茶。我要言谈举止如同毕业答辩一般讲究，不能人家客气我就不拘小节。学着以前看在眼里记下的西北礼性——抢着掀门帘让着出门，抢着下炕为长辈拾鞋。

东乡人都在猜想老人家的举动呢，要让那些庄稼汉感到值得。也要让那如此错爱了我的老人，获得一星半点——他从不追求的慰藉。

走着神不禁噗哧一笑。我突然联想到，在城里的文人堆里，怕没有谁说我谦虚。尺度规矩是什么呢?我也闹不清楚。

七月的东乡，滚滚无边的黄褐，染点着层层的碧绿。是千万座疤伤累累的苦焦大山，到了青枝绿叶的夏季。刺目的视野，好像在无声地提问。是啊，怎么愈是穷苦的绝境，愈有这么旺盛的活力?

望着七月的黄绿，心里觉得不可思议。在老人家的庄户里小住的几天，沙目前邦答后，我喜欢站在门口，眺望海一般的山峦。

对这个庄子来说，我是个多么罕见的客。胸中升起感慨。虽是自己的身上事，却千真万确如他人在做。真的，一

只无形的巨手一推,我站到了老人家的门上。

四顾荒山如海,远近一派寂静。从几个意义上来说,这里都是中心——它是一间讲东乡语的穆斯林最敬重的长者净室,它是一个地跨数省的大教派的核心场所,它是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是黄土高原的奥深腹地。

此刻正是西历的二〇〇〇年,世间在上演着各式的活剧。为了领受一份情,为了致上一句谢,我越过了数不尽的山河阻隔,站在了这里。

老人家,这个词其实是双义的:一半是尊称,一半意指教门主持。当地人,从县委书记到娃娃妇女,都以各自的礼性,称他阿爷。这么称呼有一点阿尔泰语言的味道;我很喜欢,也学着喊阿爷。

与城里出没于座谈会的教授不同,他使人感到一种深度。坐在他的对面,我感到,自己在揣测一种实在透了以后的深度,在感觉一种朴素尽头才有的威严。

他仍是率领一群人,像举行仪式一般在门上迎接。我如同来前想好的一样,在下头就跳出车门,跑着上坡到达他的跟前。不错,这正是我人生的发奖式,在大西北的重重山岭中央,一个纯朴的人群接纳了我。就这样我拉住了北庄老人家的手,感动电流般袭过全身。他深陷的眼睛笑着,白髯在风中飘拂。他依然温软地握着我的手,神情似满意似慈爱,但并不能看到深处。

见了面以后,阿爷和我没有提及那篇挂在墙上的散文,一次都没有提到它。我只是偷空去那横轴下留了个影,像一个领奖的,不好意思又心里喜欢,偷偷地抱着奖杯留个影一样——毕竟太难得了。

次日礼罢了邦答，阿爷引我去脑后山坡，看了一个蓄水池。

水，对东乡的旱渴大山金汁银液一般贵重的水，已经到了家门口。一问才知道,原来“北庄的雪景”时,我在这里喝的是窖水!听着吃了一惊,眼前仿佛闪过 自己的影子。向着文明，时代毕竟迈过了艰难沉重的几步。即便比起我初来的那时,绕山引来的水,以及不再妄想的富裕,都缓慢地出现了。

阿爷的一生,宛如大西北穆斯林的缩影。幼年念经,青年负笈叶尔羌求道,五八年的白俩(**bela**,灾难)中,因莫须有罪入狱。

女人拖累着几个孩子,受尽了人间苦难。她苦熬着等,一年一年，直等到四人帮灭亡前的几个月时，她气力衰竭了,猝然倒下。只差几个月,没等到丈夫的平反出狱。

十几年浪迹西北，这种受难故事听得太多了。也许就是它们,扭转了我的人生。迪各尔之后,在北庄拱北,望着阿奶的那座小小砖墓，她差一步没有熬到新光阴。我心里难受得堵噎。

而阿爷却转身快步走了。

他惯于不多描述,对历史只讲一遍。感情更不流露;转头就走的他,像是不愿纠缠这个话题。环绕着拱北,矗立着东乡疤痕累累的大山。满沟满坡,活活刻着百姓的心伤啊,如此不平令我难忍。

但是前头走着的阿爷沉默，坟里睡着的阿奶沉默，我也只得沉默。是的,难忍的经历积得多了,就成了深深一个忍耐。

有人问:您走北庄去干个啥呢?我的回答各式各样:去深入生活结合民众，去浪一个耍一趟，去沾个白勒克提(**barket**,吉庆)……对世间,我算说不清了。哪怕对自己人,只要火候仅差半分，我也难以解释。对着这片接受了我的大山,来到这穷乡僻壤的极地,我有满腹要说的话,也有无法讲出的话。

顺着山里的公路,我们随意散着步。

初来时触目惊心的大山，此时看来柔和些了。像是个难得的年成，农民们星星点点蠕动在高山深壑，在块块破碎的洋芋地里忙碌。

时而驱车,多是走路,散着步身心彻底地松弛了。仪式之后,险峻的风景也变了:如今它像是自己的。心中摇荡着富足的感觉,我信步走着,看看旧日的窑洞和遗址,看看大夏河的台地。

山里的冷夏,使疲惫的人得到了调养。

ن

若是能重生一遍，我猜我能当个不坏的塔里普(**talibu**)。塔里普就是经学生,西北称满拉,东部叫海里凡。因为我从小喜欢学习；长大后学得多了，愈发止不住地企图向本质的领域求学。只不过——同时把学问和人间、知识和信仰浑作一体；同时要求着人生实践和读懂书籍的、所谓一弓两弦境界的“学”,怕只在这个领域。

可惜只能留待来世了。如今，每当我在这个世界里遇

到了有真才实学的人、禁不住想向他打听上一二句常识的时候，总得先摇着手声明："我可是瞎汉（文盲）！说错了您不骂！……"

顾虑万一失了分寸，住定以后，我不多去阿爷的正厅纠缠。

而阿爷，似是来待客，又似要深谈，常到我歇息的屋里坐坐。那些时候，我清晰地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求学时间，但更经常任它静静流逝——与如此长者的言谈分寸，简直是艰深的艺术。

有一种文化讲究"腹艺"，即追求默默不语中的交流。与北庄老人家对坐闲谈的时候，我觉得似乎出现了这种交流。

七十多岁的阿爷是个慈祥老者，但他出言简捷，而且话语极少。以前觉得，老人家的脸庞那么美，而后来又觉得，他那美好像正融化成一种慈悯。这一次，我觉得他变得更大了；形容的美，眼神的爱，都变化成一种敞开的朴素。他不爱絮叨旧事，也不愿担忧来日。无论对眼前或身后，他似乎都怀着一个决意。但凡此世的事情，就是他淡漠的事情。

他深陷的眸子瞟过来看着我时，我感到，他像是向我探询一个遥远的、不知在哪里的话题。我应答不上，但我肯定地点了头。……宝贵的、价值千金的时间啊，就这么在默默无言中流淌过去了。时间好比流水，把送给我的信息哗哗地笔直冲来，它们淹泡着，冲刷着我的肉体，使我身心浸透。但我并不能点滴吸收，洞悉全部。

我恨自己的根基浅，不能参悟所有一切。能悟到的只有一点：我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的贵重。我只能暗自地、一

刻刻地数着时间,体会 自己度过它的感觉。

对教门和神圣领域的话题,我只听不问。

关于遥远的叶尔羌，以及他年轻时的负笈远途，我们只粗略地说了几句。幸好我已不是初学。在血染的大西北，在一个个村庄，入门的课程已经过了。现在深一层知识的学习,需要通过参悟。

我习惯了交流,而不多通过言语的交谈。也许,修身和功炼,就这样渐渐成形了。关键是什么?我似乎解决着这个问题,又似乎不断地和这个质问相遇。

裱好的那《北庄的雪景》,一直挂在正厅。确实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言及它。只是一次忙着去哪儿，一回头猛然见深沟陡壑的大山，像要踩着脚跟一样就在背后矗立——刹那间我的心头滚过一阵颤动,不禁想:不知这一个我,和屋里墙上的那一个我,究竟哪个是真的。……

日影黯淡,晚暮来临,地平的连山变了深色,沙目的时分又到了。

望着阿爷的朦胧面影，我心里漾动着惋惜。短暂的小住,眼看就要结束了。可是对我，以及北庄的后来人来说，关于未来的疑问毕竟是尖锐的。我还是问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阿爷说的简短坚决。落日霞光之下，他的神情使我永生难忘。但是我不得不写得坦白:恰恰在最要紧的这搭,我没有句句听懂。

我无法用笔转述。就连感悟，也多是自己的思路。总之,他早把一切置之度外,包括一切究里的、责任的、传统的大事。就像当年在冤狱把一己的安危性命置之度外一

样。他早把一切托付给那冥冥之中的伟大存在,他坚信,如信仰一般地坚信。

从那间小小净室出去的时候，我们都轻提慢踏，一个个悄悄地离开。只剩下阿爷一人,久久地独 自面壁跪着。偷偷瞥过一眼，他的侧影一动不动，美好而平和。沧桑结束了,他正享受安宁,正沉浸在一派纯净之中。

我踏出门外。头上是繁星璀璨的东乡夜空。高原如黑暗的怀抱,温融地四面围合。

塔里普的学习就是这样，进了寺不管八年十年，反正要念罢十三本大经才算完。我呢，我本是来领取幸福和荣誉的，可我不知不觉却又把享受当了课堂。而学有学的章法,不管你能吃透几分,十三本已然翻过了一册。

知识、火候、情感错综渗透,如夜空的星月浮云。每一颗星都那么闪烁难定,如同课程刚刚开始。是的,对如此的一册一页,我还要耗费更多,才能触到全部。

突兀想到了鲁迅。他俩相比的话，也许阿爷是幸福的。东乡大山在四下卫护,没有谁敢上这儿扰乱。银河临近得伸手可触，月亮静挂在中天。好像它们正散出无限的银辉,在这样的夏夜,安慰着北庄。

* * *

其实，或许我也算久经阵场，但是这次离别不知为什么，居然那么揪动心肠。我孩子一般总想着这怕是最后一次了,别人还没怎么,自己心里先难受起来。

北庄拱北对于我，更多地是一个与底层民众盟誓的式

场。有“雪景”那一年,我连阿布黛斯都不会洗。我只是对那株白雪地正中的、墨绿的分杈柏树印象深刻。那时它浑身披满了白雪,一尘不染,一痕不留,沉默着矗立在茫茫的雪山中央。如今呢,即便在我一己的身上,也是如梦的沧桑。北庄,我能够这么离开你么?

走那天,送的人很多。书记和县长想顾全礼性,所以都来了。我本来想象的,在离别一刻可能体验的——北庄的仪礼,动人的都瓦,成了一个喜庆的欢送会。我有一个蒿枝沟的弟弟,闹着要我题字。还说:“让他写!让他写!跑了今天再抓不住他!趁着在北庄老人家跟前,他不敢不写!……”恨得我咬牙。可确实当着老人家,我不好耍脾气。只好勉强写字。笔不合适,墨也太浓,纸更不对。第一笔下去就写坏了。

顾不上了。只能胡涂乱抹,哪怕为了围抱的欢乐气氛。老人家、三师傅、满拉们、书记、县长、司机、厨子,都围着看。

给老人家难道能七步诗么,实在写不出。编了半天,结果弄了个“清洁的精神”,字写得像小孩描的帖。这哪儿行呢,一着急,前头赶紧用阿文加了个**B-ism Allah**,太斯米。接着给书记写了“与民众同在”,给县长写了“满目黄土如金”。直到给老人家的儿子三师傅写时,心才静了一些。我写的虽然仍然不是书法,但流利些了。纸眉上头先是一行的阿文:**Amantu b-Allhi kema huwo**,意思是让咱们在中国信仰,中间是一句心里话:“祝福北庄”。

2000 年斋月

人道和文化的参照

▲ 能否请您先谈谈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

● 中国作家对国外文学的阅读，大概是全世界读得最勤勉的。比如，我在日本期间所得的印象，日本作家读英文作品的人或许有但不多，读中文就更寥寥无几。读翻译的中国作品，则是为了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情况。言及中国，遗憾的现象是对中国的“warukuchi”(坏话)泛滥；对中国是一种减号的东西，多受青睐。因为，那能使日本人的某种——由于读物与其对中国的判断丝丝入扣，而得到快感和满足。日本尤其有一种潜意识存在，那就是——当今的中国文学应当如同当今的中国人一样，猥琐、不洁、缺乏丰满的内部。日本其实代表着一种傲慢的西方观点：中国若有文学，它就应基本是暴露的，它涉及的哲学和人生范畴应该是已知的。它当前的艺术则如电冰箱，应该晚于欧美日一代；又在东西洋的合资下，终于迈出了一步。要注意三寸金莲迈出历史性步伐时显现的“美”，它是应当获奖的。还有一条是——在屈原陶渊明的古典结束之后，中国文学已经不可能，所以也不应该表达高贵的精神。

被西方激赏的中国作家，往往被装进了上述的玻璃

瓶、无形框。解密这些作家的数码是：他们确实具备才能，但就本质而言，他们对西方是已知的。所谓虽在意料之外，又早在意料之中，正是今日东西交流依据的心理。

加上中国人几近绝对的实用、合理、功利主义，百年翻译未必旨在尊重他人文化。小语种毕业怨天恨地，阔语种出身数典忘祖。与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的歧视声音里，中国之日本文学“绍介”，呈着一脸尴尬的媚相。学术的浮躁，造成了一连的负减，也使深刻的交流更困难。

当然我不能说，交流史整本都是误读连续。对人类文化包括交往的积累，谁也不能一概无视。我只是说，我强调的现象也是真实的：一般说来，具有强大文化包容的，具有强烈自尊的（我说的并不是民族或国家的自尊），以及游移出了西方现代文学步伐但又具备现代主义意味的中国文学作品，恐怕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不是它们与日本或其他西方知识分子（而且是左翼的或进步的知识分子）交流的时候。

若举例——不，我不去嘲笑愈是不懂一句外语愈是对外国文学如数家珍的现象了。我只想说，我们很少留意小说背面那些外国作家的立场；他们对我们的眼光也差不了太多。我不加入“数家珍”，虽然我也喜欢一些外国作品和作家。

对我来说，我阅读的外国作家于我的影响不是技术，而是立场和文化。他们使我在立场和一些重大观点上，获得过很要紧的参照。在巨大的惯性与闭塞中，人要吸些新鲜空气。只是，交流的愿望愈来愈淡漠了。因为我也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我的广袤伟大的穷山野岭之中，找到了一种土文学。完全对等，这土文学也挺难和人交流，在他们自身

发生了改变之前。

▲ 您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又在国外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外国文学特别是日本文学、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是否有一些自己的了解呢？

● 由于上面的原因，我几次滞日，都只与中亚学术界来往。也只是在休息，或工作中需要外语的句式措辞等参考时，才读一点日本文学作品。

人家的嘲笑和蔑视并非毫无道理。在我极其有限的阅读中，我很留意日文作品中引我羡慕的惟美情绪，以及表现在一部分作家身上、使我叹服的知行一致的精神。此外，尤其在部分女作家中醒目的，一种天助作家成名、则作家之声名即正义之利器——的现象，也使我喜欢。

在六十年代学潮中，三岛由纪夫曾企图与占领东京大学造反的左翼学生沟通。在乱糟糟的教室里，挤满的学生和三岛之间的谈话记录，无疑是一份宝贵的文献。事后，三岛在与和他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左翼作家之星高桥和巳对谈时，两人话题大量言及造反学生。惟高桥记录了三岛如下的宣言：

>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
>
> ——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不久后就是他的自杀。确实，在中国本土早已荡然无存的王阳明知行一致说，有了一次淋漓的实践，但却是穿着皇军军装的实践（围三岛而结成的右翼结社“楯会”服装酷似军服）。反之，做出如此行为的作家，其“刻于语言”的

本意也因此光芒逼人。不知行家里手们是否心有所动；我面对如此的“语言”和“行为”,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

我想高桥和巳也一定有过类似的羞耻感。文坛上默默演出的,简直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如果右派都不惜命、如果苟活的惟有左派那岂非讽刺？于是不久后高桥也死了。他留下的遗稿题为《遥远的美之国》,只写了序章。人们说,他以酗酒 自伐。

这几页遗稿很难懂。高桥和巳早在以前的《邪宗门》等作品里，就显示出他对宗教的可能与否，进行过拷问般的探索。既然他不愿随波逐流,他必须据有一个精神靠山。早就不为人觉察地表述过异端思想的他，从起步到终结，怀着的当然只是一个梦。理想且虚无的,美之居所的梦。斟酌再三,我译了这序章的几节。序言如是说：

> 我在到达那国土之前的遍历中，……偶然自幼小时便听闻的这国度的风光的明媚、人情的温纯敦厚，以及清洁且知于礼仪的民族性，等等，都在我的内部几近绝对化了。……在我生国，久远以前便已寂灭的宗教，而且那是我此刻正求皈依的慈悲的教示——在这个国度里，正如出淤泥之莲花开放。在幽玄的美术里，在文学显现的悲哀中，尤其生活感情带着喘息的微末传闻——使我憧憬这个国度都已足够。
>
> （引自《文艺——高桥和巳追悼特集号》P. 167，1971）

读书如黑暗中的发掘。但是其中有一丝游移的暗暗思

路，我已经可以辨认出来：他也是从荡然无存之中，发掘钩沉塑成憧憬。他是以朦胧的古代中国，做了所谓“美之国”的模特。

这是与三岛对谈之外的对话。至于二人的对谈，以及三岛自杀后高桥在病床录音做成的《自杀的形而上学》，则理解深刻地解释了三岛的行为轨迹。

> 据我的观察，成为一个契机的，依然是全共斗左翼学生的抬头。……三岛对当时笼城于东大安田讲堂里的学生非常在意。他说，他们的行动做为政治行动不是太无效了吗？对他的话，我说，不是那样，全共斗运动在属于政治运动的同时，借北一辉的话说，做为正义运动的一面也很强烈。他立即说：“啊，那就懂了！好，那就做为这样来接受。”当然但凡正义运动，可以理解自会有它的表现。
>
> （引自《对于人》P. 84 新潮文库，1979）

如此的文人纠葛中，藏着一种不易解释的彼此尊重。派翼的对立，地位的竞争，没有遮蔽了一种对更大的荣誉和原则的承认。美意识暗潜其中，使我莫名地感到魅力。

更有正义的主题，如早逝秋瑾的遗教。人们通常以为，女作家天然该是正义的看守者。可惜我们的这几根风骨，更是蛀空蚀尽。远观日本女流勇敢介入战争地域、营救难民、募捐并亲自运送；处处谴责暴行帮凶、具体地为一个个的人权奔波的行为，我难忍心中的感动。

她们以声誉为弱者呼吁的形象，那才是女作家之美。

这令我心仪不已。日本女作家犬养道子的散文《武器》(刊1997.9.《世界》),是我在九十年代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作品。

我确实不拥有——愈是对手,愈是知音的环境。这么感叹是否多余呢?我们的作家无论男女,并不以他人的尊严而喜怒。虽然大家都在叹息说:作家愈来愈多了,真正的作家却那么少。

真正的作家,必须具备良知和艺术,必须拥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与气质,包括高贵的行为方式。

在八十年代,包括我本人在内,中国作家呼吁过"形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内容";而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要知道那些百废俱兴时的一些热点,并不是太高级的命题。二十年后的现在,应当呼吁的是——人道的立场,文化的尊重,惟这些才是我们需要的参照。

▲ 关于作家及中国知识分子与原文阅读、与接受的外界文化的关系,或许会逐渐成为一个问题。您自己对此是怎么看的?

● 语言是我心中的一个最有魅力、也最遗憾的大问题。由于年轻时突兀地被抛到了完全异语并且异文化的蒙古大草原,我便养成了听听"原话",不管人家怎么说,我要听见"原来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半响。拒绝原话,听不见声音,而哇哇论述的作风,是一种作伪、霸道、低能的作风。

人们通过中译本获得一些启发,一般不会无益。开卷可能有益的原因在于,人人内心都有一种模糊的东西,通过一个哪怕蹩脚的译本,模糊的基础可能被唤醒。若是作家,自然会施以职业的聪明,这可能促成一种提高。只是要补充说,启发在能够唤起模糊的文化基础同时,也能诱惑

投机的心理。

而我先是受了经历、后来是受到专业的影响，特别向往原文和母语。我喜欢至少稍做探求地、接近语言的秘密。我将永远为自己没有能多学几句外语，比如为自己不会维吾尔语，而抱憾终生。我也将永远怀着那一点我尝到的异族语言的滋味,而悄悄欢喜。

我用蒙古语开始过自己的作家生涯，我用日本语写过两本著作。但这不意味着我有可资狂妄的水平，只是记录了些微的语言的感觉——我只是想说，哪怕仅有一瞬浸泡于语言，尝到它无可替代的魅力、也被限制于它的规矩——那感觉太神奇了。

语言各自独有的美，和语言的结实力量，使我永远地赞叹着。对语言不可替代的体会，使我总是警觉地留神别人（尤其别的民族）的不同立场；总沉湎于——真正朴素的,人与人互相懂了的想象里。

▲ 评论家认为您的创作受到了苏联作家艾伊特玛托夫的影响,您自己对此是怎么看的?

● 我本人也的确受到艾伊特玛托夫的很大影响。不过我同样希望话题离开旧式的思路。应该主要注意的，是天山,是天山住民的渴望,是作家与文明母体的关系。他的天山小说于我，更多的是一种哈萨克—柯尔克孜以及天山民族心情入门。

对如此优秀的民族入门书，我国汉语读者对它的误读是以轻松的、学院的方式进行的。《查密丽娅》是一部很著名的作品。但译成“查密丽娅”，却很像一个欧洲的人名或俄罗斯的名字，其实它是哈—柯等族常用的女孩名字“江

米拉”(**Janmila**),题目给人的影像,也许勾画了我们头脑中多少走样的天山牧民影像;它是一种旧的、对柯尔克孜—哈萨克的想象。

早该在五十年前解决的题目既然阙如,那么今后的一个大题目,仍是对天山、对天山这个地理和文化世界的理解。待到历史打算审视的时候,我猜不少今天的文人骚墨,将为自己的浅薄,为自己有意无意对他人文化的歧视而羞耻。

对于我来说,艾伊特玛托夫帮助我懂得了蒙古之外的另一种游牧民族。对我来说,阅读直接与视野的开阔关联,也是一次重要的体验。那以后,我常独自比较这些不同类型的牧民,年轻时代在蒙古草原插队的经历,以前是借助学术,这次是借助文学,得到过一种很大的展开和归纳。

语言的问题在这个例子中非常突出。只举一个例子:

他的通过俄文在中文里被译成《骆驼眼》的一个小说,题目译得远未尽意。“骆驼眼”的原文为“**bota köz**”,“**bota**”是一岁的骆驼,也就是驼羔,“**köz**”是眼睛。在牧人看来,羊眼睛难看,但骆驼的眼睛很美,而“**bota köz**”则是地道的“美目”。哈萨克和柯尔克孜人一读到这个词,就会马上联想到美女,而她的特点是眼睛特别漂亮。诸如此类,充斥在艾伊特玛托夫的作品之中。

如果指一条捷径——若你对天山东部诸族的心情有本事感受,那么你就能看懂艾伊特玛托夫对西部天山的描写。

▲ 您在这里不仅谈到了对外国文学的误读的问题,实际上还涉及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学术界特别是比较文学

界忽视的问题，即国外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您能否谈谈具有关联的某一种外国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哈萨克族文学与哈萨克斯坦文学、柯尔克孜族文学与吉尔吉斯斯坦文学、内蒙古文学与蒙古共和国文学之间具有哪些共性和差异性？

● 不用说，我们的评论家们更不会知道，同样在天山的母体里，还有许多远比艾伊特玛托夫重要的作家。比如，哈萨克著名诗人恰克里姆(**Qaklem Kuday-berdi**)等因文学而惨遭杀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用生命与作品一道要求着良心的判断。八十年代末，恰克里姆的诗歌《**Jürek**》(心)在演唱会上被一句句重新唱出的时候，全场泣不成声。而艾伊特玛托夫呢，在他的后期，也许是由于地位的高高在上，作品追着环保轮回等时髦，显现出一种萎缩，比前期要差得多。

前些天我在北大地理系做讲座，有一个学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你过去的比较艺术化的写作？"他的意思，可能是担心我后来有不重艺术性的倾向。而我想，稍有些聪明，收获一二果实，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做一个真正有灵魂的知识分子，一个在历史激流中最终不被淘汰的作家。

恰克里姆说："这条道路上，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先行者。"他还说："我是托尔斯泰的学生。"——同样做为天山之子，恰克里姆的思索要深得多。这说明了他的水平，在这样的思路上，恰克里姆使我感到极大的共鸣。

如恰克里姆一样的作家，用他们的人生乃至生命，当了作品的注释。文学的圣殿里，就终极意味而言，容不得作家的一点作伪。哪怕社会暂时处于承认赝品的时代，哪怕

以学识指导社会的学者也多是赝品，哪怕思想家没有能力指导时代，既然寄生文笔就要提醒自己：作家的成色，在经受着历史老人严格的审视。

或许，当我们的教授还在打磨那把生了锈的艾伊特玛托夫小刀的时候，那些挂在天山树梢上的、血淋淋的心在呼喊着历史的公正。无疑还要等待；当人道的水平提高的时候，人们对文学的见解也会提高。

只是，一方面让关于中亚文化和人民命运的知识付诸阙如、一面却把艾伊特玛托夫的命题反复提出，这表现了我国评论界基础的陈旧和眼光的偏差。虽然艾伊特玛托夫确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我还是想问：是否所谓阅读，也应该接受历史老人的审视呢？

我曾做为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在火车上，蒙古的一位副总理邀我们共进午餐。他背诵起著名的《**Mini nutug**》(我的家乡)，神情就和一名牧民一样。我对他说，这首诗也曾影响我，这是诗人达·纳楚克道尔吉的不朽之作。蒙古人民令人永远羡慕，他们有如此深厚的共同感情。听着他们吟哦《**Mini nutug**》，那感觉永远难忘。

六十年代的插队，使我身临异样文化的奥深，身体灵魂都被荡涤一过。确切地说，那以后我的文化和思想，也被冲刷一新。这种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时期，它艰难而富有深蕴。因此我很难容忍(也为此被人们愈来愈不能容忍)对少数或者弱小民族的形同侮辱的采风，以及炒作“发现西藏走过新疆”之类下贱的动作。

顺便说一句，对国际流行写法如数家珍地絮叨不已的人，不光大都不懂一句外语，也大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文盲。

▲ 您的《心灵史》同时吸取经、史、诗的特征，大胆穿越门类边界，创制了一种特异的小说新文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从小说对中国伊斯兰教派哲合忍耶历史的讲述，可以明显看到其中所透示出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涵。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您的文体创新的尝试，除了创作主体的创新意识所起的作用以外，也是您直接或间接受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学/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穆斯林作家是否都具有显著的伊斯兰意识？他们的文化认同是否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认同于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认同于伊斯兰文化？

● 《心灵史》中没有阿拉伯文化或波斯文化的影响，虽然它有强烈的宗教性质。它描写的和它经受的，一切都是最中国式的。至于我，无非是我接受了百姓的委托，为他们执笔，写了他们的一部历史。它无非显示了我的气质和道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形式。

这样一步走完，我可以平等些地读——比如恰克里姆的诗歌，和三岛由纪夫的文论了。我们都生于太沉重的时代，那么多人为之死了。直接影响我这部作品的或许是日本和哈萨克的文学。我用这样的行为，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它同时是我对血统和文化的母体的报答；是我生而为人，一世只求一次的“语言”和“行为”。

作家的选择其实命定于他的本质。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每当我观察健康的民族，总为他人的气质迷醉。无论高桥和巳，无论恰克里姆，他们的一句话一件事，都显着气质

的美。然而我们周边,若当真地显迹张扬,哪怕暴露了你的一丝气质,风必摧之,人不能忍。

只是,文学的前途,最终要归结于气质的底色。

至于穆斯林文学,那是一个不小的世界,它当然是形形色色的。比如它们与环境的维系,与文化母体的维系,与宗教的维系。从地理上,它有具体的国家地区,如中亚的文学、波斯的或阿拉伯的文学、马格里布的文学、安达卢西亚的文学……;从文化上说,有持具体的伊斯兰文化观点的,有的则不然。作家的选择和道路,形形色色无法归纳。

至于我自己,在知识分子中流行对穆斯林的歧视的时候,我喜欢宣布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但是当身在穆斯林之中或生活在他们的聚集区时,我留意是否发生过我们对更弱小者的歧视。讲得多了可能不好懂:但《心灵史》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建议,也是对穆斯林们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中,包括以苏菲精神反对缺乏悟性的原教旨主义。

请允许我就在这里借一页纸角,写几句结束语:

同步地受惠于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如果你有悟性看见其中的宝藏。如我自己,我的书写语言是汉语,我受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启蒙和哺育。我幻想用这么一生去追逐一点沟通,倒不是由我去沟通中国和伊斯兰的文明;而是沟通——腐烂不止的文学,与古代中国的精神。

2000 年**6** 月

三月大坂。被牵着[illegible]我的坐骑。

1980年，[illegible]于吉木[illegible]八。

音乐履历

在平庸的日子里，有时会忽然听见一串乐句，像风在哪里摇动了一株异样的树枝。它与众不同，不是一般常说的悦耳。它也不同于古典的庄严、流行的疯狂。我至今还没有找到概括它的语汇。我只是霎时若有所思，一瞬感觉到了心魂被牵扯，有时当场站住，痴痴地听下去。而它却多是似是又非；一阵风飘了过去，就再也追寻不上。迟钝的、失聪的日子又淹没而来，又将久久地不能和它相遇了。

何止没有听出谱子歌词，即便感觉和滋味也再不能分辨。哪怕固执地寻访，但是已经追问不清——已经与它永远地失之交臂了。

这样的体验一旦被自己意识清晰，以后再听人议论歌曲音乐，就会觉得难以插嘴。人不会喜欢自己的沉默；可是怎么说得清呢，那种夺魂的神秘和亲切，那种迷人的坦白和浪漫！

我很少和人谈论歌曲。哪怕是当人们谈到一些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强烈支持的著名音乐家；更不用说对那些充斥电视的老鼠腔狐狸眼、对那些厕所苍蝇一般嗡嗡繁殖的“伪歌”了。

渐渐地我必须习惯一个“偏激”匠名声。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结论，我在漫长的、差不多走遍了北方的过程里，无数次地审查着自己的感觉。不管手里忙着什么，我的双耳总是在倾听。我用触觉留意，处处盼着与我念盼的歌子相遇。迎着那些清风般吹拂而来的、使我爱恋的歌，我再三地看到了——在这人间和大地上，存在着洗炼的诗句、特定的和鬼斧天工的旋律，还有导致着一种种音乐类型的、几乎无可概述的神秘气质。

它们是真实地存在的。

无论谁，在他活一世的路上，都会与音乐主要是歌——发生若干关系，虽然质类深浅不同。我也一样，我可以用一连串的歌子，把自己的履历编写一遍。

我回忆起伴奏着各种歌声的过去。追忆中我不住地咀嚼着其中的意味。我不禁吃惊地发现，我居然长久地独自涉水，逆溯着冲腾的水流。那些在往日漫不经心地哼过的小调，正滚滚淹没而来。它们至今仍在强劲地冲剧着我，继续着对我的改造。

一

一九六八年夏天，当我和两个同班同学扒车插队，混迹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队伍里，翻越了张家口大境门一线的长城，紧紧抓牢解放牌卡车的木栏板，奔向苍苍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时候，我们嘴里哼的是清华老团的《井冈山的道路》，是还没改词的《长征组歌》，和被大小三军宣传队唱红的、谱曲不同的两套《毛主席诗词》。

在那条剧烈颠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们没有发觉：自己唱着的歌，和自己将要迎送的生活，其实各自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

时代的伪装，相当全面地隐蔽了这种区别。

那时的草原，正在席卷着红色歌曲大潮。只不过，没有谁指出过它其实是“汉式”的。那时不仅人人都在唱《毛主席的著作闪金光》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且还正在一个小节或一拍之间，拼命地塞进好几个蒙语单词。虽然已经住进这片将要安身立命的草地，知识青年们却没有怎么担心自己的蒙古知识缺乏。我们只是兴致勃勃地在那轰鸣的大一统主旋律之中，和贫下中牧们一起大喊大唱。

——只是，非常不同的是，在这种大喊大唱时使用的，是一种新鲜的语言。

最初的蒙语学习，最初的对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喜爱，居然就在简直可以说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今天我才懂得：多少人永远不能接近的一步质变，被我们跨越得简单至极。此刻回想，只觉得不可思议。

时代的野性也鼓励了在这个方向上的兴趣。因为，突兀地加于我们的，还不仅是压抑的政治和干瘪的“艺术”，更有亘古沿袭的——骑马游牧生活。

青春的欲望和活力，在骑马的生活方式中，被释放和平衡了。

随着第一件袍子穿破，随着对牧人生计的熟悉，以及在生产队（今天叫嘎查）的家族和人群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昔日的北京中学生们闯过了蒙古语言的第一道关口。应当说，在这道关门里的一片空地上，很多人都停步了。生

活总算有了秩序，余下的只是谋生，他们不打算再费力改变。

而且，谁也没有要求过谁什么。

可是，在另外一部分北京学生的内里深处，却不易察觉地滋生了一个细胞。

起伏的牧草，合理的饮食尤其是奶茶，鲜艳的袍服，骏马和忠实的狗，慷慨而不道谢的作风，引诱着启发着他们。追逐畜群作息，观望水草迁徙的日复一日，使他们的身心渐渐熏染上了一层蒙古牧民的、难以形容的气质。

压迫人的政治空气，并不能阻挡敏锐起来的蒙语听力。那么人就会向着魅力倾倒。对于我，就是向着蒙古旧歌的倾倒。

是有生第一次吗？当我初次从一种异族语言中接触了那样的表达时，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是，几乎就是在感到兴奋的同一个瞬间，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和这些歌不发生关系。

“十两黄金打成的摔跤服，在后背的上面闪着光。”而在草原上听的时候，它的蒙语原词不仅比汉译更富画面感，而且韵律间还有悠悠的赞叹：

Arban lang – gin altan ǰodag
Arin – e dēgür gilalǰina…hoi

和汉语是多么不一样呵，它居然是句首押韵！**a** 对 **a**，阿勒巴(十)对阿楞(后背)！年轻的我叼着草棍，躺在牧场上想入非非了。真绝呀，接着：“二十两丝线绣的花护腿，在护腰

的下面闪着光”：

Horin lang – gin holgai tōxiu
Hormuič dōgur gilalǰina…hoi

从十两到二十两，从穿戴到籍贯，传奇的摔跤手独龙章被吟咏了一遍。最后，“百两重的一头走骡子，在场子中央小走着出现了”—— **ǰō** 对 **ǰō**，召（一百）对召西（**ǰōsin**，摔跤场）。当然，还要懂得什么叫走马的“走”（**ǰorō**），否则想象不出那头走骡上场时又稳又摇的神态。

牧民们非常耐心地解释说：走骡，据说是古来角斗场上的最高级奖赏。低一级的奖是全鞍马；再低一级是马；然后是牛羊。我究根问底：那么为什么骡子重一百两呢？牧民们哈哈大笑。

躺在草地上的我，捉摸着这种奇特的性格。这些旧歌子，对词汇的使用简练得几乎吝啬，比如动词“闪光”就只是重复而不替换。而名词则是全套的蒙古话，排着队一样，滚滚而来。最新鲜的是，从来枯燥的数词在这个队列中无拘无束，活泼又可爱。

就这样，我接触了韵脚、音节、词首和句尾。也是这样，我第一次见识了朴素而有趣的比喻、排比和比兴的艺术。对于一个在一所重理轻文的工科大学附中里，几乎从未接触过文学的中学生来说，对于除了小人书和语文课本，再没有谁为自己开拓视野的普通北京孩子来说，这些异样又对仗的蒙古词儿，是一次新奇的启蒙。它们像灌顶的雪水，像开窍的一击，弄得正在草原上寻寻觅觅，精力过剩的，刚

刚满了二十岁的我满心欢喜。

第一首学会的旧歌是什么？是《乃林呼和》还是《独龙章》？时至今天记忆已经模糊了。记不清我那时是用汉字记的音呢，还是用别字连篇的“准蒙文”加上俄文字母和汉语拼音。我耳朵竖直地听，右手急速地写，把老人们好不容易才吐露的一句半句，不求甚解，先记下来。

恐怖的政治，从来直接压迫人的歌唱。阿爸额吉们没有忘记谨慎，他们往往唱了几句就后悔了，生怕因为宣扬古旧而招祸。他们在教了几句以后，往往就神色不安，渐渐坐不住了。“拜！都是旧东西，拜！”他们连连挥手，坚决不教了。但是，我大多已经胜利地记了下来。

由于蒙古长调的用语的朴素和口语化，诸如“大海喇嘛的祭会上，它七十三次跑第一”那样的奇句，往往让人一听即熟，过耳不忘。这种朴素成全了我，使我不至因为没听懂、没记住，而落得过多地得而复失。这种朴素不仅使我感慨，而且至今使我体会不尽。

歌词因人而异，古歌在每一个歌手那里都被随意增删。我忍住烦，费劲地一个人一个人地反复打听。后来我懂了，确认一种介乎民间流传和传世古典之间的旧歌，是一件不易的大业，歌子的生命也就在于它的衍变。但我的要求不高，我的愿望只是大体学会立即上口；只是用这些异色的歌来强化自己身上的、那被我满心喜爱的牧人味儿。

那是我的最初求学。

我在马背上游荡，琢磨着远近的老人。歌子成了我的心事，我用一切办法引诱和启发他们开口。一般在羊群安稳的时候我就去串包，然后端着茶碗哼出半句；他们大多不可能憋住，大都会接下去。当然求学不能只靠这些小伎

俩；在严酷的草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随人的品质改变。记得在我教游牧小学的那个冬天，有一次刮着凶狠的白毛风，放学时刮得更猛，四顾天昏地暗。我把布德的小女儿抱在胸前，踏着雪把她送回了家。那一晚，布德似乎为了报答，他拉起了四胡，唱了一个晚上——我记词又记谱，手臂都写累了。

那一夜在我的经历中相当重要。许久以来我一直认为，那一夜使我突破了向着底层的人的防线。近来，我又总是想，是那一夜使我靠近了真实的音乐。

蒙古民歌启发了愚钝的我。似乎心里有一丝灵性在生成。几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终于，我遇上了那首神奇古歌，当然，它就是长调《黑骏马》。

至今我依然对这首歌咀嚼未尽。你愈是深入草原，你就愈觉得它概括了北亚草原的一切。茫茫的风景、异样的习俗、男女的方式、话语的思路、道路和水井、燃料和道程、牧人的日日生计、生为牧人的前途，还有成为憧憬的骏马。我震惊不已，它居然能似有似无地、平淡至极又如镂如刻地、描画出了我们每年每日的生活，描画出了我那么熟悉的普通牧民，他们的风尘远影，他们难言的心境。特别是，他们中使年轻的我入迷凝神的女性。

这支伟大的古歌无可替代。顺便说一句，小说《黑骏马》在改编成电影以后，我一直觉得不好过多议论。如果只说一句，我觉得电影对那首古歌勾勒的基本游牧世界的画面，以及它叙述的那种古朴的生活方式，缺乏神会和探究。自然，耳朵和眼睛都随人而异，也许那古歌能给人不同的印象。它给予我的，是一种异色的诱惑。多少年了，它总是给我不尽的感叹和启迪。已经不能计算有多少次，我从

完全不同的角度,一再地对它惊奇不已。

不错，我已经和它结成了一种秘密的授受关系，好比芨芨草丛生的雨季洼地，它常年浸泡般地，徐缓地改变着我。而我,每当我听见了它遥远的流音,我就想竭尽全力喊出一响回声；我总想以它象征的生活本质，批评傲慢而空虚的文化。

歌子促进着语言。岁月推移带来的语言的熟悉，又使我学会了更多的歌子。我没有对证过别的朋友，也许我学的并不算多;不过是,我一直在吟味而已。

至于旋律和曲调，至于蒙古民族为什么找到了这种音乐，对于我还是一个深邃的谜。我常常对它依仗着那么简单的因素就能保持的、那么持久的生命力，反复地暗叹不已。

唱蒙古歌的要诀是必须骑马。

若是不骑马，无论如何也不会唱得 自在。而一旦马儿奔驰起来，身随马，声随蹄，那么无论是谁，又都能倾吐出一串又一串 自由至极的、颠簸滑下的长音。歌唱在这个火候上，其实是无所谓好听与不好听的；只有这么唱，才能骑姿和唱势都舒畅，才能使人马世界还有心情，都达到和谐。

在驰骋和呼喊的纵情之中，人痴醉了，有时我真的觉得 自己化成了雨点般的蹄音。歌声只是在奔跑中的随地抛洒。盈溢胸膛的,都是 日复一 日的心事和渴望。在马鞍上，耳边风疾疾呼响,欲望被鼓舞了。旋律话语都不用改变,那种呼啸颠簸之间的心情,和古歌里唱过的毫无两样。

四蹄的敲击密如雨点，体重一压住鞍子，歌声就被颠得破碎，坠跳闪滑着脱 口而出。一瞬间歌手不敢相信这是

自己的声音——唱惯了我就胡乱总结：著名的蒙古长调的自由滑落部分，也许就是这样诞生的。只是，尽管有闪跳而滑落，它的定义仍然只能是“长调”。

什么叫典型草原？也许，只有古歌的描述才最传神。蒙古草原的地理，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了这种歌曲。

和其他民族比较，比如和高山牧场上的突厥游牧民族的音乐比较时，可以看到平坦草原给予古歌的特性。峻峭的森林和冰峰山谷，使得突厥人的弹拨乐就像密集的马蹄。而绵延起伏的地理特点，却夺取了蒙古古歌的主调，赋予了它长慢的旋律、舒缓的节拍。因为，只有辽远地尽着喉咙和呼吸的极限，伸延再伸延，才能够得上这坦荡世界的无限。加上华彩装饰一般的、激烈的跌滑，它描写和抒发了——这无论怎样疾奔驰骤也走不出去的、草之大海里的伤感和崇拜。

当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在世界的一隅，我学会了在六合八方汹涌的草海里，匹马独行，心高气远地歌唱。那时曾是多么痛快呵，我记得那分分刻刻的愉悦，甚至是狂喜和兴奋。

记得那时我得到了著名的白音塔拉的竿子马，它的颜色叫“切普德拉”，即通身红艳、但有银色的鬃尾和白蹄白唇的马。它非常快，飞一样的下坡时人会失重。一夜，我在从一道山梁向下过瘾时身子失重了，瞬时心如开花一样甜甜地醉了，长调脱口而出。我忘情地在高高的音阶上扬落跳转，随着马儿冲下长长的草原。颠簸的、妙不可言的歌唱感觉，伴了我一路。

还有一次，但却是另一匹马；我在同样的发疯般的飞

驰放歌中马失前蹄,连人带马翻滚了几圈。正是初春,满地湿雪,我摔了个头晕眼花。但是坐了起来,呆了半晌,用雪胡乱擦着脸上的血迹,第一个念头是——唉!我还没唱完呢。突然我忍不住独自笑了起来。回到家里,和兄嫂额吉们一说,大家又是一阵捧腹大笑。

后来弹指二十几年。

身不由己地,我几次重返过草原。或许,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感觉“放生”么?一九八五年夏天的一夜,我在蒙古哥哥的长子巴特尔的陪同下串包做客。回家时,抬头看见,正是月上中天的时分。月儿姣好,真的像半个静静的银盘。繁星璀璨,夏夜的草原在暗暗引诱。

我要放纵了。借着满肚子的酒劲,我半是醉了半是有意地,剧烈地在马背上东倾西歪,恣情地把当年的古歌一一吐了出来。马儿冲过呼屏·乌拉,驰过汗敖包西侧的丘陵,巴特尔无奈地紧贴着我,他紧张地随时准备救护,几次企图夺过我的马笼头。而那时他甚至还不算儿童,只是一个虚数才两岁的婴儿。他把奶子叫“乎”而不叫“苏”,光屁股只穿一件连裤的羊皮“格登”。

那是实实在在的、美丽的夜草原,墨蓝的天穹下,只有我们俩骑马飞驰着,穿过一座座毡包,顺着倾斜的山坡,飞奔回家。

马儿驰下山麓,长调激越起来,尖锐的拖音在高扬处还能三折三叠。我兴奋得想哭。在北京,平日里,我哪能这么痛快地大吼大唱呢?后来,巴特尔说我那一夜是完全的烂醉,“aimor!(吓人)”,他说。而我明白,我是清醒的。原来自古牧人一旦有了心事,就在马背鞍上,把它缓急轻重地撒掉。我要用草原的夜歌,把心中的堵噎撒尽吐净。

到了一九九六年，从我插队数的第二十八个年头，我又一次回到草原。因为额吉逝世了。二十八年过去,世事沧桑,牧区富裕了。家家都端出健力宝和啤酒,我穿着团花的崭新缎子长袍。依然是巴特尔陪同我四处转悠；只不过他不是骑兵护卫而是驾驶员，我坐在他的嘉陵牌摩托后座上，听凭这小子驮着我，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危险地从山顶笔直冲下。

我忆起十几年前,老人六十一岁的“jil”(本命年)时,我们就在这里，在炉火熊熊的烘烤前，围着她此起彼伏地唱起《乃林呼和》的情景。嫂子的破长袍拖到地面,她搅着铁锅里翻滚的奶茶，铜勺不断地朝铁锅流下棕色的小小瀑布。她带头唱起了那首歌唱母亲的古歌，调子起得又高又陡。大家应和着,不知怎么都有些羞涩;因为当着老人动了感情。歌声高锐地拔地而起,久久地缭绕不散。我当然使出丹田之气紧跟。我唱着,也舍不得地注视着。那一夜多么难忘,我们复习古歌和往事,炉火照红了脸庞,长调从半圆的蒙古包天窗扶摇而去。

老人在应该离开的时候离开了，没有拖累和病痛。我虽然因她的逝去而长途奔来，但是我懂得，牧民的习俗中并没有吊孝。我还是只休息身心,半躺着喝奶茶,用蒙语扯家常,在巴特尔陪同下出游。

我和哥哥的话题依旧:孩子,燃料,畜群,羊毛价钱。我们都觉得，彼此谁也没有变。我们避免过多涉及母亲的话题,尽管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都在想着她。

我们都喜欢一面散漫地谈着，一面在营盘左近散步。辽阔的草浪方圆之中，少了的只有一个人，那位生养了他

和影响了我的蒙古母亲。草浪在靴子上摩擦，历史就在眼前。一股无声的气氛,莫名地在四周升起,又轻悄悄地四散落下。我感到了古歌在走近,就是它,那音乐和汗乌拉的草海一样浩渺苍茫，它逼近着，我简直就在与它对岸相望。《二十八年的额吉》,突然我想到了一个题 目。

那一夜我失眠了。以前我从未在草原上失眠过，而那一夜我满心都是句子、单词、排比和比兴，都是骑手们烂醉地纵马驰过,高喊着我写的歌词的幻境。

一夜过去，我编成了几个半截的句子，几个想用的关键词，几个……一个野心突兀地出现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思被它俘获了，我一下子沉浸在对久疏的蒙语的寻词摘句之中。

次日我用纸笔写着想，又多了几个半截句子，几个比喻,几个想法的表达。

次年，我还在对着它发愁。尽管心中反复涌起着一团强烈地堵噎，尽管旋律有时已经轰击和裹挟得 自己不能忍受；歌子没有出现，纸上的它，依然还只是一些句子、几个段落、一行行蒙文。

一直到了今年，到了写这篇散文之前我还没有放弃幻想。我想在这一节收尾时使用它。可是歌没有写成。我绝望了:我缺乏足够的修养和才力。

二十八年变成了三十年。尽管我真地从对一种古歌的喜爱,神差鬼使地走到企图写一首如此的歌；但是，万能的造物平衡着人的成败,制限着人的野望。

绝望并不痛苦，它是温暖和深沉的。在计划以后写的散文《二十八年的额吉》里，我会把那几个零散小节和半截句子整理一下,但我已经不会强求了。

也许可以说，在蒙古草原上的日子里，我听见过自己这条生命的，可能的和最好听的歌唱。马和歌，我发觉“这一个我”正合我意。如此一种感觉，决定了此生我的做人与处世，惠与了我以幸福和成功，也带来了我要接受的一些麻烦。无论如何，感激草原，它使我远离了另一种——我想是可怕的存活方式。如今口顾，何止单单是一时横行的“红文化”；游牧乌珠穆沁和蒙古古歌的履历，拖拽得我如同坠落一般，剧烈地倾斜了自己的选择。

我开始朝着一个魅力世界坠去。一个幽灵已经潜进了我的肌骨筋络。它在我的深处凸动着，催化着血肉的一次次蜕变。直至今天它还在鸣响着、挣跳着、不可控制、重现不已。我不知这是福是祸，我不敢判断究竟该骄傲还是该自省。我只知道它使我此生再无法回头。反正它不会全是坏的；至少，平庸顺从的人生，猥琐噤声的人生，与它赋予我的气质，已经不能协调。

二

随着一个个的变化，后来我从一个职业牧民变成了一个职业写作者。裹挟我的时代也从六十年代来到了蜕变更新的八十年代。现代正冲淘而来，带着炫目的色彩和轰鸣般的声响。

忆起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可能不少人多少都会有惜春感觉。时值百废俱兴，现代艺术如强劲的风，使我们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穿着磨破的靴子、冻疤尚未褪尽的我，那时对自己教养中的欠缺有一种很强的补足愿望。回到都

市我觉得力气单薄，我希望捕捉住“现代”，以求获得新的坐骑。那时对形式、对手法和语言特别关心；虽然我一边弄着也一直在琢磨，这些技术和概念的玩艺究竟是不是真有意味的现代主义。

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领域的故作玄虚和暧昧怪奥，使我浅尝辄止和心里疲倦。一个朋友的介绍，使我偶然地碰上了冈林信康的歌曲。初听时虽然有振聋发聩的新鲜感，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遭遇，对于我见识“现代派”有多么重要。

关于日本歌手冈林信康，我已经写过三篇小文，还有他的一张 CD 解说词。此外用日文发表的，还有我和他在《朝日 Journal》上发表的对谈《从两个边境看到的文化》，以及论文《绝望的前卫》。我不愿写得更多；我曾表示，就对冈林信康的分析和介绍而言，以上的文字已经够了。

但是在我的音乐履历中，这一格如同学历：一个被蒙古草原的古音涂抹过耳朵、但还不能把握它的含义的现代人，或许需要一个类似学院的阶段。谁也不能拒绝现代。如果歌声和音乐真的与人的进步息息相关，那么音乐的路上必须有一个究及现代的阶段。

对于我，那是离经叛道的、极其新鲜的体验。我久久地不能分辨，它的声音是肉体还是一种质地的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听觉和思路，在这些念头中间被撕来扯去。

过分清晰的，带着喘息和胸腔震鸣的原样的肉声，给了我异样的、首先是生理的感觉。有一个评论家说，他听冈林的音乐会时，像被铁锤猛砸着后脑。那种过度的刺激，把人几乎是一阵风般掳掠而去，使人完全不能抵抗。

不用说我们听腻了赝品和恶心的作假，这种嗓音当然因人而异。只是他不同,十几年听着,不管我怎样审视和挑剔,我还是一次次地肯定了他。他的音质很难形容,哪怕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浪中，也藏着那一丝特质。他的声音比常人高出一阶，这不单使他在嘶吼中游刃有余，尤其在低唱时,带有一种透明的男性质感。

这个质感很特别。我发现由于这个质地，他和别人区别得很清楚。在录音带或唱片里,尤其是在音乐会的现场，只有那一丝本质任他回避而不能掩饰。它时隐时现，深藏又闪耀,如隐现的磁场,悄悄地抓着听众。是的,哪怕在他唱得最放纵最疯的摇滚时期，那些怪诞野蛮的话语里仍然挟着一股神圣的音素，使人不断地联想到歌手的牧师家庭,和歌手的唱赞美诗的幼年。

与歌声共存的,是歌唱者的脸庞。那样的歌,要求着与歌手彻底一致的形象。后来冈林信康曾经对我开玩笑说，他可能有俄罗斯血统。装帧者曾利用他的形象，在一张唱片广告上把他画成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有一双低垂的眼睛,长发蓄须,在日本人中罕见而拔群。变幻的灯光照射之下的他，回荡的声浪浮托之上的他，给了默默听着的人们一个美男子的确认。

这些是视听中的现象。只是他的现象特别诱人思索。谁都知道,缺乏内容的表达,是不会达到美的。如果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算，我追踪和倾听了他十几年，渐渐地我明白了他始终在竭力调动着自己复杂的经历，顺遂着自己的天赋。

他立志做一名牧师的少年时代，他练习拳击以感受肉

体痛苦的故事，他的考入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又退学放弃教会的选择，他的著名的在山谷贫民窟出卖体力、当日雇工人的体验，他买了一把劣质吉他一鸣惊人的传奇，他的作为六十年代左翼青年的“民谣之神”、大红大紫的记录，以及又突然遁入乡间 自耕 自食的行为，他的被人牢记不忘的名曲《山谷布鲁斯》，——他不仅极尽了歌星的风流，更积蓄了宝贵的体验。

三十年一弹指而过。其实如果缺乏底蕴，那么过了中年以后，明星的能力就大多衰竭了。对于艺术和思想来说，时间的含意是严峻的。

在日本，在六十年代的群星纷纷凋落以后，惟有他，不仅能成功地完成重返舞台，而且还能再三地掀起波澜、保持着 自己的存在价值——我想，他的异乎群类的特殊体验，是关键的原因。这种向自身经历强求力量的努力，有时甚至使人觉得难过。他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和我的对谈中，突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还是最近，借着老父亲做手术临死的时候，才终于写出来一首。可是结果呢，老头还是没为我死掉。”在场的人一片轰笑。他指的是抒情的《**84** 冬》，一首凝视着病床上的父亲的歌。日后我几次重读那本《朝日 **Journal**》，总是不由得盯住这段话，心里不是滋味。

只有开一代风气的鲍勃·迪兰（**Bob Dylan**）才擅长的写诗才能，在这个日本歌手身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诗句不定不羁，人们很难猜出他的念头由来。这种自由的才能在早期就已经显现，他能在凶狠粗重的摇滚和呓语中，突然插入非常直接的轻柔抒情。比如《**Hobitto**》。他编了一个自己在“**Hobitto**”（咖啡馆名）里遇上一伙要去示威的左翼学生的故事，由于那些女大学生娇声邀请，就决定和他

们一块去跟警察干。半路上碰见一个唱他的《朋友啊》(此曲一度被当成小国际歌使用）的青年，捉弄了那害羞的青年后继续前进。见了警察后他抡起武斗棒，对准警察的脑门一劈而下——而警察也在同一瞬间掏出了手枪。冈林信康唱得又疯又痴，节奏快得如同快板书。两段相接的当儿，他居然还对唱片外的听众说："您受累啦"。而"究竟武斗棒是劈开了警察的天灵盖还是没有劈开，警察的手枪里是打出了子弹还是没有打"，他的结尾句是"请听下回分解"。

而在一堆如此的乱暴合集中，他又突然用单调的口琴声和吉他和弦伴奏，唱起秋天的红叶，凤中的芦草；叙述"姐姐已经有了，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前面的小五月子，已经成了，已经成了小姐姐"——表露他宁静的另一面，表达他比普通人还要平易的感情了。

我又开始有了一种模糊的触觉般的感受。

那是继草原以后，对一种语言滋味的不确切把握。冈林信康的歌曲使我对又一种语言有了体会，日语的语汇限度和暧昧、它的特用形式，使得这种语言常常含有更重的语感。他的歌词则在这一点上更突出；时而有入木三分或使人如受袭击般的刺激。而我并没有太留意：我正在双语的路上增加记录。

我觉得这都是为着躲避；为着躲避人们要求他暴露真心的逼迫。一切都是依仗才能，当然伴随着捕捉旋律的作曲才能。艺术的残酷说明着社会的残酷，人们好像是享受艺术，而实际上是在享用艺术家本人。这个道理，经过中国的政治空气滤出以后，一分分显得令人心悸。

冈林信康的作曲由于涉及了广泛的形式，其实应该受到更充分的评价。从早期的**folk song**，到大潮大流中的摇

滚,到电吉他以至大音响效果,再转头回到日本的演歌。演歌其实是“艳歌”的一个变称,顾名思义,日本流行的大多数演歌都相当俗气。可是冈林的几首还是有一股清纯,作曲也地道至极。其中有两首,是他为盛名经久不衰的演歌女王美空 **Hibari**(有人译成美空云雀)写的,但美空当然不可能反映冈林信康在农村 自耕 自作的意境,所以她唱的并没有冈林的男声唱得好。美空与他之间的合作,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明星行为。

但是,左翼之星的政治标签,不管他怎么撕,还是牢牢贴在他的脸上。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连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也不知几次地 目睹了听众强求他重唱旧时抗议歌曲的场面。而他似乎毫无礼貌,在乐器谱架之间和台下的听众争吵,脸上满是不在乎和恶作剧的表情。只有少数朋友才能透过那表情,看出一种受伤的野兽般的绝望。对政治的恐怖,居然能迅速变成对眼前观众、对围着 自己的人们的恐怖,这种苦味,他不知早于我多少年就尝够了。

当他刚刚宣布要用类似中国的“呼而嘿呀”的“**エンヤトット**”做 主旋律时,我完全没有相信。关于艺术的诺言常不可信;你不敢断定哪一招是真心,哪一招是招揽。即便是被环境逼迫吧,艺术家常会有冷静的狡猾一面。

但看来他决意已定。整个九十年代他没有再做改弦更张,每一首歌都使用最传统的日本民谣号子做旋律和节奏的基调。包括《虽然没有成为 **James Ding**》和不久前他刚刚寄给我的、纪念早逝母亲的《风诗》;即便在这类最适合他本意的心底抒情之中,他仍然放弃 **folk song** 唱法. 放弃微微欧化的修饰,放弃现代派的习惯,把心情纳入大鼓和竹

子的单调打击。我记得那时已是一九九二年，我已经自以为对他做到了掌握，就在为他写的CD《信康》的解说里藏入一点微词。后来在北京又在为周刊《AERA》使用的一篇文字（只甩于采访者引文，没有原样发表）里，婉转地对他的“寻根”表示了不同意见。我第一次用文字建议他回到依靠诗作，进行独自一人、一把吉他的路上去。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态度居然在私人的书信之间也那么坚决。他读了我给《AERA》的原文后回信说：“我很明白一把吉他弹唱是我的一部分才能。但是以它作为音乐活动的中心，会不会变成对寻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我有这样的恐怖心。因此，不能那样。”

我建议的，其实是他的“无拳套的演出”(Bare knuckle revue)方式。而他却早留意了我对政治形式的拒绝，因此他干脆断言——抒情与政治之间的危险联系。只是话里行间，还有更多的难言之隐。我几遍地读着，这封信，应该说是他的一次尖锐的内心暴露。我暗暗感到震动。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连几张“成人pop”里嘲男笑女和胡涂乱抹之后，终于走上了“无拳套的演出”。他考证说，在一八六七年规定拳击必须戴上皮制手套之前，拳手们是用精拳搏斗的。音乐在没有电气设备音响伴奏之前，歌手们也是用肉声唱的。因此，Bare knuckle revue 就是扔掉歌手的电拳套。放弃一切音响和工业化手段，放弃如今的“歌”已经不敢离开的电气化粉饰和掩护，像古时那精拳上阵的斗士一样，以真的“歌”面对人们。不用说，这样的观点使我深深赞叹。这样的歌，和我在蒙古草原上朦胧跟随过的歌，似乎有着一丝维系。

那是我真正明白冈林信康之不同凡响的一次。他依然是前卫,如兄长一般又走在前面。如同一个暗示一样,我已经觉察出,我的文学也在走近同样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类似的抉择。

已经不是七千人拥挤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欢呼的时代了;他一把吉他,独自一人,在各种馆舍、庙宇、结婚式场、青年会、农协、酒馆饭店——发动听众鼓着掌给他伴奏,让歌声和淋漓的汗水面对面地迎着他的听众。他的"无拳套的演出"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几年里,一共进行过近三百场。后来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又在日本重逢,他告诉我,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我在东京 **Egg Man** 听过的那场如醉如痴的演唱,原来就是 **Bare knuckle revue** 大规模实行的开始。我总觉得,只有它,只有回到独自一人的"无拳套"的英雄路,才使这个 **Bob Dylan** 的日本复制品终于在一步之上超越了 **Bob Dylan**。因为那种歌唱逼近了歌唱的原初,它造就冈林信康达到了一生艺术的顶峰。

但是冈林信康显然并不像我这么重视"无拳套演出"的意味。他的悲剧在于,他今天对日本号子的宣传,和昨天对"无拳套"、前天对演歌、更以前对回归农村的宣传是那么类似。在日本他的听众已经很少,他在试着接近亚洲。而亚洲是歌舞的渊薮,不仅有能力问题,他的常识是否够用也日益严峻。一九九三年的 **CD** 里有两首蒙古题材的创作,那简直是败笔,令人不敢听完。

日本的六十年代人,包括他,如今都进入了五十岁。前几年在东京,我问过他对"以后"的考虑。他说:我除了唱什么也不会。最近在《风诗》的附信中,他主动提到他的五十岁,但他说他要做"新的出发了"。在歌词以外,他还是只传

达自信。我没有读出一丁点伤感,他的笔迹依然草率轻松,用语漫不经意。我读着有些难受,旋即又觉得多余。

寄来的《风诗》还是试听带,依然使用号子的底色。其中的题目曲《风诗》一首,是冈林信康头一次涉及他早逝的母亲的歌。

也就是说,他的决心是真的。他决心把自己一切最宝贵的,都在这激烈、单调、有些古怪的竹木笛鼓之间孤注一掷。

茫然地听着一阵阵的号子变音,我猛地想起《虽然没有成为 **James Ding**》。那大约是在一九九二年,他在受到尾崎丰之死的刺激后,写出的一首堪称最真挚的自叙传的歌。歌手尾崎丰死于年轻的二十六岁,他的歌尤其他的死赢得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电视上接连几天一直播着痛哭的年轻人吊唁的镜头。冈林信康对尾崎的死,用《虽然没有成为 **James Ding**》进行了发言。詹姆斯·丁(**James Ding**)是个流星般的演员,几乎是与成名同时就死了,也正因为他活得短暂,他在死后就更加出名。人人都爱看他的电影,他成了年轻地走上艺术祭坛的象征。冈林信康的这首歌在东京首次演唱时,是在日清大厦里一个可以边吃边听的场所。再不是冲破警察维持的秩序、跳墙挤入人海、数千人共同狂吼狂欢的年代了;如今他的会场首先要满足客人胃口的品尝,然后再给客人添加音乐的品尝。

一个歌手死去了
只有二十六岁那么年轻
他被人们捧上了祭坛

从此变成了詹姆斯·丁

我曾被歌累得疲惫到了尽头
一直逃到了深山野村
那年刚好也是二十六
而且至今又是二十年

记得唱到这首歌时，没有太多的听众注意他的表情。隔着变幻色彩的照明，我觉得他如同一尊雕像，棱角锋利，目光冷漠。这首歌的配乐如同竹子的鸣啸，丝丝凄厉。在激烈肃杀的竹木伴奏中，他抱着吉他，反复地唱着这样的副歌：

虽然没有成为——詹姆斯·丁
但是能够活了下来，还是该说，真好

我不知道，使用母语听人如此表白时，听者会不会感觉舒服；我更不知道，使用着母语，对着人唱如此坦白私人心事的歌时，歌手的感觉会是怎样。但是无论我有过怎样复杂的心情，当时我并没有留意——《虽然没有成为**James Ding**》的作曲，用的就是传统的号子变调！他的小乐队汗流满面，重重地打击着竹筒、三弦还有震耳欲聋的大鼓，特别是竹子；他的乐队头目是忠实的平野，一个人负责编曲、旋律吉他、电子琴，以及最主要的击竹。他把砍来的竹子挑出不同质地的几节，制成一个打击竹乐器。我一直暗想这么干不如干脆打梆子，但是那一次——我突然听到了一排竹筒发出的，无可比拟的凄厉倾诉和逼人的效果。

像农民号子一般晃动的、古拙得节奏单调的音乐，淹没了冈林的吉他。一派不易形容的声浪，使得手持吉他的他，完全抽象成了他的形象。我想，当年，他仅仅二十几岁的当年，在万众欢呼中握紧吉他，唱着震撼了一个国度和一个时代的《山谷布鲁斯》时，他的形象一定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一种永远不变的、人的质地。

追忆起来，居然一直听了他十八年。我不仅觉得珍惜，而且意识到这已是我经历的一部分。以他为入口，我接触了现代形式的歌曲。这种学习和蒙古草原的长调不停地摩擦击撞，催我总是在一个念头上捉摸不完：究竟什么才是歌。当然，概括一个深刻的结论不是我的事；我只是觉得，流水般的悦耳音声流入心里，人的内里不再僵老枯硬。音乐的流水直接滋养着我的文字，若不是几条小溪分别注着活泼的水，我早就在那些呆傻的干瘪作文里死掉了。

我的体验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我惊奇和感到亲切。我愈来愈习惯了以他为参考，对一个蹒跚在严密控制的环境里的作家来说，对世界的参考是极其重要的；只是大多数人都参考文字，而我喜欢听歌。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冈林信康所下的功夫，已经使不少日本人觉得过度。可是我想，我们不懂得在艺术悬崖的边缘上站着的个人，需要的心境是什么。时间积压太久了，我自己也追究不清，到底我为什么那么长久地听他的歌。我无法摆脱一种辨别后的美感。他的歌被我比较过，判断过多次，我不能否定自己的听觉和感动。我总想作证，他的歌里确实有着美的质感。

后来孩子也开始听他的歌了。女儿经常边听音乐边做功课，以减轻沉重作业的压迫。但她说："不能一边做作业一边听冈林叔叔的歌。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不用说他的词，单说他那嗓子吧——太好听了！"我这才敢信任了听觉。或者孩子的感觉更可靠；由嗓音传达的气质，还有人的某种不易解释的内涵，当然还有直截反映思想的歌词，区别着现代的歌潮歌海中的真伪。

他的男声独诉在房间里传荡。又是最后扔开手里的笔，干脆一听到底。一张张唱片走着自然而曲折的路，如今我抽出任何一首，都如同电影的切入，看见他那时的形象。是的，歌子未必曲曲经典，偶尔败笔甚至一个时期的迷茫都确有存在；但那形象的美从来没有消失，尽管，我也开始看见它的衰老。

十数年的岁月里，听冈林信康成了我的休息，也成了我的功课。后来他对我不再是什么现代主义的参考，而只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兄长。我们有了淡淡的、但是彼此相敬相远的私交。他是我因游学和打工而结识的众多日本人中惟一的名人，但却是这众多中最平易的一个。

和他在一起时我经常想，其实成为明星并不难，只有获得美的质地最难。若是具备这种本质，旋律和流畅的作曲会来到，有力而富有灵性的文章也会来到。他们都并不是欺世文艺的花屁股。

在接触他本人与听他的歌之间，存在着奇异的距离感，也感受到巨大的原因。就是这样，一面觉得不可理喻，不能相信这风暴般的摇滚居然从词到曲都出自他的笔下，也不能相信那排山倒海的音响是源于他的口齿之间；另一方面，又觉得道理简单至极，从来如此，最棒的一个才最朴

素。

我还在听他。虽然他目前坚持的“エンヤトット”形式使我多少有些担心，但是我对他的倾听已经是我的个人行为。他的声音依然高人一阶，但是已经失去着引而不发的余裕，和令人艳羡的那种丰满。他的声音在不易察觉之间带着一种暗嘶。这更使我凝思屏息，听得紧张而集中。不，不要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在他随着他喜爱的大自然逐步远去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失美。在我听来，它清清楚楚地在那些旋律节拍之间，在高亢凄烈的竹子击打中挣跳，高傲而孤单。它依然与众不同，一如旧日地闪烁不已。是的，仍是他人不能企及的独特光芒。

确实，无论是歌，无论是文，决定的因素从来没有变，最终决定的还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还是人的真挚，拔群的气质，还是血肉的美。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日译本《北方的河》正好在日本出版。出版杜居然找到了他，而他——这前任“folk song 之神”的冈林信康，居然为《北方的河》写了封套环带上的一段话：

> 大约十年前，读了张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冈林信康论，我从心底里流出了眼泪。他是红卫兵这个留在世界史上的词汇的命名者；在沉重的前红卫兵的标签之下，持续着实现自己的严峻旅途。我想，正因此，他理解了在民谣之神的标签下痛苦的我。人都是为了成为自己、为了实现自己而活着。在如此之深的题目下的这个故事，我只能祈愿，它

能够在日本被尽量多的人读到。

他提及的冈林信康论，指的是我写的论文《绝望的前卫》。我是在拿到书之前听说他为我写围带的事的，我有些震惊。因为这一段话将随着每一本书，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为我促销——在书滞销时更会与书一同被冷落。他是在为了我破例。我心里掠过强烈的不安，如果我在东京也许我会阻止这件事。但是，看到他的名字印在封面汹涌的黄河浪头上，我又觉出一种莫名的安慰。也许对一个日本歌手来说，靠近伟大的黄河，并非是一件小事。此外，他讲及的话题，于今天的我更决非无所谓。我不知道，此刻在我心里涌起的，是否也是流泪的感觉。

我还会继续听下去，怀着善意的关心、学习的姿态和严肃的质疑，直到或是他或是我先一步离开。已经不是简单的爱恶赞否，冈林信康，这个存在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例证。他使我觉得亲切，也使我在双语寻求的路上更有信心了。

三

我是在很久之后才觉察到，我爱听的歌，大多不是由汉语表达的。已经有人非难，我自己也暗暗吃惊。

有一阵我主动补习西洋正统，托朋友买了一大批磁带，也去听音乐厅和朋友的演奏。那些缥缈的合奏确实使人如入梦幻，我也自觉很喜欢。但在请教时我总有一句话说不出来，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听着，我沉默。行家的

这是我为自己的小说《北方的河》拍的摄影。说《北方的河》。我问一个职业摄影家怎么样，他没表态。我告诉他：这风景已被消灭了。变成了大小两个电站。

摄于1985年，甘肃。

解释好像周密，但原因是暧昧的。他们说的不是被袭击时的感受，而是一种秩序般的诠释体系。人不能在听觉上也随波逐流。我委屈地想，该有一针见血的、本质的解说，在我找到它之前，我宁肯应声而去吧。

宿命的是，汉语之外的启发还刚刚开头。

是的，语言几乎不能更替。回忆蒙古古歌和冈林信康的时候，我只须十数一二。喜爱的歌，会使人对一部分外语记得烂熟，并且使人悄悄进入它的语感和分寸之中。然而真是学无涯；后来我多少次对朋友说过——临死前若是问我有什么憾事，我就说，此生没有掌握哈萨克语，此恨绵绵！再后来，随着我对塔里木南缘的文明开始了解，更对维吾尔浑如天成的文化构造禁不住地惊叹；我又斟酌好久，最后把这句遗言里的语种，改成了维吾尔语。

在老城旧街的深巷里，若是彷徨良久，而并没有一个了解你的维吾尔家庭，人会觉得难忍的孤单。我听说过叶文福(他才算得上是诗人)的一个故事。他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长途车上，和满满一车维吾尔人同路。维吾尔人唱了一路，照例唱得疯疯癫癫。而叶没有语言，也不熟悉他们。他枯坐一路，那时的喀什路要走六天。车到乌鲁木齐，满车的维吾尔心满意足地下车了，没有人理睬他。等到叶踉跄下了车，他抱住一棵树，号啕大哭起来。

这个传闻使我感动不已。他能够为这样的事而哭，这是诗人的记号。

和叶难过的一样，我的命运也仅是旁听。听见了，爱上了，心里发烫了，又无法深入，被拒之于外——那真是可怕的折磨。为了挣脱叶文福的厄运，我在喀什至乌鲁木齐的

路上拼命跟上他们；我跟着大声哼曲子，喊伴唱的吆声，迅速地大致摹仿哪怕一句，使劲地加入进去，他们露出了有名的微笑，不断回过头，向我瞟着鼓励的眼神。邻座的胖大嫂干脆唱一个副歌是“郎呀郎，亲爱的郎，你要找上一个好对象”的怪里怪气的知青歌来安慰我。

后来不再那么惨。我多少学了几段，多少进入过他们的环境。在果园子里，在朋友们欢聚饮宴，在长途的灼热戈壁路上。但我虽然努力加入还是停在表面，摆脱外人的遗恨是那么难。这使我不能容忍，我几乎打算撤退回头。只是，在每一次的离别以后，那快活的耳音，那亚洲腹地的气息，又挑逗一般不依不饶地追上来，又一阵阵不由分说地摩挲充灌！

它使人迷乱，它一阵阵诱得人不由得把双肩着了魔似的渐渐端起，两脚蠢蠢地寻找节拍。它被它的环境发酵得愈加浓烈，眼神都乜斜了，嘴角闭着微笑，白杨叶子也哗哗地响着切分音。一头撞上了它，我怎能不晕眩，我只想一个劲地沉入进去，向着它红艳或漆黑的神秘洞底。

这可是不折不扣的听音乐。由于不懂歌词，我听的是单纯的音乐，就像都会里那些古典西洋大曲的崇拜者一样。只是它可不那么大雅大器，它不需要解释，它新鲜明艳，它给人悦耳和心动的时刻，它不是“皇帝的新衣”——但是，它究竟是一种什么音乐呢？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广场上唱，在烈日炎炎的沙漠路上唱，在新娘子害羞地不抬头的婚礼上唱，肥胖的大师傅在油烟弥漫的灶台旁唱，蒙面的穷苦女人和伤残的乞丐，在清真寺的尖塔下唱。我被它引着领略悦耳和心动，可是我哪里敢解释。

所以在这篇随感里，前两节我能依仗经久的体验，而笔行至此，我只能大致追着直觉和感觉。我无法弥补这个缺陷了；谁叫我多少次犹豫，没有决心攻下这么美的语言。我惟有的侥幸心理是,歌毕竟是音乐而不仅是歌词;也许,歌声可以用直觉和感觉来判断?

为了确认再次酉行。而一旦再次踏进，感觉如封存后的发酵，它深沉了。它不再那么明丽，又一次在心中掀起的,是又似无形又在涌起的重重大潮。

绝望其实往往也是希望，我最终不能容忍自己与它无缘。

在帕米尔的高原，那年夏天可怕的曝晒就像世道，地皮被晒焦了厚厚一层，踏上去立刻升起一股白烟。听说有一个婚礼正在举行，我赶快跑了去。院落里积着一尺厚的黄土粉末。即便那样他们依然跳得滋味浓足。他们一个个深眉俊目，锐利的眼神在挑着尘土的舞步中柔和了，嘴角挂着优雅的微笑。两个男子吹着鹰翅骨制成的骨笛，两个女人击着大张的皮鼓。就那样两支笛,两张鼓,他们不间断地奏出撩人的曲子，那异样的旋律不可思议。我目不转睛地听到天色昏黑，没有歌，只有单调的四件乐器里流出的魅人乐曲。

我绝望于捕捉和记忆。那一刻我明白了，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此刻只该就这样与他们同在，加入这肆情流溢的中亚情调。背后是近在咫尺的冰峰，在尘埃中，它若隐若出,如秘如谶,强大地吸引着渺小的我。

一个白皙的少妇接过了手鼓。她仍然击打着那个节拍，只是一举手一侧目，明眸瞟过或淡淡一笑，都使我阵阵

受伤。她简直不是此界的人物;我猜,一定只有在最古老的两大文明混合时,才会有如此的美女诞生。是哪两大文明呢,突厥和吐火罗?或者是印度和波斯?谁也再不可能猜测了,只有她的鼓点伴着鹰笛的婉转,汇成世人不知但魔力无垠的音乐。舞步在凸凹的土地上轻跳慢踏,长长的睫毛向着肩头垂下。险峭的高原也被晕染了,我被蒙裹在色彩里。这种歌,这种音乐——它是一个魔女,不留一丝残剩地,专门掠夺和俘虏人心。它又是一服甜甜的毒药,谁饮下去谁就再不得脱离。

不能看着美逃跑。我在想办法,总会还有一些办法。

漫长的日子里我魂不守舍,中了魔症般一次次进入秘境。哪怕在最严谨的学习中,感觉也是无法推翻的:这是一个文明林中的魔区。除了咬着牙一次次反复奔波着靠近,除了多少学几句话几首歌,除了做些微的语言急救之外,我使出了吃奶的劲,从其他方面补充。也就是说,阅读、学习、考古、旅途,反正追着它,不舍弃。我读着,听着,一点一点地了解着它。渐渐地我的视野不再那么朦胧,音乐开始显现一点轮廓。

它不是一道支流,它是一个枢纽或者核心。这和亘古的、我熟识的那种牧民的长啸不同。绿洲像串起的文明珍珠,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发达的文明中心。古远的伊兰人(这个概念准确么,反正是一种印欧人)、粟特人在这里大规模活动过,虽然在史料上无声无息。

后来突厥南下的浪头重重滚来,突厥化使得牧人的长调得到了质变。直到蒙古铁蹄激起的狼烟散尽以后,西方和东方在一个纽结上再生了。

很久以后的突兀一天,人们才猛省般悟到,伊斯兰是

新文明响亮的名字。所有古伊兰的、吐火罗的、印度的、突厥的和回鹘的、阿拉伯的和波斯的一切，都响起了魅力十足的鲜艳旋律。当知道了这些以后再转过眼睛：它正如醉如痴地唱着，它和它更富魔力的音乐形象遥遥微笑着，望着目瞪口呆的我。

第一次，这回是我独自微笑了。因为恰巧我新配了一把钥匙。秋天,秘密地带着我的钥匙,我又一次奔向沙漠南缘,奔向我已经对它刮目相看的喀什噶尔和叶尔羌。

英吉沙古城的这个夏天依然酷热。白杨树和葡萄架的叶子在肆虐的日晒下，已经不再绿闪闪地抖擞。夹道的馕坑铺子,沙哑的歌声琴响,这情调任世道变迁不改底色。女人长裙,男子花帽,满街都是神秘异域的眼神。眼中是熟悉的中亚小城风景,心里是翻卷的波澜。渺小的我,终于在一群维吾尔人中间,被他们紧握着,簇拥着,走过他们的风情街道，走进他们的干净庭院。二十年后，终于有了一个改变。在那个炎热的正午,我获得了和“它”的关系的改变。

我也许已经累得衰老，但我怀着的，还是那年喀什路上的那颗心。那年我不会一句，而今天——我掌握了几个关键词。

我跟着节拍,踏上了维吾尔人的、圆圈般的打依尔。如今我们用音乐和舞步，来畅谈我们心中的迪尼。依着门框的女人和那年帕米尔见到的一样漂亮。她惊异这个东干，居然流畅地和男人们一道唱着即克尔。一个穿袷袢的人居然当场进入了费那,他的脸颊上流淌下了幸福的泪水。

上述语词的注解是多余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气氛中的

因子。重要的是终于有了我们的话语。当然,其实语言也是次要的,充溢一切的是音乐。

望着这情景我不由笑了。忽然我想到了叶,若是坚持下来他也会笑的。胖胖的母亲满面笑容,忙着在桌单的上面换上更多的食物。那个粗壮的汉子则着急地准备给客人的礼物,我已经看见了英吉沙特产的镶嵌刀子。四壁的挂毯图案酷似波斯,也像音乐一样难以捉摸。放下刚喝了半碗的奶茶,顾不上吃一颗晶莹的葡萄。打依尔上,人们已经开始了旋转。

那是人一生中难得几次的、短暂的点悟时刻。因为我不仅见识了传奇中听说已久的舞蹈祈念;还结识了第一个**apiz**。只有这个词需要解释一下:维语中使用阿拉伯语汇借词时,通常省略词首的送气音**h**。所以,**apiz**(阿皮兹),就是阿语中的**harfiz**。解释它很复杂;在这里,它指专司伴唱的苏菲世界的歌手。

他是一个绿衣的中年男人,眼睛里含着忧郁。他总是叹息般地望着我,一件暗绿的长衫上绣有绿丝线的花纹,对扣的襟口也缝着银绿的花边。看来,他在激动的时候不外现,神色严肃。不像比比皆是的巴扎摊和饭铺子歌手,不是那种粗鲁的莫合烟嗓子,他有着一副颤抖的、圆润的职业歌喉。

歌声如怨如诉,踏着使人摇晃的节拍。正是这个调子,你使我痴迷了半生。现在你正为我响起,阿皮兹就站在我的身旁,从他那儿,歌声流水般不住地汩汩淌入打依尔。都陶醉了,但阿皮兹没有一刻间歇,他边唱边轻轻地摇着头,像是体会着自己的歌唱。我尽心地投入陶醉,随着拍子在圈子上旋转。我要抓住难逢的机会,和我尊重的他们共度

良辰。微醺之中,我勉强地分出一念确认着葡萄、馕,还有和田壁毯,我提醒自己说:记住幸福。

如今问题就有趣了,究竟是这片世界的音乐底色,使得统一它的信仰沾染了浓重的音乐味道呢,还是信仰输入时也一路送来了音乐?是阿拉伯、波斯,还有印度都溶成一道道源流灌溉了这片古老的绿洲呢,还是这秘境的风土使得伊斯兰唱起了丰饶快乐的歌?

追究也许可有可无,总之此刻它们是浑然的一体。它们早就再也难分难辨,宛如一首歌中的曲和词,一种歌中的情调和内容。阿皮兹,如果远昔的古文化里没有它,那么它随着强劲的文明之风吹来时被催生了。如果它本初就是生活中的水,那么它已经被兑上洁白的乳和香醇的酒了。重要的是阿皮兹的存在,还有他胸中无穷无尽的歌。

走下打依尔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刚才哭了的男子久久拉着我的手,难受地说:“难道胡大真的要我们马上分开么。”领袖般的老者翘首朝着天空,自语着感谢上苍。只有阿皮兹没有表达,他拂拂青绿的长衫,默默地目送着我,他已经在咏唱时表达过了。

那一天,绿洲的暮色从来没有那么温柔。高空的白杨长梢,在沉重地摇来曳去。我只能离开;推辞水珠滚动的大串葡萄,推辞满是黄黄的黏稠汁液的无花果。我实践着又一次的离别,就像我经常非要离开美好的时候一样,我甚至没有顾上伤感;因为对我来说,阿皮兹——的发现席卷了并充斥了我的心。

我紧紧地抓着他。淡绿的绣花袖口,遮住了我们紧握的手。舍不得,我想着。抬头望去,毒日头还在骄横地施虐。还是不要久留吧,我做出了决定。阿皮兹不眨眼地注视着

我，像是在审视我追求真知的程度。我觉得他的双眼那么美,那么深陷的眸子,就像深藏的夜星。

也许,传说中的木卡姆,喧嚣中的木卡姆,其实就是源于阿皮兹的苏菲之歌?我想着,又觉察到自己的不安分。但是我更判断着学术与逻辑,是不安分么?我突然心花怒放,我笑了,一边把阿皮兹的手握得更紧。

最后的感觉，是欣慰呢还是难过？你在为无法更深入而难过的同时，也在最后辨出了它的本相。最后的时光我默然无语。你也许是一个失败者,但你毕竟向往过、甚至两脚尘沙地探询过——所谓天籁。不必强求做到更多了，我想,你已经耗尽一生,不该奢望过度。不仅如此,当失助的文明被歧视和欺侮时，你留下了你判断是正义的辩解。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好绝唱的、哪怕蹩脚的介绍者。那么,在剩下的时间里，你不妨悠闲地走走，做一个享受者和欣赏者吧。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常在古迹上散步。

在近郊，在仅仅隔了一步就和都市离开的冷清野地里,矗立着泥涂表面的迪尼麻扎。

我走近时，看见那里独自跪着一个农民，破旧褐衫的枯瘦老人。他拨弄着一小堆点燃的枯树枝，把手指直接插进火堆里。篝火很小,不过是熄了又亮的,一小簇枯树枝架起的火苗。褐布的裕袢和土地混为一色。他的靴子满粘着红褐的泥巴。他痴痴凝视着微弱的青烟，漫声哼着一些句子。那身四郊最普通的褐色袷袢和也晒成了土褐色的圆帽,与几天前结交的、结净绿衣的阿皮兹恰好成了一对。而歌声却一模一样；他独自地低唱着，若有所思地摇着肩

头。他不时把手伸进火苗拨着枯枝，好像火苗一点也不灼手。

我在寂静的空旷中走近。间或他浊重地咳嗽，他的曲调时有时无。但是声音慢慢散开，原野如同被点化着，浮现了情调。我那时靠得很近，听着那些滑落的音节和沙哑的喘息，远处的暮霭一层层次第苍凉了。我要溶入，我捧起了双手。我摹仿着，追随着空中的旋律，开口吟唱起来。开了头，当吟到《阿叶提·库勒西》时，褐衣的老农礼貌地对我欠起了身。

他浊哑地问道：

Siz…Dini ttxün ma?

(您是……为了迪尼吗?)

Mänbir apiz boldem.

(我是……一个阿皮兹。)

我轻声地回答。

剩下的傍晚时光，都是音乐的低诉。无论一身土褐散漫坐着的维吾尔老农，还是满脚尘沙的我。我们各自吟叹，时间就在身边流过，旷野里只有我和他。我抬起头来，看见寥廓的喀什噶尔大地上，荡漾着暮霭的黄色。

我觉察到了难以言说的和谐。我信服了，人间的音乐，确实起源于神授。我记忆着心灵的洗涤，记忆着这个永恒的边缘。我紧靠着它，它温暖着我，一直到黑蓝晶莹的夜幕完全垂落。

* * *

我迷恋着各种异族的音乐，心里却想着母语和故土。从远古的礼乐时代开始，其实我双脚踏着的这块大地，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只是旋律随时间而僵硬，和声之律变成了秩序。不知为了什么，气质和真情一丝丝被排斥，古乐衍化成了统治的礼教，音乐可哀地异化了。

只剩下边缘死角。只剩下贫瘠不毛的旱渴之地，还残留着几声炽热和苦涩，还缭绕着一响扰人的呼叫。

当植被和绿色都破坏净尽，当世界已是一派荒漠的黄色，人的心事更重了。年复一年，我徘徊在黄土的塬坪峡谷之间，寻寻觅觅，山东山西地找着新的《三十里铺》，高山空谷地听着《花儿》和《少年》。但是，封建主义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主宰；它使人呐喊着又要矜持，渴盼之中又要规矩。它总使每一股鲜活的情感，都依附在另一股强大的束缚之上。

于是我便步不可收，急剧地滑入了深渊。忆起来一切如同前世的定然，三十年过去了，留下脚印般的履历。在漫野的美声魅惑中，我如中魔症，如被夺魂，离官俸利益、大势时潮步步远了。猛然惊觉时，才发现自己像是初次做人，刚刚尝到一点人性的滋味。

有一些纠缠我半生的命题，诸如木卡姆与苏菲传播的关系，诸如不同语言的乐感、它们与曲调的承载谐调……，要承认自己已经很难深入了。不用说更使我倾心的那个题目——关于那片覆盖着广袤欧亚内大陆的浪漫音乐之海，究竟是从印度起源还是从波斯起源——不，已经不是此生

[illegible]个[illegible]洲的前后，都[illegible]这样[illegible]的渠[illegible]。不[illegible]言文种也方夹[illegible]沙漠和枯焦[illegible]天[illegible]南麓之间[illegible]于那片[illegible]漠欧亚[illegible]大陆的浪泛音[illegible]之流，究竟是从[illegible]度起源、还是从波斯起源——[illegible]，已[illegible]是化生[illegible]穷究的[illegible]了。

1997 年，摄于[illegible]。

可能穷究的领域了。

但是更多的依然是满足的感觉。因为我毕竟听见了，我没有完全堕入失聪，这是一件使我悄悄喜悦的事。

怀着感激，我不断地学习，一次次踏上长旅。我和深爱的人们时散时聚，共享和分忧着文学和生计。流年之中，我总是听见耳际充斥着一脉歌声；是的，就是它，是它在陪伴着我，生息度世。

1998 年 3 月－4 月

一册山河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地图有特殊的喜好，也对地图特别苛刻。每去一地，总是先写信求朋友帮助寻找地图，到达后又总是对他们辛苦寻来的图絮叨挑剔。时至今天，我突然有了把用过的图整理一遍的愿望，所以前些天大规模收拾书架。当三册图被装进专门的夹子里以后，我发现这些年来丢失了一些重要的图藏。剩下的只有经历和体验,就像马匹已经驰去,只余下荡起的烟尘。更有不少地图上记着当时的记号，提醒着里程和宿处，刺激着正在淡忘的记忆。

一

十八岁那年,我平生第一次使用地图。

回忆起来实在遥远，已经记不清那是一张怎样的地图,只记得一条地图上的直线。

那是在大地震般的一九六六年，岁末的隆冬。世道鼎沸,秩序颠覆,但是社会的筋络纹脉却还都健在。我们一行

青春做伴，年长十九最小十六，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崇山峻岭中——应该说是在地图上的甘川交界的黄褐色纸面上——划了一条笔直的直线。

真佩服那时的行动精神。那真可以称得上不知山高沟深,气指心使,随念头和追求所欲。地图上的直线指向当年红军长征的关隘腊子口，而铺在直线下面的，却是激烈起伏的大山脉。

记得第一天就被大 自然狠狠地教训了。我们用指南针(玩具型的）比着，瞄着腊子口的方向，用尺子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再用直线瞄准出脚的方位,背起了行囊。

无视大路，对准直线瞄着的山头，一上路就开始登山。为了露宿野营,我们借了藏民的大皮袄和长靴子,背包有六十斤重。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山岳地带如此蛮干，人被累得汗水淋漓。爬上第一道山，气喘吁吁地休息时摸出图来，我意识到了地形图上使用的黄褐色是怎样的严峻。那个时刻的感觉很珍贵。我如同咀嚼如同琢磨一般，把地形图上的色彩高程表示，把黄褐色代表的雄险浩大和步步崎岖,记在了自己还应说是少年的胸中。

但是压倒一切的，是难以形容的壮大山河对幼小心灵的震慑和征服。太阳正在前方沉没，但是前方是海一样绵延起伏的山。它实在壮阔庄严，望着它谁还会想到当晚的宿处和下山的路呢?我们大声吆喊,纵情高唱,像几只不知忧虑的小鸟，迎着出生以来初次看见的无限山河。左右逶迤连峰，前方层层山影，掩没世界和沉没夕阳的，只有山，山,山……

当夜野营荒山。次 日顺沟穿走，好不容易才找到道路。后来的旅程不再无知地蛮干,在藏区小住,攀过真正的

雪山，见识了革命史的腊子口名胜，完成了一生长旅的第一次远行。可惜的是，那时使用的《革命串联地图》，由于没有留意珍存，在以后的日子里弄丢了。

《革命串联地图》是一册十八开本的平装普及本地图，附有红军各个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定价极其便宜。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也应当公平地承认它印制精美——各种字体字号标准清晰，线条印得纤细而分明。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白图”，虽然因为没有稍稍印上一点等高线而使我觉得美中不足，但它也没有使用后来那恶俗的行政色。这样，图上的蓝色，一定是河流湖泊以及沼泽；黄色则专用于标识沙漠。这使它具备最起码的地形感，使人能最低限度地想象自然。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设计，凡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地图册，几乎都是套色的，但是整个陕西新疆地全部印成粉红或浅绿的行政区标志色以后，连区别出水流的蓝色都障眼，更不用说想象自然了。

丢失了《革命串联地图》是件憾事，但庆幸的是我保存着它的姊妹版。一九六六年一月版的《中国地图册》（普及本，定价 0.40 元）印刷于那个风暴开始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显然可以推测为串联地图的底本。它除了没有印红军路线，没有着重标明革命各圣地外，同样是白图，蓝色标水黄色标沙，没有使人眼睛累的行政区大色块。可能是日后出门使用串联图册比较多，而使用这一本比较少吧，时隔三十年我的这本地图册还算大体完整——掉落了几页，有些页残破撕碎，有些页浸透了羊油，半数纸色变黄，封底的宁夏页烂得只剩下原来一页的三分之一大小。但恰恰在这残存的一小块的背面，印着图名、书号、定价、资料采用

截止期(1965.12)、印厂名、出版日期和印刷日期。

难以尽数这两册地图陪伴着我，走过了多少道路。抚弄着残存的封底页，猜测着图上的烟熏油浸，心里涌着类似对乘马的感情。谁也不能足不出门,尽知天下路。然而旅人必须在出行之前以及在路上，不断地思索前路。地图是至关重要的,它很像一册最概略、最基础的入门资料。只是我深深感到的是，迄今我也没有享受使用地图的彻底自由。如果说人生之旅就是突破束缚投奔自由的话，那么我的历史也是一小段挣脱地图的限制和找寻好地图的记录。

二

对地图的最初的朦胧渴望，是在内蒙古草原的马鞍上发生的。那时用图的自由,完全是一个零。游牧民是一种活动半径远远超过农民和城镇居民想象的人，在那种生活方式中,地图渴望被两种因素引诱着萌发了。

一是对地平线阻挡的突破的强烈冲动。不知我描写过没有,骑马放羊的时候,我总是尽力在镫上立直身子,企图眺望远方那道淡蓝色的地平线。若是甩开了羊群或劳作的拖累，有时匹马远行时，我禁不住当跨过平日禁锢自己视野的、那障人眼目的地平线时——心里的满足和喜悦。但那是一种没有尽头的魔术：踩上地平线以后，在簌簌的草海摇曳之中，视野尽头又是一道淡蓝色的地平线。年复一年,人渐渐忍受不住。无法知道外边;尽管草原如大海,但是在辽阔的禁锢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呢？这个固执的念头

有时逼得人要疯。其次是老牧民们的半径和见识。我粗粗算过，汗乌拉大队的长者们，大致都有四百里的骑马距离，和对四百里方圆里人事水草的了解见识。北至外蒙古的一些大小山头，南到锡林浩特城附近的口口水井，听他们娓娓道来时，觉得那真是如数家珍。他们知道一切掌故原因，清楚所有的明暗路径。数百里真的全在他们胸中，这使年轻的我惊愕而艳羡。在积雪斑驳或一望碧绿的草地上和他们闲谈时，我感到了自己不是他们交谈的对手。我能从哪里汲取那么辽阔地域的知识呢？连他们显然觉得是谈话中的标志和注解的那些地名——我都居然闻所未闻！而他们却只习惯那种谈法。

需要一张地图。需要一张向北稍微越一点境、向南至少伸到阿巴哈纳尔旗、两翼包括东乌珠穆沁全部山、井、泉、湖的地名；包括各个社队的旧名、主要家族血统、他们的冬窝子和习惯驻夏地；与公路有关和无关的马行和勒勒车行路线的地图。只有找到这张地图以后，我才能听懂他们丰富满盈，却又断头缺尾的故事；才能串通起人群和牲畜，过去和现在，才能在胸中勾勒出一个生动丰富的草原。

没门儿。那张图是绝密的。一直到我离开草原，我没有找到过任何一张乌珠穆沁的地图。有一天，架子山(草原上隔几个坡或几个山头，就有一个测绘者立起的木头架子)那儿有人影。羊群稳定，我无所事事地信马走近了那个三角锥般的木头架子，见一群当兵的正在那里忙碌。那一天我翻弄了一下他们的地图。难懂的等高线密密麻麻，用汉文标着绕口的地名。我至今怀疑他们印错了很多，因为拼读着实在觉得陌生，也许我翻弄过的几张，画的不是我们

的地盘。

当兵的警惕地收起了图。他们奇货可居的神色使我不再探询，所以今天也不便就那些地图过多议论。但我想弯弯绕的等高线繁琐得令人生厌，而且我坚信那种图并不能教给他们只有我们牧民才知道的条条路径。在草原的最深处，跟几个不懂半句蒙语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们又没有要我“带路”。我悻悻地走马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们家乡的地图。

曾经尝试着自己画过几笔，但是又放弃了。缺乏一种技术使我苦恼，太多太大的空白更使我沮丧。黑夜也能摸到的、被马儿记得熟熟的走法，若是画下来有多麻烦。而且，又怎样才能画下草场大山的茂盛、画下不枯水井的神奇呢？精致地开了头又胡乱扔掉的纸，今天已经不知去向，渐渐地我还是用牧民的方式，让胸中约略地又细密地装上了一帧图。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五年重返阔别的草原时，牧民们感叹我依然熟悉地理。我自己也确实能够在深夜的路上，让山影一步步唤起依稀记忆，准确地找到自家毡包的灯火。不过遗憾是不能否认的：我最终也没有掌握牧人胸中的那四百里方圆。由于太多的空白，后来在描写它时，我要补充很多的想象、情感和学识。

三

毕业后我被派去新疆考古，于是和新疆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除了第一年以外，一次次我习惯了在新疆独自探寻。即使偶尔有人同道，也都是依照我的路线和主意。不

觉之间,断续以新疆为目标,跑了十年。

在新疆,学问和文学的界限渐渐混淆了。或者说,是职务工作与生活方式两者的界限渐渐混淆了。后来我大都是并无具体的目的,只是盼望身心能在新疆熏陶,盼望在新疆不断地发现和游荡。

那么就需要有优质的地图。我注意这个问题的时间很早,但是在新疆探查的初期,我的背包里并没有一份好图。

一九八〇年决定从北麓向南穿越天山,踏查英国人A·斯坦因走过一次的、早在汉唐就见诸记载的“他地道”。我在北京复印了斯坦因著《Innermost Asia》的附图。

那是一帧等高线地形图,地名一律使用拉丁注音,大致囊括了吉木萨尔县和吐鲁番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包括奇台、鄯善两县的一些地方。最重要的是,它比起汉文地图来,能提供给我比较准确的地名读音。那时新疆正巧也在流行北京制造的拉丁式新文字,所以以后在几次调查东部天山的旅行中,常有天山里的哈萨克人兴致勃勃地凑来,和我一块拼读着,欣赏那张地图。不过,用那种地图在天山调查常常心神不宁。包括淳朴的哈萨克在内,人们有时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好像我是搞情报的特务,手里拥有间谍地图。

我不能不紧张。祖国大地任我走,这是一句暧昧含糊的大话。在吐鲁番的煤窑沟,在阿勒泰的青河,我都遭遇过军警的盘查。特别是,我不但使用着一份洋图,而且包中还真的带着一张据说是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百万分之一地图。

简称 ONM 的美国佬在空中拍摄的地图 (Operational

Navigation Map)，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被各种专业人员使用着。我是在日本的东洋文库复印的。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尺，其实比革命串联地图还要粗略。它订正了斯坦因图的一些标高之类细节，但是注明的地点极少——可能他们对公社大队级的地点不屑一顾吧，所以这张图对我用处不大。

那一年还从日本复制了清朝印制的彩色地图集《西域舆图》。八十年代初，彩色复印即使在日本也是罕见和昂贵的，京都大学的一个朋友帮了这个忙，他以为我是个严谨的学者，没想到我主要的目的只是满足幻想。

《西域舆图》的奇特，在于它的绘法采用了彩墨画与交通线、居民点、示意的河流相辅相成的绘法。缺点是方位不准和比例失真，但是它形象逼真，而且于行政设置和各族游牧的区界，有权威的注明。它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城镇画有门楼堞墙，边界甚至画上栅栏，读着仿佛看一幅山水画长卷，非常有趣。

——不过上述各图都是花拳绣腿，用不到刀尖刃口上。我在搜寻着，搜集着这些老图洋图的同时，也仔细地找着用着顺手的新疆地图。终于找到了几部好图。比如我拥有一套两张对拼的伊犁地形图，它不仅准确地标着任何一个自然村，而且标着任何一条乡间土路（只要略宽于大车道)——这就使旅行者可以冷静判断步行、自行车、骑马的可能，而且还能估计时间。用来印山地的棕黄色浓淡合适，每条等高线都稀疏清晰——这使我在几次决定选择山道的时候，出发前就能彻底分析山体的宽窄、大饭的坡度以及积雪的情况，冷静地做出决定，而不会有轻狂孟浪的冒险。

旅途不等人充分准备，当地人不懂你需要基础。走上旅途之前，必须了解到达现地后立即触及的人们不屑一提的那些常识。所有地点的勾连和位置必须已经记在心中，否则连问路也问不清楚。而这一切，少数靠读不易搜集的有用书籍，多数却要靠研究地图解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地图就是无往不胜的法宝。在使用地图之外，实现旅行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能力。一点不错，是在人生中实现有意味的长旅的痴迷热烈。以及在人间世界交往结识判断决定的种种能力。缺少了这一切，拥有再好的地图也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是在这种热情和能力的支撑下，地图确实会提供巨大的灵感。

那一年，在阿勒泰的崇山峻岭中，那条古代石铺道路的发现，简单说就是琢磨地图一个念头导致的。

我在出发去新疆之前久久凝视着地图发呆。去哪里呢?能干点什么呢?心中茫然一片。地图上密集地标着山川聚落，晕染着绿色的平原、乳色的戈壁、浅蓝的沼泽和棕褐的山脉。那时我要去新疆是为了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首次的新疆调查。题目自定，范围总的来说是蒙古时期的新疆。一连几天，我的两眼在图上溜来扫去，一会儿盯着南疆的沙漠，一会儿瞄着北疆的天山。

突然我瞟见从西北向东南斜斜延伸的阿勒泰山脉。它在地图上把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分为二。蒙古那边次第分布着科布多、和林，还有今日的乌兰巴托；中亚这边是蒙古史上屡屡出名的别失八里、阿力麻里，直至遥远的不花剌、撒马尔罕甚至俄罗斯。我再把眼睛瞄准阿勒泰山脉，渐渐地它在我的视野中浮动起来，朦胧又逼近。是它造成了两个大地理区之间的分界，因为它，两个世界被隔开了。

但是，游牧民族是不承认山脉的阻拦的，两侧都是天然的牧场，他们一定自古就穿行迁徙于山脉两侧。这样，山脉里应当有古代的交通线。心中那时被照得雪亮，我被一阵逻辑带来的兴奋攫住了，翻阅地图的手剧烈地抖。

继续细致地分析以后，我决心把调查地点放在阿勒泰山脉东端的青格勒小河一带。

那次阿勒泰之旅，巨大地扭转了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对于一个考古队员来说，那次调查可以说是一发命中；但是对于一个使用蒙古语和乌梁海人相交，在哈萨克的夏牧场感受世界的原牧民来说，我察觉到了学术形式的苍白。我把研究报告写成了散文，并且暗暗决定了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

除了珍贵的阿勒泰地形图以外，由于一些蒙古族边防军人的帮助，那一次还使用了总参测绘局的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我们发现的古路，分别标于那套图的L-46 之第38、39、50、51等几幅上面。万分之一图只见树叶不见森林，不仅无法获得而且携带不便。我开始懂得了自己的需要。对我的方式来说，最理想的地图是二十到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决不能是行政图。最好是B5 大小以便插在书包后面，最好是布质以抗磨损。

四

如前定的命运一样，我生涯中最理想的一帧地图，在进入伟大的西海固山区的翌年，被支持我的朋友搞到，送给了我。

这是一帧固原地区地形图，比例尺恰好是三十万分之一。加上邻近的政区以外的部分，它为我细致入微地画满了包括陇东和陕西一部的，我正准备深入的黄土高原腹地。

走进这块热土的条件，是对苦难深重的民众的尊重。早我之前无疑有数不清的文化人来此一游，然后索然地去而不返。步我后尘又不断地有人偷偷来过，企图打探些甚至是我的故事。可是没有端庄的举意，缺乏儿子或战士的热烈感情，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只是再次证实了自己的失败。民众依然在艰难中摸索,黄土还是那么满目疮痍。

而我鄙视采风捞故事的文人行径。我只是决心喊出正义的一声，把它还给养育我的父母，也把它还给养育我的世界。在一次次的奔波中，在心火正在胸中熊熊锻炼着矿石的时候，我常常在山村的泥屋里读图。随着一年年岁月的流逝，我从地图中读出了很多门道，读出了文化的薄厚，往昔的遗迹,还有秘密的角落,传递的路数。熟熟地研究着地图，我能追上在农民们口中忽东忽西的位置了。我一寸寸一分分地感到了农民们顽强厮守的一种潜在的区域。那是一种生存地理；他们拥有的一切激烈和隐忍，性格和生计,观点和语气,甚至信仰的抉择,都与那地理息息相关。

在大雪纷扬的时候，心底的诚意被染得洁白一片。我有时忍受不住这种洁白的感受，那时我望着地图，企图在冲突中平静。六盘山的翻越，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实现的。

——在我正打算去六盘山的前一天，我得罪了政府派来送我的人。当时我的农民兄弟哭了，我们的难舍难分可能使送我的人很看不惯。他嘲讽道:明天我们上了北京,不

知还认得我们么?我假装没有听见。但是,当他再三地用这句话取笑时,我发怒了。我指着我的农民兄弟说:我认得他;然后对着那个取笑者说:可是不认得你!

第二天雪更大了,送我的人已经被我恶语相伤,我知道我被自己的不忍耐,逼上了未知的雪路。但我反复地琢磨了地图。在隆德县与和尚铺之间,我看到图上的六盘山纵深不大,山体窄细。一根根辨认了那些等高线以后,我判定翻越它顶多用一天时间。

退一步,用三天时间,第一夜宿地图上的杨河乡,第二天在山顶上即便有意外,可以寻到电视发射塔求宿。据地图,一条叫做好水的河流直插山麓,沿着河流,是不应该有什么险阻的。山体是单架的,并没有迷路的可能,若是顺公路走,迷失的担心就完全多余。此时不干,将悔恨终生。我下定了决心,步行越过六盘山。

除了雪中六盘的美丽视野之外,现实的、石头和森林的物质六盘,和我那宝贝地图上标明的毫厘不差。

第二天正午,我们的双脚,踏在了六盘山顶的深雪里。一望白茫的陇东原野,编素清冷的山峦峰峁,在前方低低地静卧着,渐次迷**濛濛**,直至尽头。疲惫、汗水和喘吁虽然都是真的,可是那鼓舞人心的大风景,那鼓舞人生长旅的壮美眼界,更是真实的。

我的分散各地的朋友们纷纷为我寻找地图。我发现,在山区找地形图还是可能的。当然地形图使用的普及程度,标志着民主发达的程度。图是不能指望从书店里买到的。他们大多是从办公室顺手一揭,图就成了我的私藏。我再对这些图进行一番分类处理,过大的则剪成**B5** 大小的

方块,行路时顺序取出来用。

有关黄土高原的图，我收集得还不全。除了宝贵的固原地区地形图外，其他地区我用的多是一幅剪开的甘肃省地形图。可惜它原是挂图,字体嫌大,用色太深,有时不易辨认。好在一个兄弟深知我之偏好,题字赠送给我一本《甘肃省地图册》，可补宏观。另一个裕固族朋友又割爱于我，使我有了一幅珍贵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形图。

如今,只要是在大西北,不管出发前要去哪里,我会很快地完成行前准备。读书之间，我会大致地瞄准一些村庄或山沟,在到达之后若有所发现,就多半是新鲜的东西。

——这几年，就像用图的限制一样，我的旅途也受到了种种限制。为了避免亵渎,我开始体味“旅”字中的慎重和节制。大西北，在有意的安排中去得少了。我开始在南方,在华北搜寻。随之而来的第一个矛盾,又是未知地域的地图问题。没办法,我只有暂时地先使用一些低级的图,甚至是行政图和公路图。

使人感铭至深的，无疑是手中的图与眼里的大自然之间,那不可思议的对立的真实。在云南墨江一线的行进中,我被迎面矗立接连逼近的横断山脉震惊得缄口无声。大自然的造化太壮观，人不仅自知渺小甚至被威慑得几欲膜拜。地图上仅仅是一粒尘埃般的小小地点，地图上仅仅是毫厘的距离，显化在视野中的真实却是千仞的深谷，云间的群峰。丰腴的浓浓植被铺满山阴山阳，簇簇的鹅黄是芭蕉，层层的银绿是桉树。算算比例尺，目的地应该早已到了，但是横拦竖断的高山大峡仍在更迭不停，在现实中恣意地伸延着它莽莽的本相。如此的绿世界,如此的大洗礼，

此刻真实地属于你。那一天我禁不住这样的思想：别相信侏儒们的喋喋胡诌，按照地图的指引走下去，已经不远，再迈一步，你就可能抵达目标。

云南仅是一个例子。在大陆之上，在允许旅行的一切地方，抵达都是相似的。然后可以藏起地图，导引的过程结束了。会说老百姓的语言么？会说民族语言或者方言么？多少知道这一方水土的来龙去脉么？能够听到当地的苦楚和感到世间的不平么？满腹自幼学来读到的知识，会发生分崩离析和去伪存真，一张新的白图，一个结实的框架，会在胸中一点点凸现。此时可以扔开地图了，真实的图像，从此刻起要用感性来笔笔画出。从此刻你作为人的本质会受到检验。你的用心和诚意，还有你的质地和前定，都会受到平和礼貌、但是决不含混的检验。……这一切对于我是那么熟悉，可是长久的旅途，疲惫也是沉重的。何况更要紧的是前定；我常常因此陷入沉吟。我明白不能不合理地强求建树，造物的主不会让一个人满足得太奢侈，包括让他走过的旅途。

翻检着，浏览着我的装订三册的图藏，心中油然浮起一个久违的感觉。那是在乌珠穆沁春雪融化的一个下午，我就要离开，去北京念大学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收拾着自己的那盘旧鞍子，它是丑陋的多伦式鞍子，两面大鞴掉落了漆皮。真是，一直到离开草原我都没有置起一盘可心的鞍具；一直走到今天，我也没有弄到最好的地图。

倘若来世有暇，我一定要为年轻人印制几套地图。因为讲到头来，我一生的用图只是因陋就简而已。比如说，布质的或塑料薄膜印制的地图，就几乎难求一页。种种人文

和文化因素，从来印不到三十万分之一以上的精图上。处处是哄小孩的地球仪，比比是枯燥死板的行政区划。好像给老百姓看了一张七十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就是危险的泄密,好像人无权热爱山河。我若有经营地图业的未来,一定要把历史地图、民族人文地图、包括地形的自然地图合而为一，字体和套色都要增加十倍。我要为地图编出配套的资料软件，让一切志在旅行的人获得一切基础，让他们集中全部精力,只思考自己的取道,只磨砺自己的热情,只考验自己的真诚。

——以往的用图中，其他值得附记的，当然首推谭其骧主编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巨著虽然携带不便,但是出门前不可不读。还有缩印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虽然有很多省份是骑缝印刷的,拆开携带则容易毁了图的边缘,整册携带又嫌太重,但它毕竟是少得可怜的、能从新华书店买到的地形图册。在尚未设法搞到分县或分地区的、至少比例尺在五十万分之一上下的图之前，有这册图还是远胜于无。

另外，在使用地形图出门时，我还喜欢复印上一些活页的专业图页。除了历史地图集中的某一时期（用得最多的是清代)图之外,比如宁夏的灌溉水系、新疆的绿洲分布、《中国水利史》中所附的大运河诸闸马河底高程,都是极其有利于理解现地的地图。

携带地图最好用透明的单页塑料夹子。在八次前赴西北跋涉中，我用碎了两个硬塑料板单页地图夹，在长途公共汽车的颠簸中，顺手从书包中抽出来，一个一个地确认路过的处处聚落条条河流，是很有意思的。在一一印证中若思若想,车子的摇晃使人觉得非常舒服。久而久之,这会

变成一种癖病般的爱好，使人总想到旅途上去寻找安慰和休息。

1995 年11 月

编 后 记

这些年，大约每过两年，我都能把自己的散文整理成一个集子。进入这个二十一世纪后，我突然感到，以往这种习惯也许是一项奢侈。对于作家、知识分子、艺术和思想来说，时代在激烈地动荡，生存在围逼中继续。中国人合理地选择着逍遥、安全与利益，写作的困难出乎预料地出现了。

但是它还不至于使我也弯曲骨头，改换道路。因为原来我就没打算贪得无厌。对于我，时代不仅太宽容、而且我觉得它给我的已近奢侈。

每当我想起——那些埋没的智者、底层的众生、理想的牺牲者，心情就平和了。俸禄可以舍弃，头衔不值一提，黄泥小屋让其永远只是念想，自耕自食，赤条条来去，只追求——新意的真知，美好的文章，只求在滔滔的洪水中，做一块思想自由的石头。哪怕遍体水锈，棱角缺残。在这么一个过程里，我还改了不少暴怒的坏脾气，看着世间热闹，常常不禁微笑。

前些年，还在出版呈着一派畸形繁荣时，我就竭力拒绝重复出版自己。而如今，似乎日子对文学开始变脸了：我一样以不变应万变——对文章加倍自重，对境遇做好准

备，对出版的机会珍惜。我暗暗盼集子都是新作、最终有一个散文集的排列——这个努力在打了一些折扣的情况下，大体还是实现了。继《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之后，这个集子是我的第七本散文集，除四篇旧作外，收入了一九九九至二〇〇〇年创作的散文。

谨作编后小记。

张承志

2000年11月12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册山河/张承志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
ISBN 7-5063-2016-9

Ⅰ.一… Ⅱ.张…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79445号

一册山河

作者：张承志
题字摄影：张承志
责任编辑：潘　静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0千
印张：7.75　　插页：3
印数：001-8000
版次：2001年2月第1版
印次：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016-9/I·2000
定价：14.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承志散文集一览：

《绿风土》 (*1989* 年)

《荒芜英雄路》 (*1994* 年)

《清洁的精神》 (*1996* 年)

《牧人笔记》 (*1996* 年)

《鞍与笔》 (*1998* 年)

《以笔为旗》 (*1999* 年)

《一册册河》 (*2001* 年)

封面设计：张晓光

童话

ISBN 7-5004-2010-X/I·320 定价：14.00元